



國學大師
叢書
趙樣初題



GUOXUEDASHI

蔡元培評傳

國學大師叢書

蔡元培評傳

張曉唯著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赣) 新登字第 005 号

书 名: 蔡元培评传

作 者: 张晓唯

特约审稿: 高平叔

责任编辑: 钱 宏

封面设计: 赵琨森 彭开天

版式设计: 王玲云 钱 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中国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江西省出版总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8.375 插页: 0 字数: 22 万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ISBN7—80579—340—9/I·283 定价: 9.88 元(精)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 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国学大师丛书》

总序

张岱年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

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概深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赅，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荊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覿，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

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尝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鱼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四十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

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一九九二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国学大师丛书》

重写近代 诸子春秋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

一、一种阐述：

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

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癖、佛入中土、道教萌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

《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

二、一种观念：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

《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

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九十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

《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

情和支持。

三、一个命题： 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界、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即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激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路。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九十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

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钱 宏（执笔）

一九九一年阳春节初稿

一九九二年立春节修定

序

治史，贵在一个“信”字。信实的史籍，不仅有助于现在的人确切了解已往的人和事，也是开展讨论与研究的坚实基础。倘使史实本身经不起查证，则由此引发的议论及分析，无论其词藻如何华丽，一经推敲，即将瓦解，尚何有价值可言。当然，真正要在历史各个领域、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秉笔直书，并非易事，除史料不足等因素外，诸如社会政治的影响及限制，在构成难以逾越的障碍。虽然如此，在可能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历史的真实”，求实求信，仍然是纯正学者孜孜不懈的追求。

本书作者所撰这本《蔡元培评传》，吸收与借鉴已经刊布的有关资料及研究成果，在认真考比、取舍的基础上，对蔡元培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较为客观、较为全面、较为翔实的记述和议论。其中，第一、二、三章，充分使用蔡氏《自写年谱》提供的史料，使人们对蔡早年情况获得更具体的了解。第四章，以较多篇幅详述蔡

氏主持北京大学六年的经历，着重从学术视角，开掘蔡氏酿成“一种学风”的文化意义，就此进行分析与议论，这是具有启发性的一项尝试。他还记述蔡氏的交游状况，所选交往人物，尽可能地概现某一时期某一文化群体的特性，从这些交游中，反映出蔡氏起着沟通“戊戌”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深化了史实本身的内在涵义。此外，他着意探讨蔡氏的人格特征及其文化教育背景；对于蔡的家庭生活和后人对蔡元培的研究，也有所介绍。由于作者力持摒除偏见的写作态度，行文平实细致，议论实事求是，可以说，在现有的各种蔡元培传记中，这是较全面、较信实的一种。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一位学贯中西的“通人”，他思想博大，所涉学科门类广泛。蔡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大致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以其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领导和主持最高权威的教育、文化、科学机构，开创新局面，形成新风气；另一是以自己的著作及其他文件传播文化，昌明学术。对于前者，海内外学人的论述较多，对于后者，则尚未重视。在已出的各种蔡元培传记中，甚少就蔡的遗著作系统的论述，因而人们难以概观蔡氏的学术业绩。这本传记比较适当地介绍了蔡氏的几部主要著作及其影响，并对其所涉各学科的相互关连提出自己的看法。不难看出，“著述概况”一章，可算是这本传记的一大特色。作者还扼要地回顾数十年来学术界研究蔡元培的主要成果与各种观点，为人们了解这方面的学术动态提供了便利。

透彻而确当地了解一个历史人物，殊非易事。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不仅要准确地实录传主的生平与学术成就，还应力求深入传主丰富的思想境界，道出其发展演化的过程。以此来衡量这本传记，还须继续搜集、考证尚待发现的史料，不断补充修正，使其益趋完善。就总体言，此书还是颇具特色，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蔡元培先生的全面了解，并可为人物传记的撰作提示若干有

序

益的探索。

高平叔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PRÉCIS

(英文提要)

This biography of Cai Yuanpei respectfully presented to you is one that the author completed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eality, on the bases of vastly collecting data and carefully using the published scholarly achievements of research as references. Its distinctive point from the former works on the same subject is that it not only more reliably recorded and described the tortuous life of Cai, but also originally expounded his academic views formerly neglect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China inadvertently or consciously it also analysed and apprais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 of Cai's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association.

As is known to all, Cai was a man of the hour with great influence in the intelligensia of the last years of Qin Dynasty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In such a politically turbulent and ideologically confused era, however, he acted as a constructor, striving to introduce the characteristic energy of the Western humanistic spirits into the

native land of Confucius and Monfusius and to construct the necessary academic foundation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He is a reformer, but meanwhile a generally acknowledged model in practising the ethics of Confucianism; he ardently loved education and acadamy, but also maintained very close links with politics. These interesting phenomena are briefly pointed out and evaluated in the Foreword of this book.

Generally speaking, for the biography authors it is difficult to detail the early experiences of the subject. However, this book fortunately explored a wealth of data following the clues provided by Cai's Chronological Autobiography, and therefore could record as detailed as possible such as Cai's family history, experience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early career in education and sojourn in Europe. The author particularly stressed on Cai's developing course for seeking knowledge. The author firmly believed that on the base of the first-hand resources the book's recounting would deepen reader's general knowle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This part of content is included in Chapter1, 2 and 3.

No doubt, the six years during which Cai managed Beijing University was the most brilliant in his life. Chapter4 will recounts and evaluates his experiences in the period with more writing. Distinctively from the angle of view to focus on the struggles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thoughts, this book tried to eluciate the inherent meanings of Cai's reformation in Beijing University in the respect of the natural and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culture, and to reveal the multiple effect of liberal academic atmosphere on education and politics. Considering Cai's famous

proposition of "Incorporating Things of Diverse Nature" was variedly explained, the author tried to confirm that this proposition is identical with his value and attitud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and its universe significance is not limited by time and space. Therefore the points views of which regard Cai's taking this proposition as a means to an end in the struggles of thoughts is challenged.

In his later years Cai held a post i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Nanjing, with a dual identity as a senior statesman of KMT(Nationalist Party of China) and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scholars. Consider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his ideal and the reality, he gradually drifted from the centre of power to edge; however, he treasured up the limited unification of his county, and took advantage of this situation to strive to advance science and acadamy. Chapter 5 will describe such circumstances and mental state of Cai in his old age.

The numerous and jumbled fusion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s Cai's conspicuous character in scholarship, one may well say; his works that had been prevalent very clearly bore the imprints of the transitional times, which are pointed out and appraised in Chapter 6. Whether Cai's writing of Ethics History of China and explanation of Dreams in the Red Tower of his exploration in the fields of Philosophy, Aesthetics and Ethnology without exceptio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s practice in education and social activities. Such acadamic inclination with particular stress on the actual functions in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limited his achievements in the term of theory, his methodology was also not perfect, which finally limited his acadamic influences.

The book attempts to analyse it.

To vividly depict the historical figure, Chapter 7 and 8 will introduce Cai's home life and dispositions. Furthermore the book will record Cai's friendship with the scholars such as Li Ciming, Zhang Yuanji, Wu Zhihui, Zhang Taiyan, Lian Qichao, Lu Xun and Hu Shi, to reveal his especial effect on linking up to two generations of intellectuals rising from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1919.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book the author will review the Cai Yuanpei Studies since Cai's death. The chronological table of Cai's life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is appended.

目 录

总序 张岱年〔1〕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 钱 宏（执笔）〔5〕

序 高平叔〔1〕

英文提要 〔4〕

引言 〔1〕

第1章 从绍兴到北京 〔5〕

1.1 平和少年 / 5

1.2 科场得意 / 10

1.3 在翰林院 / 19

第2章 办学·革命·留洋 〔27〕

2.1 办学之初 / 27

2.2 沪上革命 / 34

2.3 留德四年 / 41

第3章 在民国最初的年月里〔49〕

- 3.1 首任教育总长 / 49
 - 3.2 在民初政争中 / 55
 - 3.3 变动不已的旅欧生活 / 62
-

第4章 主持北京大学的六年〔71〕

- 4.1 “学术至上” / 71
 - 4.2 兼容并包 / 81
 - 4.3 “五四”前后 / 89
 - 4.4 欧美之行 / 101
 - 4.5 “不合作”！ / 108
-

第5章 “党国元老”和学界泰斗〔119〕

- 5.1 元老参政 / 119
 - 5.2 学界泰斗 / 129
-

第6章 著述概观〔142〕

- 6.1 《中国伦理学史》 / 143
 - 6.2 哲学、美学与美育 / 154
 - 6.3 《石头记索隐》 / 163
 - 6.4 暮年倾心民族学 / 171
-

第7章 家庭、品格及交游〔176〕

- 7.1 家庭生活 / 176
 - 7.2 人品及交游 / 183
-

第8章 最后的岁月及其它〔196〕

- 8.1 长眠香港 / 196
 - 8.2 蔡元培研究概述 / 204
-

目 录

附: (一) 蔡元培生平学术年表.....〔213〕
(二) 蔡元培与东西文化融和
..... (美) 戴维翰〔231〕

后记.....〔243〕

引言

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新旧并存，学人蜂起。宋代以来的理学观念，清代盛行的汉学风习，在阵阵欧风美雨袭扰之下，无奈地收缩了地盘；西方的科学技术、人文学说，尾随着剑与火的壮烈和痛苦，始而微弱，继而强劲地涌入这个东方古国。往昔那自古至今传承而来的文化一统天下，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交织着冲突和融合的多元局面。这是一个痛苦反思、重新抉择的时代，这是一个激烈论争，更新过渡的时代。如此的文化氛围造就出一个又一个性格鲜明、思想博大、影响深远的学林巨子。被世人誉为“学界泰斗”、“一代宗师”的蔡元培，即其一。

本世纪初期的二三十年间，举凡学界中人，几乎无人不知有位“蔡先生”。这位生长于清代同、光年间的浙东商家子弟，凭着博学强记和一手“怪八股”的功夫，数年间，奇迹般地由古城绍兴的布衣寒士而跻身于帝都北京的翰林文苑，一时间引来多少寒窗学子的艳羡和敬慕。然而，曾几何时，他

却轻抛功名，挂冠而去，回乡兴办新式教育，随即走上反清道路，来了一个“翰林革命”。继而，又以“不惑之年”，远走欧洲，在德国苦学四年，一展游学西洋的生平宿愿。民国初立，他作为首任教育总长，励行变革，底定共和教育的根基。几年后，他出长北京大学，高擎学术至上、兼容并包的旗帜，将一个沉闷萎靡的官衙式学堂改造成成为焕发勃勃生机的新式学府；由此开创的自由学风，促动了新文化的繁盛，也激发起“五四”风潮的热情，知识界的一代新人即从中育成。及至晚年，他主持国立中央研究院，将“五四”以来喧腾于世的“科学”口号落实为研究实体，面对种种困难，殚精竭虑，不仅组织起一支汇集各类人才的科研力量，而且初步确立了我国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规模和体系。他的这种与时俱进的追求和在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卓著功业，得到中外知识界的广泛推崇和尊敬。

就清末民初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蔡元培可谓极重道德修养，对自身，对公众，莫不如此。倾心求索创造了近世文明的西方观念和文化，并没有使他丢弃早年诚笃信守的传统道德价值。在人们看来，本属相悖的中西道德伦理，在他那儿，却经由择善而从的筛选，得到浑然一体的自然融合。有人说：“他在西洋思想上，把握到自由与理性，在中国文化上，把握着中庸与良心”。或许正是因为受到来自两种文化精粹的作用，他一生砥励私德，力求纤尘不染，同时倡行公民道德教育，致力国人内在素质的提高，追求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想境界。最能反映他这一特点的，莫过于数十年力倡不懈的美育。尽管世运不济，时人亦大多不以为意，但他初衷不改，我行我素。他的这种多少有些超然世外的高风亮节，常令世人感佩不已。“人世楷模”这一赞誉，在他辞世之初，或可视为悼亡的颂词，然而时过境迁，人心非古，却依旧被后人认可，则是一种“大德传世”的标识。

蔡元培早年投身反清革命后，即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但本

质上，他属“学界中人”。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虽然不排除必要时偶尔“骤用兴奋剂”的激烈运动，甚至革命，但就其常态而言，应是渐进的改良，要靠教育和文化，这是振兴国家的百年大计。因此，他的活动重心始终不曾偏离文化教育界，而政治上的地位适足用来保障其文教兴革活动的展开。这就使他虽置身宦海，却不失书生本色。作为一种个人追求，他对中西学术均有浓厚兴趣，曾先后整理编次中国伦理学史，疏证《红楼梦》，而成一家之言，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和美学成果，传播民族学知识并确定该学科的定义和名称……这些工作及其文字成果，倘用严格的学术眼光加以审视，或许算不上是第一流的学术成就，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却带有学科开创的性质，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中国伦理学和民族学才得以立足学林之间。人们普遍注意到他涉足学术的广博性，公认其为学界的“通人”。“他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而是一位通儒，通儒不是样样都懂，而是能通达事理，明辨是非，不固执，无偏见，胸襟豁达而又虚心的读书人。”论者的这段评述，颇为契合蔡元培的实际。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在多元文化的时代里形成大气候。对此，梁漱溟发表过很精彩的议论：蔡先生“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①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谈及蔡先生时，十分肯定地认为，“论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②

①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见《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24—325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

② 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0卷第2期。

古人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说。以此比照蔡元培生平所为，应当说，他在这三方面均有非同寻常的建树，可算得一个“完人”。但从中国近世文化学术的角度细细考量，便不难发现，他在新教育、新文化领域内的功业最为突出：无数人才的培育，诸多改革举措的实施，学术自由风气的开通，科学研究基础的奠立……遍观近世海内学人，蔡元培堪称一位难得的重在“事功”的学界巨子。

那么，他有着怎样的人生，又如何创立卓著的功业？且让我们循着他的生命历程，去探寻他那印在历史上的足迹——

第1章 从绍兴到北京

1.1 平和少年

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一户世代经商的小康之家，父亲蔡光普，是当地某钱庄经理，母亲周氏。

山阴与会稽两县城只一河之隔，明清两代同属绍兴府，民国元年废府，两县遂合为绍兴县。蔡家祖居诸暨陈蔡乡，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迁至山阴，最初以伐售柴木谋生，后来转而经商，主要从事绸缎运销，曾远至广州。到蔡元培的祖父一辈，已是世居绍兴的第六代人了。其祖父名廷桢，字佳木，相传其“夏夜读书，无法得辟蚊烟，竟置两脰于瓮中”，颇具志向。早年在典当商行学徒，渐次升为经理，以平生所得积蓄，为祖宗置祭田，并在县城笔飞坊购置宅院，与子孙合居一处。他生有七子，其中五人经商，一人习武，一人从文，其长子即蔡光普。蔡元培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丁兴旺、三世同

堂的大家庭中。

他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乳名阿培，两岁前后由奶娘陈氏抚育。在同胞兄弟姐妹七人中，小阿培天性详静平和。一次，女佣携阿培兄弟下楼游玩，楼梯高且陡，须由女佣抱下，女佣先抱堂兄，留阿培在楼梯口等候，岂料女佣抱堂兄下楼后适遇他事，忙不迭中竟忘记了阿培。小阿培不哭不叫，端坐楼口静待多时，直到被家人发现。

童年，往往是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梦幻的温馨岁月，这对于生活在古城绍兴的蔡元培来说尤其如此。素以人文荟萃、国学隆盛著称于世的绍兴，自远古至近世留下了多少君王先贤、文人墨客的生命印迹，真可谓俯拾即是，斑斑可考。而每一处斑驳的遗迹，似乎都在诉说着一个悠远而生动的故事，昭示着那绵延不绝的文化遗产……治水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的传说，在这里物化为气势巍峨的大禹陵庙，供千百年来天下人们瞻顾凭吊；曾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王勾践在这里卧薪尝胆，矢志再起，还有那与他联系在一起的美丽动人的西施姑娘和忠诚悲烈的文种大夫，即分别生于斯、葬于此；空怀抱国之志的陆游在这里的沈园邂逅唐琬，写下缠绵悱恻传诵千古的《钗头凤》词。且不去备述撰著《论衡》的王充、“乡音未改”的唐代诗人贺知章、大器晚成的史家章学诚及令郑板桥赞佩得五体投地的徐渭（徐文长）等名家与绍兴的渊源关系，只以蔡元培家居的笔飞坊笔飞弄来说，即充盈着关于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似真似神的美妙传说。蔡元培自述：我家所在的“笔飞弄是笔飞坊中的一弄。相近有笔架山、笔架桥、题扇桥、王右军舍宅为寺的戒珠寺，王家山。相传右军在此的时候，一老姬常求题扇，有一日，右军不胜其烦，怒掷笔，笔飞去，这就是笔飞名坊的缘故。此说虽近于神话，但戒珠寺山门内有右军塑像，舍宅为寺的话，大约是可靠

的。”^①可以想象：在暑热难耐的夏夜，长辈们坐在蔡家台门里，手摇蒲扇，讲述多彩多姿的越乡故事，会启迪蔡元培幼小心灵中怎样的好奇和思智啊！家乡特有的文物优势，使书本上和口碑中的空灵载说变得真切可感；举目即见、抬手可触的人文环境，又令人产生贴近文化精萃的优越心理和近距离感受。耳濡目染于如此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对蔡元培日后的发展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何况，他十八岁以前不曾离开故乡一步，而在此生活的时日竟超过其整个生命历程的三分之一。

1872年，虚龄六岁的阿培进入自家延师开设的私塾破蒙读书了。按照兄弟辈的排名，正式定学名曰元培，家中唯一从文的六叔为他取字鹤卿。塾师是一位姓周的先生，元培跟从他诵读《百家姓》、《千字史》和《神童诗》等开蒙读物，随后便接读四书五经。在读五经之前，先生并不讲解，只要求反复诵读，直至背熟为止。此外，还有习字和对课两种功课。比起那种机械而枯燥的读书方法来，与现今的造句颇为相近的对课更能激发元培的学习兴趣。对课，是由先生出一字，学生对一字，逐渐由一字到四字，须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并且要词性相近。诸如，天对地、山对水（或海），桃红对柳绿或（薇紫）等等。待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即可学作五言诗。这种文字游戏，是作诗为文必不可少的基础，其对应而又富于变化的形式，对聪颖的元培颇有吸引力。其后几年，元培读书渐入门径，开始养成摒除尘嚣静心读书的习惯。某日傍晚，他如往常一样在家中楼上读书，宅内失火，举家惊骇，急呼其下楼，而他因读书专注竟浑然不觉。

元培十一岁那年的夏天，父亲蔡光普病逝。光普为人宽厚优容，供职钱庄往往有贷必应，对拖欠者亦不忍索还，以至家人常以“爱无差等”相揶揄，而友人则赞其“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

^① 《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267页，中华书局1989年。

处。”这一秉性对元培影响至大。父亲的去逝，使元培一家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渐入困顿，亲友们拟议集资救助，却为刚强的母亲婉言辞却。她凭藉乡人主动还回的欠款，并不时变卖首饰衣物，克勤克俭，聊以度日。这一变故，使蔡元培无忧无虑的读书生活发生了某些改变：看着母亲愁苦的面容，这个少年内心隐隐生出家道中落的哀伤，此时，家里无力再聘塾师，只能就近附读。他先到姨父范氏家塾中附读一年，其后又入李申甫塾馆读书。这位李先生教学注重背书，对达不到要求的学生苛责体罚，来此受业的学生几乎都领教过其责罚。一次，元培背诵《易经》屡屡出错，竟被责打手心百余下。正是在这位严师的指导下，元培开始学作日后科举考试赖以显达的专门功夫——八股文。两年之后，十四岁的蔡元培转入离家半里路的探花桥王懋修塾馆继续深造。

王懋修，字子庄，会稽县学增广生员，以精研八股文源流及技艺闻名遐迩，设馆授徒二十余年，其时馆内受业学生不下三十名。元培在其门下求学四年，学业、思想深受其教诲和陶冶。此时，元培已读过四书及诗、书、易三经，删除丧礼内容的《小戴礼记》亦已读罢，正读《春秋左氏传》。加之，在六叔指导下，业已浏览了《史记》、《汉书》、《困学纪闻》等大量书籍，学业根基初立，求知欲正旺，因而颇得王先生器重，对之“策励尤挚”。但这位老秀才严格禁止元培看“杂书”，《三国演义》看不得，《战国策》也看不得，这是因为练习制艺不可用四书五经以外的典故和词藻，总之，未考中秀才之前，读书要切合科举的尺度。但在授课时，王先生却不拘此例，大谈明季掌故，褒贬先人的优劣得失，尤其好讲吕留良、曾静一案，深为其冤屈抱不平。课余，王先生雅好碑帖，时常捧着本《金石萃编》细细翻阅，与友人对答偶或亦以“西厢淫词”相调侃，在学生中传为笑谈。他指导元培作文章，对不合规范之处，并不立即改过，而是

提示错处，令其自改，以利提高。这位王秀才倾心崇尚宋明理学，经常研读各家的著述，不时向学生讲述和考比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哲理主张，并大胆阐发他自己的学术见解。他服膺明代大儒王阳明，尤其崇拜信守气节的明末学者刘宗周（一号蕺山），自号其宅曰“仰蕺山房”。因为“绍兴在清代，受乡贤刘蕺山先生的影响，气节及理学的风气，深入于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方面，述宋儒的绪余，把‘知’和‘行’打成一片。”^①蔡元培在二十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显系受到其业师的熏染，他后来仿行古训，以尽孝道的行为也正是这种教育的结果。

在蔡元培求学的这几年里，其母周氏付出了大量心血。这位中年丧夫、七个子女夭折其四的不幸的妇人，拉扯三个儿子，苦撑家计，其痛楚和艰难可想而知。但她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常以“自立”、“不依赖”等语勉励诸儿，对好学而又悟性很高的二儿子元培督责尤严。晚上，元培在灯下做功课，她常陪坐案侧，直至夜深，有时见儿子困倦难耐，便索性令其歇息，到翌日凌晨即促其起身，补做功课，竟更具效果。从而使元培觉得“熬夜不如早起”，遂渐成习惯。元培十七岁前后，几次参加科考，母亲总是夜半时分即起身烧饭，为之置备行囊。显然，她企望儿子争得功名以改变命运。蔡元培忆述其母道：“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将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用功。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

^① 胡愈之：《我所见的蔡元培先生》，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102页，中华书局1984年。

由，令我们改过。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篾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篾，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①

1886年初春，元培的母亲病故。母亲患的是胃病和肝病，元培信奉先人的做法，刲臂和药侍奉病母，希求消病延年，但劳瘁了一生的母亲还是辞离了人世。元培悲痛之余，执意躬行寝苦枕块的古制，星夜守护在母亲的棺木之侧，以尽为人子息的孝道。居丧期尚未过去，其兄元钐为之订婚，元培闻知自觉大不孝，坚决取消婚约。这一系列严守古礼的“拘迂之举动”，确乎使人看到了一个刻意追求理学风范的仁人君子的形象。显然，蔡元培对失去慈母是深感悲哀的，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善解人意的儿子对母亲所经历的苦难会有更为深切的观察和理解，对母亲的爱和感情则已渐渐升华为一种理智的观念。蔡元培日后投身社会力倡女权，究其根由，倘若不考虑其早年生活中母亲的因素，那肯定是一个极大的疏漏。至于躬行古制，那不过是为表达对母亲深厚的爱所选择的当时社会公认的最佳形式罢了。

此时的蔡元培接近二十岁，这个商人世家的青年，已经走上一条科举求仕的人生之路。

1.2 科场得意

蔡元培踏上科举道路的引路人是他的六叔蔡铭恩。铭恩，字茗珊，县学廪膳生员，工于制艺，兼治诗古文辞，时在绍兴城内招徒授业，略有藏书，是蔡氏族人中世世代代读书登科的第一人。元培自十余岁起，读书作文，得其指拨，受益不浅。

^① 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275页。

此后，元培先后两次参加童子试（即小考）均由六叔送入考场，首次离乡赴杭州应乡试，亦是叔侄二人同行。因此，尽管后来元培先于六叔考中举人，并连登高第，而铭恩只以举人终其一生，但元培对这位长辈和恩师敬重如常，执礼甚恭。

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致力于科举的读书人相比，蔡元培是颇为幸运的，但并非一帆风顺。十六岁前后，他第一次参加小考，“那时候小考分作县考、府考、道考三级。县考正试一场，复试五场。府考正试一场，复试三场。道考由提学史主持，旧时称提学道，所以叫作道考，正试一场，复试一场。”结果考试失败。十七岁时第二次应试，才考取了秀才，主持这一期院试的学台是广东番禺人潘衍桐。考官对其试卷的评语是“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精当，与众不同。”此后两年，元培先后在绍兴城内的姚家和单家充任塾师，教授学童七人，这是其执教生涯的初始。同时，他放胆自由读书，六叔有限的一点藏书几乎被他遍览无遗。其中，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大戴礼记》等经书外，还随意检读有关考据和词章的书籍，诸如《章氏遗书》、《日知录》、《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笺》等等，尤其注力于经学和小学（文字学），并开始学作散文和骈体文，而对研习六、七年之久的八股文却较少问津。这样任意浏览，往往随着兴趣的增加将他引入较为专门的学术领域，例如，“读王伯申氏、段懋堂氏诸书，乃治诂训之学。”然而，使他“最为得益”、“深受影响”的是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俞正燮的《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等几部书。

朱骏声，清代中期文字训诂学家，曾以所著《说文通训定声》一书进呈咸丰皇帝，被赐授国子监博士。该书集前人研究所得，以音韵重组《说文》各字，隶于其所立古韵十八部之下，解字除本义之外，增列转注、假借二项，“凡经传及古注之以声为

训者，必详列各字之下，标曰声训。”是有清一代颇具创见的文字训诂力作。蔡元培认为，举凡清儒治《说文》者，“只有朱氏，是专从解经方面尽力”，其书不仅纠正了唐、宋以来只知会意不谙谐声的流弊，而且更正了许慎本人采阴阳学家言所作的若干不合理的解说，其以音韵列解各字的形式，“检阅最为方便”。章学诚是清代乾嘉时期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积三十年之力撰著《文史通义》数十万言，与唐代刘知几《史通》并称。书内首发“六经皆史”之议，颇多真知灼见，然章氏学说至清末始为世人重视。元培“深服膺章实斋氏言公之义”，尤其赞同章氏先有繁博的长编，后作圆神的正史，以及史籍中的人名地名须详列检目，以备查考等具体主张，奉之为治史的规范。如果说，朱、章的著述对蔡元培的影响还仅限于学术范围，那么，俞正燮的两部书则蔓延到了社会方面。俞正燮，字理初，在清代乾嘉以来的学者中可谓独树一帜，其治学内容极为庞杂，经史诸子自不必说，天文、医药、方言、释典、道藏，乃至边疆问题、鸦片缘起、社会习俗，无不在精研详考之列。且常常于考述之余，直抒胸臆，陈古刺今，即所谓的“穷理尽性”。尤其对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多所针砭，思想守旧的李慈铭就曾说他“语皆偏激”。俞氏的主要著作是《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蔡元培晚年称：自十余岁即接触俞氏著作，“深好之，历五十年而好之如故”，其原因是他“认识人权，认识时代”。俞氏书中“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读了觉得有趣得很”。^①特别是那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深深启动了蔡元培孕含脑际的朦胧意识，成为其男女平等主张的重要思想根源。总之，朱骏声、章学诚的著作使他确立起文字学和史学的基本观念，俞正

① 见蔡元培：《〈俞理初先生年谱〉跋》和《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载于《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404页；第549页。

變的文字，则使他的思想渐趋挣脱理学的羁绊。

1885年中秋时节，十九岁的蔡元培第一次赴省城参加乡试。薄暮时分，登上乌篷船，船行一夜，翌日黎明即到杭州。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呼吸外面的空气。西子湖风光旖旎，考场上却紧张森严。相继六天入居场屋，须作“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五经文五篇；对策问五道”，三场考试结束，刚好是中秋月夜。元培闲坐涌金门外的三雅园茶馆，细品龙井茗香，随后泛舟湖上，漫游彭公祠、左公祠……，尽享这醉人的湖光山色，当会想起“山外青山楼外楼”这诗外的寓意吧！蔡元培此次应试，多少带有些“观场”的色彩，但名落孙山的结果，似乎还是促使他的生活发生了某种改变。第二年，他不再担任塾师，经由同乡先辈田宝祺介绍，到绍兴望族徐树兰府上充当其侄徐维则的伴读，并兼为徐氏校勘所刻书籍。田宝祺，字春农，亦是城中大户，元培的六叔曾在其家任塾师有年。田氏赏识元培的才华，认为可以造就，故推荐给徐氏，使其获得进一步读书深造的机会，因此，元培视田为自己“生平第一个知己”。^①徐氏宅院坐落在水澄巷，距蔡家一里之遥，主人徐树兰，字仲凡，曾任兵部郎中和知府等职，因母病返里，不再出仕，居乡致力于地方公益。徐搜罗碑版甚富，家中建有铸学斋，庋藏图书约四万余卷，且自行编订刻印典籍，至本世纪初，据此扩建为古越藏书楼，声闻海内外。蔡元培二十岁至二十三岁的四年里，在此读书、校书，得以博览，学乃大进。他为徐氏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中的四部书：《重订周易小义》、《群书拾补初编》、《群书拾补补遗》和《重论文斋笔录》以及《铸学斋丛书》若干种。这期间，他的读书已渐从泛滥百家进入学有归旨的境界，据其自述：治经偏于故训及大义；治史偏于儒林文苑诸传、艺文志及其他关

^① 《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276页。

系文化风俗之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治经学偏于大义，与受到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家的影响有关。这段时间，他“读庄方耕氏、刘申受氏、宋于庭氏诸家之书，乃致力于公羊《春秋》，而佐之以太史公书，油油然寝馈于其间。”^①庄存与（方耕）、刘逢禄（申受）、宋翔凤（于庭）是清代乾嘉年间常州学派一脉相承的中坚人物，孜孜致力于今文经学，专治《公羊春秋》，好以微言大意比附现实，初启后来经世致用的端绪。晚清龚自珍、魏源诸人即师承这一学派。此时，元培对今文经学兴趣浓厚，发愿要编撰《公羊春秋大义》一书，足见其受此学派影响的程度。这样的治学取向，与他日后投身社会变革潮流，应当具有某种内在关连。

在徐氏铸学斋伴读和校书的同时，蔡元培与山阴龙山书院、会稽稽山书院均有一定联系。他在书院中偶尔写写八股文，却“以古书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调”，作成所谓“怪八股”。例如，他喜欢用王引之《经传释词》上的古字和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上的古句，以求文章的奇僻古奥，使得常人几乎难以读通，^②但两书院的院长钱篋仙、王止轩却十分欣赏。元培即以这怪异风格的文章参加了其后的几次科举，引来不少趣谈。此外，蔡元培在铸学斋期间，还结交了许多文友，象精熟清代先人掌故的王佐、为人豪爽而又善写桐城派古文的朱芾卿及习武能文的魏彥等人。一班年龄相若的朋友薛炳、马用锡等亦时常来此读书聚谈。青年书生聚在一起，相约编纂大部头书籍，诸如《二十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等等，然而这类

① 《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96页。

② 蔡元培于1920年10月在北京高等学校国文部发表演说时曾谈到：“我有一时作八股文，很喜欢用《经传释词》上的古字，《古书疑义举例》上的古句，好象同人开玩笑一样”。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56页。

宏大的计划往往有头无尾，随议随罢。对于元培来说，这几年读书求友的生活是颇为惬意的。

1888年秋，蔡元培第二次往杭州应乡试，仍未中。翌年春，他与绍兴城内钱庄出纳王荣庭的次女王昭结婚，婚后数月，便第三次赴杭州，参加本年（己丑）因光绪皇帝亲政而举行的恩科乡试。前两次的科场蹭蹬，并没有磨蚀掉他的锐气和个性，运笔自如的“怪八股”在此次考试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竟使乡试房官宦汝梅阅其试卷后断定必是“老儒久困场屋者”所为。而主考官李文田对此却大为赞赏，正是由于这位博通经史校勘金石之学、尤精稔西北地理的主考官的赏识，元培考中了第二十三名举人。同科考取的还有张元济、汪康年、汪大燮、徐仲可、徐维则等。考官对元培试卷的评语为：“不落恒蹊，语无泛设，引证宏博，词意整饬”等。蔡元培的中举在江浙一带士人中颇产生了一些震荡，人们竞相抄录传诵其“怪八股”，目为开风气之作，坊间刻印的怪八股特刊《通雅集》将蔡的文章作为压卷，使许多应试之人群起效仿。当然，正统的八股家们很不以为然，斥之为“文妖”。其实，“所谓怪八股，仅仅多用周秦子书典故，为读书人吐气，打倒高头讲章而已”。这件事，也引起当时学术界上层的些微关注，时在北京做御史的李慈铭阅浙江官版《题名录》时，在全省己丑恩科137名举人中唯将蔡元培及沈宝琛二人的姓名、籍贯载入日记，说明李对元培已有所注意。

按清代科举惯例，恩科乡试的次年，举行恩科会试。刚刚中举才数月的蔡元培旋即于1890年春入京赶考，时年二十四岁。他与徐维则同行，先至杭州，然后到上海，客宿徐氏有股份的北京路某茶栈。在沪勾留数日，游览十里洋场之后，乘招商局轮船由海路北抵天津，换乘内河船到通州，再坐马车进入北京。真是千里迢迢，一路风尘。元培参加了会试的初试三场考试，会试房官王颂蔚阅罢其首场试卷，觉得简直不像是八股文，甚为惊奇，

“及二三场卷，则渊博无比，乃并三场荐之，且为延誉。”元培遂考取第八十一名贡士。清代科举规定：会试考中为贡士，贡士须经复试列出等次，再参加殿试，考中即为进士。而且，复试和殿试的考卷径呈考官，不须誊录，故而比较注重书法。元培没有立即参加同年的复试和殿试，而是在两年之后才补行上述考试，这是何缘故呢？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曾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讲：蔡考完会试即去拜见乡试中举时的考官李文田，进呈会试所作之文，李阅后大摇其头，预言此类怪八股在京城会试中不会有人欣赏，断难考取。蔡闻言，不及发榜即废然南返。岂料其后榜上有名，蔡自是不及回返，李亦大为诧异，后乃悟出定是房官王颂蔚赏识元培所致云云。^①此情况系由颂蔚之子王季烈口述予蒋。但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写到：“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得不好，留待下科殿试，仍偕徐君出京。”^②此说甚明确，但未道及出京是在榜发之前还是其后。近年失而复得的李慈铭《郇学斋日记》（自光绪十五年己丑七月十一日迄光绪二十年甲午元旦）载述了此事的原委。元培一向仰重李氏，在京期间曾数次拜谒。这一年的李氏日记载云：“四月十二日，是日会试填榜……知山阴中两人，蔡元培、俞官圻；嵊县一人：沈宝琛，本东浦人也；又肖山一人，绍府共四人耳。”“四月十三日，蔡进士（元培）来；沈进士（宝琛）来。两生皆年少未习楷书，故不待复试而归”。^③看来，李氏日记不仅核对了蔡自写年谱的说法，而且透露出蔡是在知晓会试结果后决意延期复试的。至于蒋复璁的说法，只能视为一种传说，聊作参考

① 蒋复璁：《蔡元培先生的旧学及其他》，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3期。

② 《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278页。

③ 海波：《关于李越漫〈郇学斋日记〉》，《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3月25日。

而已。

蔡元培返里之后，曾以贡士身份应邀担任刚刚成立的上虞县志馆总纂一职。该馆设在县城经正书院内，他特撰《重修上虞县志例言》，“大抵本章实斋氏之说而酌为变通，名目既不同于旧志，而说明又多用古字、古句法。”尤其是“人物志”部分，“尽革陋规，不辞矫枉过正之诮。”他提出的修志体例，遭到馆内同人的反对，于是又作《罪言》一篇，将自己拟就的编目与明代万历和清代嘉庆时所修旧县志编目列表比较，说明因革，但反对之声仍烈，遂辞职归家。县志馆长朱士黻认为蔡所拟体制“义例精当，卓然成家”，将其《例言》刊于新修县志卷末，用为后人审识。此后，元培仍往徐氏铸学斋读书，读经史所作札记汇为《知服堂日记》一册，日记以节气为标识，自1890年（庚寅）霜降迄次年（辛卯）小暑，历时半年之久，这可能是蔡氏最早的日记。

1892年春，蔡元培再次赴京，补应殿试。经复试后，被列为第三等，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殿试。殿试只考策论，元培充分施展博学强记的特长，对其中有关西藏的策论题详述其“山川道里”，行政沿革，且广征博引，断制自如。本年会试主考官为户部尚书翁同龢，殿试阅卷大臣为工部左侍郎汪鸣銓等。结果，元培考取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本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分别是刘福姚、吴士鉴、陈伯陶，同科考中者尚有：唐文治、叶德辉、汤寿潜、张元济、屠寄和沈宝琛等。蔡元培后来回忆这次考试说：“向来殿试是专讲格式，不重内容的，只听说张香涛氏（张之洞）应殿试时不拘格式，被取一甲第三名。我那时候也没有拘格式，而且这两年中也并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闻为汪柳门先生（汪鸣銓）所赏识。有位阅卷大臣，说此卷的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

都在卷子后面圈了一个圈，就放在二甲了。”^①被称为“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其书法在清季颇受推重。元培幸结其缘而金榜得中，自会感到“出于意外”了。此后又经过朝考，元培进而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短短四年内，蔡元培乡、会试连捷，跻身翰林文苑，其踌躇满志，自不待言。考试结束后，他在京师盘桓近百日，其间一项重要活动是拜谒有关人士。当他与部分同年拜见座师翁同龢之后，颇引起这位帝师的注意，翁氏特录蔡的名姓、籍贯及简历于日记之中，并评赞其“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②此时的蔡元培，经过科举求仕的艰辛跋涉，正可谓青云有路。

“点翰林”之后的第二年，蔡元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游历中渡过的。初夏时节，他先到宁波，又至上海，然后乘船溯长江西向，游览了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此次出游，元培曾有散片日记，载述游踪。秋风乍起之时，他又取道香港来到广州，与在广雅书局任职的绍兴同乡陶濬宣等一班朋友诗文酬酢，观览华南名胜。在广州南园，他戏作该省乡试考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篇，陶为之征得当地名士朱一新、徐琪、吴翊寅的评语各一则，并自作跋文，辑印成《蔡太史拟墨》。其间，陶向蔡讲述廖平在广雅书局时阐发对经学的独到见解，及康有为承其说作成《新学伪经考》，引起士人不同反应等情况，元培对此颇为关注，特意搜求廖、康二人已印行的著作，以备研读。冬天来临时，他又客居潮州、汕头等地，一直到转年的春天才起程北返。关于这次出游，有人视为其走亲访友，隐含“打秋风”之意，即新科翰林到外省鬻文求钱。然而不论怎样，近一年的游历，蔡元培几乎走遍了自1842年以来最早与海外通商的口岸和

① 《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278—279页。

②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七日。

地区，这对于一位由中国传统教育塑造出来的青年士大夫来说，其意义恐怕不仅仅是在补足“读万卷书”的缺憾而“行万里路”，西方近代文明和洋务新政的清新气息足以使他拓展视野，增新观念，从而启动内心深处的某种价值转换过程。蔡游穗期间，康有为正在长兴里万木草堂招徒讲学，士林风气的更变和改革潜流的涌动，元培不可能毫无觉察而无动于衷。尽管上述感受，尚属朦胧意识，但随着世事的变迁会逐渐清晰起来。

1894年春，蔡元培从广东返回绍兴，旋即赴京参加散馆考试。这是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以决定任用的一种考试。应散馆后，元培被授为翰林院编修。至此，不满二十八岁的蔡元培已经达到了为当时读书人艳羡不已的科举道路之极。从偏远古城一个商家少年，到帝王之都的翰林学士，这大跨度的“角色转换”，其间，几多清苦，几多忧烦；几多幸运，几多欢颜！然而，当他刚刚开始供职翰林院的生活时，甲午战争的炮火便轰然响起，这场战争的结局，对中国、对他本人都将产生莫大的冲击……

1.3 在翰林院

有时将一个人的成长与某种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常会发现冥冥之中似乎存在着那么一种巧合和对应，此类联想或许近乎荒诞，但其中往往隐含严肃的内容。蔡元培降生的那一年，即1868年，席卷中国大地十余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风暴刚刚平息，社会生活在所谓“同治中兴”的些微亢奋中迅速回复到传统秩序里，星星点点的洋务事业无碍那年深日久的封建大局。蔡元培自幼受到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正是这一社会总体风貌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缩影。也就是在那一年，东邻岛国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迈出了旨在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近代化步伐。当蔡元培沿着秀才、举人、进

士的科举阶梯步步攀登，逐渐实现读书人的梦想之时，日本民族却被务实求新，“脱亚入欧”的欲念促动着而不断奋进。就在蔡元培跃上大比之巔，遥望青云之路的当口儿，羽翼已丰的“蕞尔小国”竟也学着西洋列强的样子，要用枪炮与大清帝国一比高下了。这场在陆地和海洋上进行的“全方位”的较量，从此更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使蔡元培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道路发生转折。

1894年（甲午）下半年，蔡元培开始了供职翰林院的京官生活。应同乡先辈李慈铭的邀请，他兼任李氏嗣子李承候的家庭教师，为其讲授《春秋左氏传》，同时，还为李慈铭代阅天津问津书院的课卷，平素即寓居李宅。他与在京的浙籍人士王式通、胡道南等人交往密切，经常一起作诗遣怀。其时，中日双方在朝鲜的军事对峙已呈一触即发之势，元培以焦灼的心情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七月二十一日，他在和李慈铭《庭树为风雨所折叹》的一首五言律诗中，“有感东邻兵事”，抒发忧国情怀，并加注云：“越南已折入佛郎西，日本又争朝鲜，藩篱尽撤，能无剥床之惧？”^①此后，他又在日记中写到：“报谓：日人已发哀美敦战书，…据此，则中日已构兵矣。此间杳不得消息，未知若何？”^②甲午战火犹酣的八、九两月间，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屡屡流露出深切的忧虑：“东邻构衅，渤海军兴，…杞忧方大。”“合肥（按：李鸿章）惕日，屡膺严谴，范睢可去，蔡泽何在？鼎折栋桡，殷忧方剧。”^③恨倭寇之焰炽，叹朝中之无人，这就是蔡元培忧愤的心态。10月，帝党中坚人物、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廷式召集院中同人，谋划御敌之策，建议光绪帝“密

① 《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45页。

② 转引自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第6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③ 《致陶 宣函》，《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46—47页。

连英、德以御倭人，”文廷式等37人遂联名上奏，蔡元培与丁立钧、黄绍箕、沈曾桐、徐世昌、柯劭忞、李盛铎、叶昌炽、张謇等列名其间。据说，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亦曾有此类“以夷制夷”之议，不过，翰林学士们的这个奏折显然具有制约李鸿章“待俄使言和”的用意，看来，清流学士更倾向于主战派。蔡元培的主战意向尤为明显，即使在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后，仍然坚持认为：“依宋、聂诸军，经数十战，渐成劲旅，杀敌致果，此其时矣。”然而，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清廷朝纲的极端腐败，使得初出茅庐的青年翰林只能“痛哭流涕长太息”而已。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促使已近“而立之年”的蔡元培认真地重新思考许多问题，而“甲午之后，朝士竟言西学”的大气候，推动他多少有些饥不择食地摄取新学。这段时间，他对京官生活渐趋冷寞。1894年底，李慈铭病逝，李家南归，蔡元培移居京城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第二年夏初，许多朝中人士愤于《马关条约》的签订，纷纷请假离京返里。他的长兄蔡元汾也曾来信，“劝作归计”。此时，在甲午惨败后的灰冷气氛中，元培对闲居京城徒拥虚名而无所作为的状况确有过更张的念头，他甚至写信给在广州的陶潜宣表示：“夏秋之间，拟重游岭表，向茶陵夫子乞广局一席。”^①即向两广总督谭钟麟谋求广雅书局之职。到了这年冬天，他便请假一年，返居故乡。归途中，特赴南京，访谒了张之洞，适值康有为会试时的房师余诚格也在场，张氏盛赞康“才高、学博、胆大、识精，许为杰出的人才。”蔡访张，可能是礼节性拜会，但对这位封疆大吏称许康有为的言论，却留下深刻印象。蔡元培曾以读书人的眼光，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著述中为阐发己见而不惜曲改史籍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① 《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53页。

可是对不久前康氏发起“公车上书”的壮举又十分赞佩，此番听得张之洞的赞康之词，当会深切感触到甲午以后社会风气正在发生的变化。

1896年，在绍兴赋闲的一年里，蔡元培广泛涉猎了大量译本书和新学著作。此前，中日战争进行之际，他在北京即阅读了顾厚琨的《日本新政考》和李小池的《环游地球新录》等书，对日本几十年来的变化和 world 情势产生兴趣。在家乡，他又先后浏览了日人冈本监甫的《日本史略》、沈仲礼的《日本师船考》、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华蘅芳的《算草丛存》以及《游俄汇编》、《电学源流》、《电学纲目》、《光学量光力器图说》、《声学》、《代数难题》等等。一位饱读经史的翰林学士，肯于静心研读这些学科广泛、内容生涩的各类书籍，足见其渴求新知的急切。后来，他曾总结自己三十岁前后的治学路径说：“少耽举业，长溺文词，经诂史法，亦窥藩篱，生三十年，始知不足”，“未尝不痛恨于前二十年之迷惑而闻道之晚”，决意“迷途回车，奚翅炳烛”。^①由此不难测度蔡元培此时站在中国传统文化厚实的土壤上，遥望“西学新知”那别有一番洞天的景象时所怀的心态。从这个时候起，他的治学重心渐渐偏离经史词章之类旧学，而对戊戌前后风行于知识分子中间的新学新书产生强烈的求知欲。闲居家乡的一年，除读书之外，便是与学友交游，主要有何琪、薛炳、徐维则、徐尔穀、陈星衍等。这期间，蔡元培写了大量“酬应之作”，计有祭文、墓表、室铭、楼记之类，大概是“翰林公”为家乡所尽的义务吧；也写下许多七言律诗，仅七绝《题铁花灯》一诗就达十六首之多，堪称蔡诗中仅见的长诗。元培文笔

^① 见《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和《学堂教科论》，《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96页；第139页。

古奥艰涩，其文如此，其诗亦类此，因而流传不多，然诗中偶有“神句”，读来耳目一新，即如前述长诗中便有“人生识字始生忧，百感茫茫不自由”之句，颇堪玩味。11月间，元培的长子阿根出世。年底，他自陆路乘马车赶回北京销假，此行艰苦备尝，但“闻见特新；作诗颇多。”

1897年的北京，喧腾着改良思潮的热浪，《时务报》、《国闻报》等倡扬变法主张的报刊源源流入，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等在京各省人士发起的维新团体纷纷成立，这股浪潮的始作俑者康有为再次入京，接连上书，积极奔走。……维新变法，正在由舆论鼓动演变为政治运作。置身其中的蔡元培，虽然没有付诸直接行动，但就其内心倾向而言，是与这场社会变革灵犀相通的，即其所谓“维新党人，吾所默许”。在书写着“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的京寓中，他研读早期改良派人士的著作，深入探求新知。读罢郑观应《盛世危言》后，他写道，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阅完马建忠《适可斋纪言》四卷，他评论道：“其人于西学极深，论铁道，论海军，论外交，皆提纲挈领，批却导窾，异乎沾沾然芥拾陈言，毛举细故以自鸣者。”他还通览了驻英公使馆参赞宋育仁撰写的《采风记》五卷，认为“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遂欲以古制补其未备，以附于一变主道之谊，真通人之论。”^①上述心得，表露出蔡元培对方兴未艾的改良运动进行思想探源的某种努力，他欣赏对于西学融汇贯通后的深刻阐释，鄙薄浅尝辄止的浮泛议论，而且，从接触西学的初期就显示出他有意将中西文化相比附相攀援而不是相对立的思维取向。这种思想风格，在他以后的岁月里一再表现出来。

同年初夏，王夫人携幼子来京，蔡元培移出会馆，同家眷暂

^① 转引自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第8—9页。

居“方略馆”，不久迁入绳匠胡同寓所。与家人团聚，使元培的京官生活更为安定，闲暇时日，携妻伴友，游览京都胜景，平添许多情趣。然而，京中报纸上传载的消息却不断扰攘着他的心境：11月，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占胶州湾；12月，俄国军舰强行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湾；英、法列强亦提出类似要求，逼清廷就范。元培痛感清政府不谋自强，却一味回旋于列国之间，企望“以夷治夷”，竟致顾此失彼，丧失主权。他在日记中不无愤懑地写道：“吾中国近二十年仿范睢远交之策，甚睦于德，近又推诚于俄。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①近观京中大小官员，平庸苟且之辈居多，整日钻营名利，置国难于不顾。元培的心绪不时为闷怨和痛苦所笼罩。因而，与同僚或友人宴饮，时常酩酊大醉，醉后甚至大骂同座。他曾自述：“我父亲善饮，我母亲亦能饮，我自幼不知有酒戒。……到北京，京官以饮食征逐为常，尤时时醉。”^②世人恒视元培为恪守礼仪之谦谦君子，殊不知其青壮年时亦偶有豪放之举，人的性格本来就是复杂多面的，元培性格中这一侧面的显现，以此种境地论之，亦属情理之中。这一年，蔡元培参加了在保和殿举行的旨在选定各省主考学政及会试考官的一次考试，他一如前例，“仍以常人不易了解之文应之”，而“毫无得失之见”。看来，元培获得了会试考官资格，所以翌年其六叔蔡铭恩来京应试之时，他按例请求回避，以免其叔不能应考。

进入1898年，京城内的维新气氛更为浓烈，蔡元培也已不满足于只读中文译本书，而希望学习外文，扩大求知范围。他的好友，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在琉璃厂开设了通艺学堂，专授英语。同时，他的另一友人刘树屏在内城设立专修日文的学

① 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第9页。

② 《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281页。

馆。元培选择了后者，他认为日文易于速成，而且西文要籍均有日文译本，通日文即可广览西学书籍。借助刘氏的日文学馆，他进而与王式通等组成东文学社，聘师辅导。元培径直从日文译汉文入手，先后试译了《万国地志》序及《俄土战史》等数页，渐渐“文从字顺”，而对日语则不甚了了。这种读、译日文的本领，使蔡元培日后受益非浅，甚至不妨说，这是他最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的外文工具。六月，“百日维新”拉开了帷幕，光绪皇帝的上谕一道道颁布，而积习深重的官僚们却敷衍搪塞，等待观望。蔡元培赞同变法，同情维新志士，他与梁启超还是己丑乡试同年，但在康梁炙手可热之际，读书人的孤傲和自尊，使他“耻相依附，不往纳交”。置身局外冷静观察，加之数年京官生活的实际体验，使他深知社会守旧势力之强大和维新变法之艰难，而对某些参政伊始便露轻佻之态的新派人物，他也颇反感，认定其“不足以当大事”。有记载谓：新政期间，诏开“经济特科”，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之特殊人才，蔡因供职宗人府的同乡葛宝华荐举而前往应征。^①此说如确实，则是蔡元培与新政的唯一关联。

九月，宫廷政变的消息传来，戊戌新政恰如一场春梦，在血雨腥风中骤然消散。官场仍旧昏聩，民智依然未开。蔡元培悲愤之余，痛切感到：“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固，不能不情见势绌。”^②他赞赏谭嗣同的铮铮铁骨，视为自己的“先驱”，尤为痛恨满清贵胄庸误国，其激切之情溢于言表，竟致引动顽固派掌院大学士徐桐的视听。往昔热心维新的友朋早已风流云散，即使行事稳健

① 见陶英惠编《蔡元培年谱》上册第65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出版。

② 《口述传略》上，《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20页。

的好友张元济也被革职出京，永不叙用。京官生活已无可眷恋，蔡元培决意另僻新路，施展抱负！

同年 10 月，蔡元培请假离京，举家南归，实际上放弃了京职，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

第2章 办学·革命·留洋

2.1 办学之初

1898年深秋时节，蔡元培回到故乡绍兴。比起秋风瑟瑟，一派肃杀景象的京城来，家乡显得格外温馨、平静、怡然。伫立在笔飞坊自家庭院中，四周的一切似乎依旧是老样子，惟独那块悬挂在门厅上方的“翰林第”匾额，好象在提示主人这里曾经历过荣耀与辉煌。然而，耀祖光宗的记忆在闯荡大千世界和领略新知西学之后，早已失却原有的华彩；四年京官生活的风风雨雨也差不多荡尽了仕途腾达的残梦，所余下的只有那纯然属于自己的书生本色。此时此刻，萦绕脑际多时的投身新教育的念头变得清晰而强烈，这是自身特长和兴趣之所在，这也是目睹维新党人惨烈失败后所认定的一条报国之路。就这样，蔡元培怀抱“志以教育挽彼沦胥”的信念，决意踏上教育救国的漫漫途程。

回乡一个半月之后，蔡元培接受绍兴知府熊再莘和乡绅徐树兰的敦请，出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

(即校长)。该学堂是由徐氏捐资并筹得部分府衙官款于1897年初创立的,校舍即在龙山脚下古贡院西侧,约有学生三十人左右,略如后来的高小至中学程度。所习课程可谓中西混合,既有经学、词学、史学,又有物理、算学、外文,教师亦多为当地俊彦,在当时,这已是一所颇为维新的学堂了。蔡元培到校后,聘任教职人员,修订学堂章程,整理校藏图书,并“移寓学堂”,主持校务。外语课程原有英、法二种,他增设日语,展转托人延聘日籍教师中川外雄来校任教。同时,鼓励课外阅读,对《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及维新志士的著作予以“解禁”,以扩大师生的阅读范围。他还以“究心学术,不沾沾于利禄”等为条件,邀集校内同人,分别编写各类课程的教科书。兼任学堂督办(校董)的徐树兰欣然应允出资刻印。此外,他设法求购理科教学需用的仪器、标本和教具,旨在提高这方面的教学水平。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和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此时均为该学堂低年级学生。据蒋氏回忆,中西学堂的课程虽然中国旧学居多,毕竟已有西洋学科,正是在此知晓了地圆说、雨的形成及燃烧的原理,“这是我了解一点科学的开端”。^①藉此亦可知当时所谓新教育的初期概貌。

在中西学堂任职期间,蔡元培得读严复的译著《天演论》及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书,他在1899年初笔录下书中要点。严译著作使他对西方社会学说的了解更加系统,思想认识也跃上一个新高度。他曾自述:“得阅严幼陵氏之说及所译西儒天演论,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洲氏、龚定庵氏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拔

^① 蒋梦麟:《西潮》第42—43页,香港学风出版社1959年。

云雾而睹青天。”^①可以说，在蔡元培探求新知的过程中，严译诸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将严复与谭嗣同并列，视为自己的引路人，即所谓的“候官浏阳，为吾先觉。”这段时间，他特别喜好以《公羊春秋》的三世说阐释进化论观点，从而将自己早先颇为倾心的“常州学派”的论点与风行当时的西方进化论观念嫁接起来，以此求得外来学说的可接受性，也达成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平衡。这大概就是上述所谓“拨云雾而睹青天”的境界吧。与此同时，他仍孜孜于外文学习，读、译日文书《日清战史》和《生理学》，并开始自修英文。

随着探求新知过程的深化，蔡元培的社会政治态度也逐渐改变。从黄宗羲到全祖望，以民族大义一以贯之的浙东学派对他颇有影响，面对外侮频仍的严酷现实，其内在的民族激情必然有力冲击现存的法统观念，表现出一种不甚确定的政治激进。据当年的学生忆述：1899年的一个秋夜，中西学堂宾客云集的花厅内杯盘交错，酒酣耳热之时，蔡先生起身高声批评康梁变法不彻底，提出欲谋变革非摒弃满清而不足为。于不经意中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排满意念。虽然此后不久他也曾列名经元善领衔阻止清廷立储废帝的通电，但数以千计的人参加的社会活动难以真正衡量一个人的微妙的内心倾向。就在“己亥废储”活动声振东南之际，1900年初，蔡在致徐树兰的辞职书中又一次显现出“叛逆”情绪：“元培而有权力如张之洞焉，则将兴晋阳之甲矣”^②。颇有取清而代之之概。尽管其间不无冲动成份，但确可看出其君臣大义的观念已十分淡漠。这样说，并非将此时的蔡元培与革命派等量齐观，只是意在说明其社会政治态度变化的程度。

^① 《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96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91—92页。

中西学堂的教员中，存在新旧两派。新派中有马用锡、杜亚泉等，他们信奉进化论，不时诋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社会积习，招致薛炳、任秋田等旧派的反对。蔡元培明确支持新派教员，旧派不服，请来学堂督办徐树兰出面干涉。徐是老辈，自然赞成旧派观点，遂将《申报》所载清廷旨在压制新思潮的“正人心”上谕送来，请蔡恭录悬于学堂。蔡致书痛诋，并愤而辞职，后经多方斡旋，终回校复职，直至同年10月学堂暂时停办始离去。这期间，他还兼任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和诸暨丽泽书院院长，为时均一年。在前述辞职风波中，他即赴嵊县，在剡山书院演讲数次，并为之撰订书院学约。在这篇文字中，这位翰林公初次提出，治学“当以益己、益世为宗旨”，士人应当摆脱“应试求官之积习，而急致力于有用之学”，并以自己读书求学的经历现身说法，策励读书人适应时代的变迁。此学约实为研究蔡早期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惜之以往论者对此甚少留意。此外，蔡元培还曾以乡贤身份受聘兼任嘉善县宁绍会馆董事，几次前往襄理馆务，对会馆的注册立案及拟订规章尽力颇多，成为他办学之外的一项社会公务。在此期间，蔡夫人王昭病逝，年仅三十五岁，元培悲痛之中撰悼文一篇，哀祭亡妻。

1900年10月，蔡元培离开绍兴中西学堂，前往杭州筹办师范学校，虽几经奔波，终无结果，但由此结交了不少浙省学界人士。他与养正书塾教员陈黻宸（介石）、林少泉（即林白水）、陈叔通等时相过从，并进而结识了该书塾的学生汤尔和、马叙伦。同时，又与当年颇有些维新思想的“浙东三杰”之一宋恕密切往还，其时，宋任教于求是学堂。蔡与章太炎之交谊也自此时始。蔡为绍兴同乡筹建小学事，与友人童亦韩由杭州往临安，途经余杭，遂登门造访章太炎，童与章本故交，便介绍元培与太炎相识。这时，章氏所撰《馗书》第一版已印行，其排满思想毕现无遗，蔡主动访章，当与获读此书有关。1901年上半年，蔡元

培时常旅居上海，广泛收集各类新式学堂的学制和课程设置等资料，潜心研究，撰成《学堂教科论》，由杜亚泉开办的普通学书室印行。其间，他与蒋智由、叶翰、王季同、汪允宗等一班文化人过从颇密，此时，蒋主编一种文摘性质的《选报》，王、汪等人则在办理由蒯光典拨资，专以刻印严译书籍为务的金粟斋书坊。同年8月，蔡元培应澄衷学堂监督刘树屏之邀前往协理校务，一个月后经刘介绍，进入南洋公学担任特班中文教习。

南洋公学是由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一所兼备初、中级教育和专科教育的近代学校，校址在沪西徐家汇，即今交通大学的前身。义和团事件后，清廷励行“新政”，时任会办商约大臣的盛宣怀采纳沈曾植的建议，决定在公学内开设“特班”，专收优于国学、年力强健者，授以西学，以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特班章程规定：“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蔡元培即负指导之责。他参采书院方式，确定选修门类及应读书目，学科涉及政法、财经、哲学、文史、外交、教育及自然科学，由学生任选一至两类，定期送交读书笔记，并轮流与学生谈话，当面指导，每月出题考核。特班学生近四十人，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已有功名者不乏其人。蔡元培常在课业评语和谈话中向其灌输民权观念及爱国思想，启发他们放眼世界大势，炼就真才实学。同时还主动教授日文，组织演讲和辩论，激励学生培养多种才能。他为人师表的良好风范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方式深得学生的敬重。特班生中颇受蔡元培赏识的有：邵闻泰（力子）、王世徵、胡仁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贝寿同等。

此时，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蔡元培常向这位同年好友借阅西学书籍和日文资料，彼此不时彻夜长谈，甚为契合。二人商定：邀约同道合资创办一份报纸，向国人译述外国报刊对中国的评论和报道，初名为《开先报》，后改称《外交报》。蔡撰写该报《叙例》，阐明宗旨：“荟我国自治之节度，

外交之政策，与外国所以对我国之现状、之隐情，胪举而博译之，将以定言论之界，而树思想之的。”此报于同年10月发刊，张任主编，蔡撰写论说、翻译日文稿件。不久，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并向其主办人夏瑞芳建议设立编译所，以拓展事业。翌年，编译所成立，张推举蔡兼任所长，负责组织编写新式学校的各类教科书。蔡元培积数年办学经验，详订编纂体例，并约请蒋维乔等分别编撰。这是蔡与商务印书馆数十年合作关系的开端。在此期间，蔡元培编选的三卷本《文变》一书亦由商务代印。此书选入文章四十二篇，近人之作居多，且广泛涉及当时知识界普遍关心的社会、政治、文化、伦理等问题，诸如《中国士流改进策》、《论义和团与新旧两党之相关》、《清朝兴衰之关键》、《男女婚姻自由论》、《女子啻宜自立论》等等。所选少量古人作品亦“于新义无忤”。虽然此书的用途是为科举改八股为策论后取代昔日的古文选本，但编者的主旨是使“读者寻其义而知世界风会之所趋。”编印此书，反映出蔡元培在文化教育领域锐意求新的思想风貌，与他这时的社会政治立场似乎没有多少直接关系。

1901年冬，蔡元培与黄世振女士在杭州结为伉俪，随后夫妻寓居上海。与他们时相往来的蒋智由、黄宗仰、林白水、陈范及吴彦复等常偕女眷聚谈，“众议教育之根本在女学”，于是发起筹建女子学校。此举在当时可谓开风气之先，阻力自然不小。延至第二年9月间，方正式创办爱国女学，租校舍于登贤里，经费由黄宗仰介绍犹太富商哈同之妻罗迦陵独力承担，蒋智由被推为校长，学生仅十余人，主要是发起人的妻、女。同年12月爱国女学开学，此时，蔡元培已接替去日本的蒋智由担任校长。爱国女学的创立，在上海颇有影响，带动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至于这所女子学校自身规模的扩大及其在反清革命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那是1903年以后的事情。在筹建女校过程中，蔡

元培与叶瀚、蒋智由、钟观光、黄宗仰、王季同、汪允宗等于1902年4月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会址设在上海泥城桥外福源里，蔡元培被选为事务长（会长）。该会是在废八股兴学校的“新政”气氛中应运而生的，最初以完善新教育、编订教科书为己任，曾拟议印行刊物，进行通讯教学。其后，又曾计划设立学校教育部、社会教育部和实业部等机构，其宗旨亦随主持人思想的变化而屡易。教育会的种种计划基本上未能付诸实践，但在后来组建爱国学社过程中却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高涨，该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蔡元培作为中国教育会的核心成员，在该会各项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2年夏，蔡元培利用暑假赴日本游历，这是他第一次跨出国门，同行者为高梦旦。到东京后，正值新任北京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在此考察教育，蔡、高曾与之晤谈。此时，中国留日学生中流动着的爱国与变革的热潮给蔡元培以很大感染，尤其对主撰《浙江潮》杂志的“浙江二蒋”——蒋百里和蒋伯器留下深刻印象。蔡预备在日本逗留一个月，由于发生吴稚晖被日警押解出境之事，遂提前回国。吴稚晖，名眺，又名敬恒，江苏武进人，曾在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任教，此时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由于清驻日公使蔡钧无理拒绝来自江、浙等地9名自费留学生进士官学校学习的要求，吴与孙揆均率学生到公使馆请愿，蔡钧招日警予以弹压，吴、孙二人被拘后，又强行押解上船，迫令回国。蔡元培早先从杭州方言学社主持人许沅那里闻知吴稚晖在南洋公学训练学生颇有成效，即对其人予以关注，1901年冬，二人在南洋公学相识。此时，为防止吴等归途中发生不测，蔡主动登船护送，一齐返沪。蔡、吴二人性格迥异，但在思想情趣方面颇多一致，不妨说，吴是蔡众多朋友中能对其施予较大影响的一人。

从日本归来仅数月，便发生了南洋公学退学风潮。这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在当时虽堪称一流，但校政管理却仍停留在专制顽钝的水平上，尤其是有些教员思想守旧，“以奴隶对学生”，颇不孚人望。而学生方面日益受新思潮浸染，业已萌发自由自主意识。这种观念反差终于在一次偶然事件中发展为公开抗争。11月中旬，第五班学生误将一墨水瓶放置在讲桌上，国文教习郭某发现后严厉追查，并处罚无辜学生，激起全班义愤，一致要求校方辞退郭氏，校方反以“聚众滋事”的罪名无理开除全班学生。这就激怒了包括特班在内的全校二百多名学生，遂相约全体退学。蔡元培同情学生，曾向学校当局交涉，以改变无理决定，但有人视学生此举系蔡平素提倡民权思想所致，在此情况下，他毅然辞职。随后，他将一部分退学学生组织起来，商得中国教育会同人的赞同和支持，分别募集款项，聘定义务教员，借教育会房舍，创办起爱国学社，他被推举为学社的总理（即校长）。该学社于1903年初正式开学。

爱国学社的成立，是蔡元培为新教育奔波数年之后，相对独立地创办起来的一个教学实体，在此尽可自主地贯彻教育救国的初衷，随着一批反清志士的加入和客观形势的推动，他“遂亦公言革命无所忌”，开始了一段激昂慷慨、“翰林革命”的历程。从而，使这位“恂恂儒者”增添了一层豪勇壮烈的色彩。

2.2 沪上革命

——十世纪初的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发展最快的通都大邑，——常能独得风气之先。十里洋场，鱼龙混杂，信息灵便。戊戌政变后，国内仁人志士大多聚拢于此，各谋其宏愿。海外反清力量于庚子以后势焰渐炽，亦凭借沪上的租界联络同志，展开活动。大批文化人更是在这里办报兴学，倡扬各类新式学说，进而幅射于内地各省。蔡元培以学界闻人身份，在此天地中，由爱国

义愤而倡言排满，终至主持团体，密谋革命，为时虽短短三、四年，却因此而决定了他后半生的政治归属。

蔡元培等人主持的爱国学社，其活动主要集中于1903年上半年。该学社有意仿效日本西乡隆盛等人当年的办学主旨，“重在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学社教师基本由中国教育会成员和本社高年级学生充任，其中，蔡元培讲伦理学，吴稚晖授天演论，章太炎教高级国文。此时，太炎已加入中国教育会，其上课“多述明清兴废之事，意不在学也。”学社学生完全自治，凡事须众议始决，自由空气甚浓，与官立各校的压制学生适成对照。事实表明，爱国学社并非一般教学机关，而更象是兼备讲习和革新的社会团体。这期间，蔡元培政治热情极高，自号曰民友，“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自是年2月中旬开始，他与教育会同人率领爱国学社学生每周到张园举行一次演说会，评析时事，发表政见，逐渐产生广泛的社会反响。3月以后，他们与留日学界遥相呼应，先后发起拒法、拒俄运动，揭露广西巡抚王之春以出让桂省路矿权为条件借助法国军队平息哥老会之乱的卖国图谋，抗议沙俄政府无视国际协议拒不撤兵而侵占中国东北的蛮横行径。蔡元培在张园这一讲坛上，屡屡发表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说，以警醒国人奋起御侮，并提议成立有关组织，协调行动。随后，爱国学社仿东京留日学生之例，成立拒俄义勇队，后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开始进行军事操练。三十六岁的蔡元培剪短头发，脱去长衫，与学生共同演练，躬身实践其“尚武求强”的主张。爱国学社上述种种活动，使其在社会上名声大振，几乎成为“国内惟一之革命机关。”4月，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和杭州求是大学堂接连发生退学风潮，蔡元培、吴稚晖等致电或撰文对学生示以同情和支持，并协助章士钊等三十余名陆师学堂退学生转入爱国学社。

张园演说日益显露出来的反清革命情绪，引起顽固之辈的极

端反对，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亦持反对论调。因此有人主张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须有自己的机关报，以为喉舌。同时，爱国学社成立之初经费拮据，教职员大多纯尽义务，生活来源一般另有所依，蔡元培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职，吴稚晖则任事于文明书局，章太炎亦靠译述取酬，至于理科教员几乎均由科学仪器馆人员兼任。显然，筹谋经费为爱国学社活动所必需。当官立各校学潮此伏彼起之际，陈范主办的《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一栏，详予报道，颇令世人刮目。由此，教育会及学社遂与苏报馆合作，商定由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七人轮流每日供评论稿一篇，报馆每月为爱国学社助银百元。这样，蔡元培等人反满兴汉，倾向革命的思想主张便通过新闻媒体广泛传播，其影响所及远胜于张园演说。《苏报》本为上海的一家小报，1896年创刊时在日本驻沪领事馆注册，戊戌年间，曾在江西任知县的陈范因教案被革职后迁居沪上，接办《苏报》，始而宣传维新变法，继而趋向反清革命。他与蔡、吴等人的联手，至使其《苏报》得获彪炳史册之誉。蔡元培为《苏报》所撰文章，大多已不可考，仅知者为《释“仇满”》一文，发表于1903年4月11、12日。其时，革命志士中排满情绪甚烈，寄居爱国学社的邹容等人甚至主张“驱逐住居中国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蔡文即对此而发。文章以平和的笔调论证汉满两族在血统和习俗上渐趋同化的事实，认为，所谓“满洲人”实乃政治特权之符号，其特权有三：世袭君主，驻防各地，不治实业。而“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也。”文章批评了那种“无满不仇，无汉不亲；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的狭隘偏执的“种族之见”，同时，也坚信“世运所趋，非以多数幸福为目的者，无成立之理；凡少数特权，未有不摧败者。……民权之趋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可见，他热心革命的同时不失冷静求实的态

度。不过，此论为反满兴汉的热潮所淹没，当人们发现其认识价值，已是时过境迁的辛亥以后了。

爱国学社的活动及《苏报》的放言高论，招致清廷及其督抚大员们的忌恨。从他们之间的公文往来和信函中可知，张园演说伊始，便引起有关当轴的密切注意，及至沪上拒法、拒俄运动兴起，官方即密令“查禁拿办”。清朝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进而将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陈范、章太炎等列为辑拿的首要对象。可以说，清朝当局旨在严厉纠弹革命志士的图谋一直在酝酿和布置。由于碍于外国租界的特殊法律，只得曲折间接地进行。租界工部局数次传讯蔡、吴诸人，名为核实情由予以保护，实则反映出清官方压力的增强。随着邹容《革命军》一书的刊行和章太炎为之所撰序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在《苏报》的发表，终于引发一场轩然大波。而此前，在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之间却出现了内部分裂的迹象。学社知名度不断提高，经济状况随之改观，学生们不甘于仍由教育会代管财务，即欲求独立。5月间，矛盾渐趋公开化，倾向于教育会者认为学社乃教育会之一部分，而学生方面则发表文章，表明：会、社实为平行的两团体，均曾相互赞助，学社的主人即学社自身，与教育会不存在隶属关系。此时已改任教育会副会长的蔡元培对于学生大感失望，鉴于往昔梁启超与汪康年争办《时务报》，而相互损伤致貽敌视者以口实的教训，便与会长黄宗仰商洽，听由学社分立，黄亦赞成。不料章太炎持反对态度，吴稚晖却偏袒学生。从诸多情况分析，在爱国学社各项活动中，吴颇具影响力，从发起张园演说，到倡办机关报，甚至力主改选能够筹措经费的黄宗仰为教育会长，均由其推动，致使素与不睦的太炎斥其为篡权之宋江。会、社分立加之章、吴矛盾，使得蔡元培心灰意冷，此时官方欲行弹压的风声日急，他终于接受兄长及亲友们的再三规劝，于6月中旬辞去各项职务，前往青岛学习德语，准备赴德深造。半个月之

后，震动海内的“《苏报》案”发生，《苏报》封闭，章太炎、邹容被拘判刑，其他人逃避星散，爱国学社亦无疾而终。

这场被称为“癸卯大狱”的镇压行动，显然系清官方与租界当局合作所为，目的在扼制日益高涨的反清革命运动，但在“结案”过程中仅以文字证据定罪，涉及范围便大大缩小。王朝末世，人心涣散，清政府官员已非铁板一块。如果说两江总督魏光燾面对革命活动却“行同聋瞶”还属某种疏忽，那么奉命赴沪查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则明显地力求大事化小、网开一面，蔡元培能够远走青岛和“苏报案”发及定案后“不涉子民”，似乎均与此有关。在青岛期间，他经由陈范腾书面介绍，跟从《胶州报》主人李幼闾学习德语，后又师从李推荐的一德国教士继续学习。蔡元培此时已对西洋哲学发生浓厚兴趣，他将留学国度定为德国，即由于那里是近代哲学的发祥地。在青岛，尽管心绪不宁，又缺乏必要的参考书，他还是将德国人科培尔《哲学要领》一书的日文本转译为中文，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①大约在同年秋冬之际，蔡元培应家人电召返回上海。亲友先前应允集资助其留学实为促其离沪之计，此时沪上虽仍有谣传，但危险基本过去，留学之议遂搁置，蔡仍为《外交报》译日文以维生计。经此番历练，他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方式变得策略而隐蔽，但涉足革命的程度愈加深化。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虽受冲击，却依然存在，他藉此联结同道继续开展活动。同时，定期看望狱中的章太炎、邹容二人。是年冬，沙俄军队强占奉天，拒俄风潮复起。12月，蔡元培与刘师培、叶瀚等人在静安寺愚园发起成立“对俄同

① 有种说法谓：蔡曾由青岛入北京，在同年刘焜帮助下，易名在译学馆任教，因学部侍郎严修有所顾虑，复离京南下。（见芝翁：《蔡子民的襟抱与风格》，载于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出版的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第1557页）此说有待其他材料核证，姑且存录。

志会”，并与陈镜泉等合作创刊《俄事警闻》日报，谋划和宣传拒俄运动。

《俄事警闻》初由王季同主编，蔡元培撰述论说兼译日文稿件。该报不用清朝年号，而以干支纪日，附注西历，文体亦兼采白话，颇有报界革新之势。鉴于《苏报》之祸，该报并不直言革命，而以民族激情启迪国人。总计印行七十三期，至1904年2月，由于日俄战争爆发，遂扩大版面改名《警钟》，由蔡元培主编。这份扩版后的刊物，“一面要国人鉴于日俄之争，即时猛省，一面译登俄国虚无党的历史，为国人种下革命思想。”蔡主编《警钟》，连续数月刊载日文译稿《俄国虚无党源流考》，与该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的既定宗旨有所悖离，可知其仍“不免直接谈革命”。蔡主撰该报近半年之久，其间，除每日撰写文言和白话论说各一篇外，还要负责编务、印刷乃至发行，且常常为经费不济所困。但他意志坚韧，独立苦撑。这段办报生涯中蔡的代表性文字，是1904年2月中、下旬连载于《俄事警闻》最末几期上的白话小说《新年梦》。小说以朴实的笔触记述主人公“中国一民”在新年之际悠悠入梦，想望六十年后中国强盛康乐，人类步入大同境界的美妙图景，情节融写实和虚构于一体，通篇寄寓了作者的爱国忧思和追求理想社会的情致。蔡元培自述：“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子民深信之，……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①应当说，这篇文字十分清晰地反映了蔡此时的社会政治主张和思想取向，它在清末知识界有一定的代表性。正是在主撰《警钟》期间，这位前不久还自号“民友”的志士已经意识到“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遂从《诗经·大雅·云汉》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各取一字，改号孑民，以示救亡图存的志向。

^① 《口述传略》上，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25页。

1904年7月，蔡元培重新担任爱国女学校长，于是辞去《警钟》日报的职务，由汪允宗接替。在此前的5月间，他受同人推举，复任中国教育会会长。此时，南方革命党人谋划武装暴动，反清革命跃入新阶段。蔡元培深受俄国虚无党（主要是民粹派）的影响，认定暗杀是改变社会政治的一种迅捷有效的方式，因而当留日学生组织暗杀团派何海樵来沪活动时，他随即加入这一秘密团体，并租赁房屋，介绍同志，共同试制炸弹。参与这一活动的还有杨笃生、苏凤初、钟观光、王季同、俞子夷及章士钊、陈独秀等。清末吴樾刺杀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即该团体促成。蔡认为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故在爱国女校“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对年长的学生宣讲法国革命史和俄国民粹派的主张，并重点传授化学原理，期之将来有所作为，真可谓寓革命于教育之中。爱国女校这段时间隐然成为容留和联络革命志士的重要机关，龚宝铨、俞子夷等革命党人应蔡之邀来校任教，黄兴、陶成章、秋瑾等，亦曾在此与蔡晤谈。同年11月，蔡元培参与发起组织光复会，被推举为会长。由于他“闻望素隆”，随之入会者颇众。经他居中撮合，徐锡麟与陶成章分别统领的浙东两派会党开始合作，并成为光复会的主导力量。他还亲赴嘉兴，劝请浙西会党首领敖嘉熊加盟光复会，这位昔日爱国学社的故交慨然允以“有事相助”。可以说，蔡元培对于光复会颇具草创之功。1905年夏，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主持人，不久，黄兴抵沪，将孙的委任书面交予蔡。蔡此后在江浙一带发展了黄炎培等一批同盟会员，并在后来谐调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几年来的沪上革命，蔡元培始终以一介书生奔忙反清活动，虽然政治热情颇高，但终究有别于职业革命家。他由热衷救国而涉足革命，然而未能忘情学术而放弃教育救国的长远追求，就其

自身而言，出国领略西洋文化的欲念也一直强烈存在。他企望以较短时间和较小的代价实现社会政治的变革，因而一度沉迷于暗杀活动。当种种努力收效不彰、革命目标显得遥遥无期之时，又不免感到茫然。蔡元培自述此时心绪：“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故而，在1906年春离开黄埔之畔，返回故乡，出任秋瑾等倡办的绍兴学务公所的所长，推动绍属八县的教育事业。他邀约裘吉生、杜海生等人相助，时在南京求学的周作人亦在被邀之列，周正等候赴日留学而未能应召。学务公所于4月下旬成立，蔡元培首先开办师范讲习班，培训师资，进而提议创建师范学校，但在筹集经费时受到阻挠，遂辞职。此次回乡兴学，前后不足两个月。当他准备离绍返沪之际，接到北京友人的来信，告知清政府拟派翰林院编检各员出国留学，敦劝其从速入京登记。不久，报上亦刊载了这一消息。期待已久的良机无异自天而降，蔡元培为此怦然心动。他于6月下旬先抵上海，迎送章太炎出狱并东渡日本，后又参加邹容死难周年纪念会，了却了为这位先逝的青年志士修建墓前纪念塔的心愿。这些举动多少有些象征性地为他几年来的沪上革命划上句号。

随后，蔡元培毅然入京，去捕捉那现实而又渺茫的留学机会。

2.3 留德四年

回到阔别多年的京城，到翰林院销假，蔡元培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剖白了心迹：“弟此次进京销假，本为最不安之事。徒以游学德意志之志，抱之数年，竟不得一机会。忽见报载学部有咨送翰林游学东西洋之举，不能不为之心动。初亦恐进京而事不成，徒折吾节。故初则电询陈介公，后又电询王书公，其复函均称非进京销假不得图。王书翁到沪面谈，并催弟速行。因此七月进京，此亦日暮途远之为，不意竟成

夸父逐日之失。……盖弟数年来，视百事皆无当意。所耿耿者，惟此游学一事耳。”^①可知，他渴望出国留学的意念十分强烈，而对入京销假则显现出谨慎和事出无奈的心态。信中提及的陈介公、王书公，即陈介石（陈黻宸）和王书衡（王式通），均为蔡十分洽契的朋友，正是依靠朋友和同乡的大力相助，他才宿愿得偿。到京之后，初闻因经费支拙学部拟缓派赴欧留学，继而确知编检各员志愿留学者甚少，派送之事竟搁置不办。蔡的同乡肖伯棠、缪献甫力劝其私费留学，并慨然代为筹资。蔡元培遂一面应译学馆馆长章一山之聘，充任该馆国文教员，一面向学部申请自费留德，等候批复。是年冬，其堂弟蔡元康风闻有危及兄长之谋，便发急电诱其南归。蔡元培返乡后知悉情由，并不以为意，于1907年初仍回北京，得连襟陈仲騫照拂，寄居赣南馆。不久，顺天府尹孙宝琦（慕韩）奉命出任驻德公使，蔡元培托请其弟孙宝瑄及叶瀚从中说项，并登门访孙，表示愿在使馆中任一职员，以便留学。孙宝琦慨允每月助银三十两，而不需到使馆服役。同时，蔡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约定：在海外为其编撰教科书，每月得酬百元，留供家用。六月间，蔡元培随同前往赴任的孙宝琦，由西伯利亚铁路踏上了欧洲的土地。

蔡元培留学德国的第一年是在柏林渡过的。此时，他已年过四十，依照中国的习惯说法，恰是年当不惑。可是，这位东方古国的饱学之士身临异域，当务之急是补习德语。虽说避居青岛期间也曾接触日耳曼民族的语言，但真正的学习和训练是到柏林之后。生疏的文法，拗口的发音，对于显然已不年轻的翰林公而言，其艰难程度和所需毅力盖不难想见。他与同来德国留学的译学馆学生齐寿山及钱方度共寓一处，齐的同学顾孟余留德数载，谙熟诸事，顾即代蔡物色德语教师，定时讲授。考虑到蔡的旅居

^① 《致汪康年函》，《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392—393页。

经费不足，孙宝琦介绍他兼任唐绍仪之侄宝书等四人的家庭教师，为其补授国学，每月报酬一百马克。此外，蔡元培还须利用余暇编译书籍，寄回国内，其生活显然是紧张忙碌的。此时，中国留德学界人数尚稀，在柏林的马君武、夏元璠、薛颂瀛、宾步程，是与蔡时相往来的几位朋友。看来，蔡元培对自己在柏林的学习和生活并不满意，他自述：“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习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德语进步甚缓，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回国，岂不可惜！”^①因此，1908年暑期，蔡元培离开柏林，与齐寿山一同进入莱比锡大学。莱比锡原属撒克逊王国，与风景胜地特莱斯顿毗邻，是德国最高法院所在地，商贸亦较发达，莱比锡大学是该市一所已有五百年历史的高等学府。大学之内设有中国文史研究所，主持该机构的孔好古（August conraty）教授早年曾在北京译学馆任教，十分乐于招收中国学生，蔡元培因而顺利入学。如果说在柏林的一年属于适应和预备阶段，那么此后在莱比锡渡过的三年则使他真正进入了留学生活。

在莱比锡大学，蔡元培没有选定某一专业而攻读学位，只是任由兴趣与爱好自由听课，在校的六个学期总计选听了四十门课程，举凡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绘画艺术论等，“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其中印象较深的教师及其课程是：冯特的心理学和哲学史、福恺尔的哲学、兰普来西的文明史及司马罗的美术史等。冯特（Wilhelm Wundt）教授，是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曾在莱比锡大学创建心理学实验室，为举世所瞩目。这位在医学、哲学及法学方面均有高深造诣的学者，“又著民族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没有一本不是原原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

^① 《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298页，中华书局1989年。

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蔡元培对他非常推崇，接连三个学期选修其课程。兰普来西（Lemprechts）教授，则是史学领域的革新者，著有数十卷本的《德意志史》。他以进化的历史观划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阐释种种矛盾的演化与归趋，同时，其讲史注重美术，尤重雕刻、壁画等造形艺术的史学价值，使蔡元培深受启发和教益，进而参加了兰氏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接受比较文明史方面的训练。这期间，蔡元培一面听课，一面仍延请教师练习德语，对于课堂上未听清或不理解的内容，则求教高年级的德国同学，请其摘讲。同时，大量翻阅有关参考书，藉以消化理解所学知识。二十世纪初，康德、叔本华、歌德、莱辛等人的哲学和艺术思想在德国大学讲坛上占据重要位置，一些注重科学实验的新理论新方法也开始介入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而崭露头角，这是一个新旧交融、学术更替的时代。蔡元培身处其间，学泛众家，适足领悟这时代的精神内含。

课堂之外，蔡元培感受到一个充满美感的艺术世界。学校大礼堂正面那一组表现和象征希腊文化真谛的壁画，其精巧的构图和美妙的设色，将他带入欧洲文明发萌时代的古朴境界；市内美术馆虽非一流，却收藏着文艺复兴以来诸位大师的代表性作品，漫步这上、下三层楼、琳琅满目的艺术殿堂，仿佛对人文主义传统做了一次巡礼；椰园音乐厅每星期日演奏悠扬乐曲，更令异国学子留连沉迷，德意志浓重的音乐氛围，使他开始拨弄西洋乐器；莱城剧院不断上演的歌剧、话剧，饱含着西洋民族风情，伴随莱茵河畔的徐徐轻风，浸入心田，令人陶醉，而他与同学时常光顾的奥爱布赫小酒馆，即歌德当年就学于莱比锡大学时写下著名剧作《浮士德》的处所。……蔡元培自谓：“我于课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课，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特讲哲学史时，

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意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①显然，康德的美学思想吸引蔡元培收缩了求学范围。除了研读康德著作，他还十分喜好德国学者厉丕斯（T·Lipps）所著《造型艺术的根本》一书，因为书中阐述的感人主义观点极为契合蔡元培对美学的理解，加之其文笔简明流畅，引起他“百读不厌的兴趣。”此外，摩曼（Menmann）教授的《现代美学》、《实验美学》两书，言简意赅，门径分明，引发蔡元培着手进行美学实验。不妨说，接受西方美学思想，是酷爱哲学的蔡元培求学探索过程中的一个归宿点，也是其留学数年较为突出的学术收益。

尽管蔡元培涉猎的学科范围曾“勉自收缩”，而以美学和艺术史为主，但其他类别的书“终不能割爱”。他描述自己留德期间的况味：“来此已愈三年，拾取零星知识，如于满屋散钱中，暗摸一、二，而无从连贯。”他甚至将自己的治学不专一，过于追求宽泛归结为“从前受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太深”的缘故。^②不过，客观地讲，这与当时当地的学风亦不无关系。顾孟余即认为：“蔡先生留学欧洲之年，适值专家学风已超过顶巅，综合观察又复抬头之时，先生所从学者，又皆宏深博大之辈，此亦为影响其治学态度之成份。”^③蔡元培以国学隽彦而留学西洋，深厚的学术素养及长期的思维训练，使他对欧洲学术具有明敏的领悟能力和深刻的鉴别能力；颇为自由地广泛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又在极大程度上超脱了一般功利观念的羁绊，这便使他的留学生涯成为在人类各种文化成果中“云游四方”、任情尽性进行探知

① 《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02页。

② 《致吴敬恒函》，《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114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③ 顾孟余：《忆蔡子民先生》，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77页，中华书局1984年。

的一个过程。从而，对东、西两大文明的共性和歧异有了超乎寻常的体认和识见，为其日后领导全国性文化教育事业做了思想和学术准备。

在莱比锡的几年内，蔡元培听课之余，还有其他一些活动。孔好古教授主办的中国文史研究所开设练习班，他既参加练习，也略尽指导之责；市内的民族学博物馆，陈列有中国、日本等东方文物，他曾协同该馆人员讲解中国展品。在大学里，他结识了倾心东方文化的汉堡学生但采尔，帮助选译了其毕业论文《象形文字》中有关中国象形文字的一节。这类活动，多少使他体察到西方民众对东方文化的兴趣而益感彼此交流的必要。莱比锡城内的中国学生，仅蔡元培、齐寿山及直隶人张瑾三人。他们时常到雷克拉莫书店选购各自所需的书籍，该市系德国印刷业集中之地，这家书店印行的小本书籍，凡版权逾期的文学或科学书籍，每册书价不过二十生丁，对清苦的学生颇为相宜。每逢暑假，蔡元培便要结伴外出旅行，曾到德国的特莱斯顿、耶拿、明兴、都绥多弗等地，亦曾远足瑞士，得以饱览西欧各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

留德期间，蔡元培编著和翻译了三十余万字的文稿，寄交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这些著、译是：1、1909年10月出版的《伦理学原理》。作者为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Paulsen），其哲学体系属康德学派，但亦参采了斯宾诺莎和叔本华的部分学说，在伦理学上的动机论和功利论之间持调合折衷立场。蔡元培赞赏该书作者持中的伦理学观念，根据日本蟹江义九的日文节译本，参照德文原著，译为中文。该书出版后成为国内不少学校的伦理学或修身课的教科书，至1921年已出至第六版，后编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2、1910年4月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国的伦理观念素称发达，有关资料亦颇宏富，但杂厕经史之间，从未独立成学。有鉴于此，蔡元培以日本人木村鹰太郎

《东西洋伦理学史》和久保得二《东洋伦理学简史》两书中的中国章节为蓝本，梳理古籍，条贯挖掘，编撰成本，遂为中国近代伦理学领域的开山之作。此书后来列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并在四十年代初，由日本学者中岛太郎译为日文印行。3、《中学修身教科书》，共五册。前三册于1907年12月出版，未署名，后两册于1908年春出版，署名“蔡振”。1911年秋，蔡元培对全套五册略行修订，分作上、下两篇，于1912年5月出版。该书的编写始于作者在北京等候出国之时，定稿及修订则是在留德期间。这套教科书，与张元济、高梦旦二人分别编写的初小、高小修身教科书相衔接，在民国初期曾被各校广泛采用，至1921年9月已印行第十六版。相对说来，留德的四年，是蔡元培能够潜心治学，辛勤笔耕的一段黄金时期。

当然，这位沪上革命的重要人物，对于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十分关注的，并且与海内外的反清革命人士保持着通畅的联系。他从上海友人按期寄来的《中外日报》和《神州日报》上知悉国内的社会政治动态，在与汪康年、陶成章、吴稚晖等人的通信中，了解革命、立宪、保皇等各派政治力量的变化及其内情，对诸如浙江路事、章太炎等与孙中山的齟齬、刘师培的变节、于右任所办《民呼日报》的被封，以及汪精卫的人京行刺等事均有所探询或评论。他还曾受陶成章、龚宝铨之托，将其寄来的十册《秋（瑾）女士遗诗》分送欧洲各大图书馆收藏，以此志念革命英烈。这段时间，蔡元培与同在欧洲的吴稚晖、李石曾、张人杰三人关系渐深。吴等在巴黎筹组“世界社”，先后刊行《世界画报》、《新世纪》，宣传革命思想，倡扬无政府主义，痛斥立宪主张，并在行动上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蔡元培与吴稚晖互致信函，评事论人，尤为相契，蔡与孙中山的交谊，似即由吴从中牵线。1911年10月，正在德国一所新式中学参观的蔡元培，从报上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兴奋不已，随后又接到吴稚晖来函，

坚谓：“大家应竭力促成此举。”蔡遂赶往柏林、与留德学生集款致电国内各省，促其响应；同时，致信时在伦敦的孙中山，建议筹款订购克虏伯兵工厂制造的新式大炮，以助成革命。对袁世凯复出后革命所面临的局面，他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曾做出预测，认为，袁世凯不会象当年曾国藩效命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那样对待此次革命，但也不可能赞成民主共和，袁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借此以自帝”。在辛亥事件之初，即作出这一分析，可见其政治观察力的敏锐。不久，蔡元培接到陈英士促请他回国的电报，这位当年蔡在中国教育会开办通学所时的学生，此时已成为上海方面革命力量的主要领导人。11月上旬，蔡元培匆匆结束了四年之久的留德生活，经西伯利亚返回祖国。

此时的中国，正站在新旧两个时代的分界点上，满清王朝行将就木，民国的帷幕就要开启。蔡元培或许不曾意识到，自己将在新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第3章 在民国最初的年月里

3.1 首任教育总长

1911年12月初，蔡元培返抵上海。时值隆冬，寒气正深，然而武昌首义掀动起来的共和热浪正漫卷于华夏大地，各方名流齐集宁沪，紧张筹建新生的共和政权。他寄居爱国女校，与诸多人士接洽商谈，奔走建国事宜，协调各方立场，并与在沪人士迎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翌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即组阁。在酝酿教育总长人选时，曾先后提名章太炎、汪精卫、严修、胡子靖等人，最终确定蔡元培，乃获各省代表通过。南京临时政府素称“次长内阁”，同盟会会员以次长之职主持部务，总长则多请社会名流充任，只有陆军、外交、教育等少数部门例外。因此，孙中山派薛仙舟至沪招请蔡赴任时，蔡初曾力辞，当闻知上述情由，转而决意“勉为其难”。他邀约中国教育会时期的老友、在商务印书馆常年编撰学校教科书的蒋维乔，并另聘一位会计兼庶

务，共同赶赴南京，受命组建中华民国的教育部。

新生的政权，百事待举而困难重重。作为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虽身居高位，却一仍旧贯，不失书生本色。来到金陵城内面见孙大总统，询以“教育部何处办公”？答曰：“须总长自己寻觅”。此时，有限的几处旧官署均被占用，蔡元培只得走街过巷，选定部址。幸而路遇故交马相伯，这位时任江苏督都府内务司长的老友允借府属碑亭巷的几间空屋，权作办公之地。临时政府各部的印章制作完毕后，由于部内人手少，蔡元培乘坐人力车独自到总统府将印章领回。条件暂且简陋，排场亦可不讲，但在延揽部内人员时，他却力求一流人才。许寿裳、周树人（即鲁迅）、钟观光、王之瑞（云五）等即此时陆续应聘进教育部任职。他奉行“为事择人，不设冗员”的原则，部内人员含缮写杂务在内仅三十余人，不足其他部门的三分之一。鉴于时局尚未安定，需要而又可行的工作是拟定各级学制，登记学校，为全国性教育改革做先期准备。部内人员发挥各自专长，分别起草学制方案，遇有文牒，即时办理，其工作气氛颇似书局之编译所，而绝少官衙积习。部内各员，除总、次长之外，统称筹备员，无官职等级之分，每月薪俸，均为几十元，即使总长亦不例外。草创之际，可谓一派发皇气象。主持全国学政，蔡元培尤为注意察纳雅言，对于陆费逵、王云五等人各自提出的合理建议，或登门造访，恭听其意，或延揽入部，行其所愿，纯然出诸公心而从善如流。正是由于汇集众人的智慧，蔡元培和教育部才接连推出革新措施：

1月19日，教育部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共十四条，主要内容是：学堂改称学校；教科书须合于民国的共和宗旨，禁用清学部规定的教科书；废止旧时的奖励出身制度；学校注重兵式体操等。这些通令各省的规定，极大震撼了年深日久的封建教育秩序，为全社会送来一股民主共和的清新之风。

1月30日，教育部下达在全国推行社会教育的通令。蔡元培深感国人年长而失学者为数之众，欲求教育普及，必须力行社会教育。筹组教育部时，特设社会教育司，与普通、专门两教育司鼎足而三，确立其体制上的地位。同时，要求各地广为宣讲，次第实行。推广社会教育，实乃国情所急需，虽然难以立见成效，却在学界开辟出一席之地，其筚路蓝缕，确为不世之功。

民国业已创立，教育方针一日不明，全国学界便难有旨归。有关人士喧腾于口，吁请总长速作定夺。蔡元培乃撰成《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于2月上旬公诸报端。这篇被后人视为“纲领性的文献”，开宗明义便将教育划分为“隶属政治”和“超轶政治”两种类别，认为，教育在专制时代基本隶属于政治，而到共和时代才可能超轶于政治。循此观念，作者对清朝学部1906年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大加修订，提出新的教育方针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合，仍为隶属政治的教育，而后两项，则是教育家追求“形而上”的观念目标，首次提出的“超轶于政治”的教育。至于原宗旨中的忠君、尊孔两项，因与共和政体和信仰自由相悖离，特予删除。作者强调，新列五项均为当今教育所必需，相互关连，不可偏废。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旨在强兵富国；公民道德教育是以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与之相应的中国传统的“义、恕、仁”为内容，用以节制前二项教育的副效用，诸如兵强而流于私斗、侵略、国富而演成弱肉强食，贫富悬殊等。作者用不少笔墨演释康德哲学中“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二元论观点，以论证世界观教育在人类认知过程中的“终极境界”。以及美感教育所具有的勾通“现象”与“实体”两个世界的桥梁作用。

通览全篇，令人感到：这位教育总长虽然将德智体美四育并

举，但其重视道德教育的倾向颇为明显，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三项教育均以培养共和公民的“完全人格”为基本目的，尽管后两项以“超轶政治”相标举，而实质并不曾改变。就内容而言，属于蔡元培独创的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然而其表述几乎完全沉溺于康德的哲学概念，为一般世人所不熟知，因而显出几分玄奥色彩。蔡元培后来的追述则要明确清晰得多：“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①这即是说，世界观教育的实质在于破除来自各方面的思想桎梏，使人们临近那种自由畅快，以其至性认知事物的精妙境界，而美育则重在陶冶情操，完善人格。从中不难看出，这位长期寝馈于哲理而偏好美学，同时又始终砥励私德、涵养心性的教育家所特有的个性化色彩。当然，蔡元培关于民国教育方针的主张，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近代价值观念浸入中国社会之后的思想文化要求，并与辛亥以后的政治格局相适应，它的提出，大大推动了学术教育界除旧布新的势头。半年之后，北京教育部正式公布民国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即大体上依凭蔡氏的主张。

发表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后不久，蔡元培奉孙中山之命，担任迎袁专使赴北京交涉，为时一个月。其间，由次长景耀月代管部务。景系同盟会员，平素热衷党务，对教育之事过问不多。但代管期间，忽而开列数十人名单，分别冠以参事、司长、科长、秘书之名，报经总统府正式委任。其中，除原有筹备员外，增加许多与教育无涉而有党派背景的人员。景氏的用意在于先人为

^①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197页，中华书局1989年。

主，使这些人在政府北迁后仍能占居位置。此举，造成部内冗员骤增，工作杂乱的局面，招致原有人员的不满。3月中旬，蔡元培回部视事，面对如此情状，详言利弊得失，说服景氏和众人，取消前述之举，并果断将已发之委任状退还总统府。据说，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对蔡元培的这一措施颇不以为然，深怪其“对于本党老同志不肯特别提拔。”以至政府北迁、蔡仍主教育部时，有人请胡介绍人该部供职，胡不无抱怨地答曰：“别部则可，教育部不能。”^①蔡元培此时的用人主旨是：唯才是举，能者在职，不为党派所囿。这一思想风格十分突出地表现在他与后任次长范源濂（静生）的合作共事方面。

3月底，唐绍仪内阁成立，蔡元培留任教育总长，于4月入京上任。正式组建的教育部设在铁匠胡同前清学部衙署内。他选中曾在清末担任学部参事，时为共和党人的教育行政专家范源濂为自己的副手，先后两次亲访，坦诚相邀。他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此番诚意，使范大为感动，乃应允出任次长。^②新建教育部计有部员七十名左右，主要由蔡范二人推荐，蔡所荐者，欧美及日本留学生居多，范提出者，大多富有教育管理经验，然均未注意党派关系。蔡元培自述：民国“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际，以他所长，补我之短”。二人的兴趣分别偏好

^① 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06页。

^② 梁容若：《记范静生先生》，见台湾《传记文学》第1卷第6期。

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遂合力整顿共图改革。蔡元培认定，共和时代教育能够超轶政治，进而主张“教育独立”，他在民元教育部的一系列举措当可视为这一信念的实际体现。

蔡元培在北京政府中任职仅仅三个月时间。到京之初，接收前清学部，聘定部内人员，健全各级机构，发布有关学令，确乎有干番事业的志向。4月底，他与部员谈话提出，鉴于各校程度参差不齐和清末办学的“奢、纵”之弊，“拟先将中学以上官、公、私立学校，严加归并，裁汰冗员，严定章程，以便早日开学。”这一设想可谓彻底整顿、全面更张。5月初，他通令将北京大学堂易名北京大学校，提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出任校长。随后，在向参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又明确表示：总长之职“既勉强担任，断不敢存五日京兆之心，”并就教育方针、设施、行政权限、派遣留学生及少数民族教育诸问题一一陈述意见。其中特别强调：“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在专门教育，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①不妨说，此乃蔡元培委身教育的理想所在。为了确定民国教育的方针大计，他领导教育部发起召开了由各地专家参加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蔡元培在7月10日举行的开幕式上宣布，此次会议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教育部将事先草拟的四十余项议案提交大会审议。这些议案，凝聚着蔡元培主持民元教育部半年来的心血，设计规定了新教育的体制和细则，从而构成实行十年之久的“壬子癸丑学制”的基本内容。其中，较能体现蔡元培个人主张的，是他提出的《学校不应拜孔子案》和由其手订的《大学令》。

尊孔读经，千百年来一脉相承，近乎天经地义。这一文教积习与专制政治扭在一起，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迈入近代门坎的惰性

① 《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见《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164页，中华书局1984年。

因素。已经接受欧风美雨沐浴的蔡元培认为：“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虽然孔子及其学术有其价值，但后世将其演为儒教、孔教，定为一尊，令人顶礼膜拜，则极不合理。故而，力主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课程废弃经科。针对清末学堂中通行的类似宗教仪式的祀孔习惯，他主张明令废止。此举对当时的文化思想界和一般社会心理形成不小的冲击，昔日至高无上的偶像开始变得暗淡，多元文化渐渐弥漫于知识阶层。作为教育家，蔡元培较为偏好高等教育，留德期间即注意考察欧洲大学制度，主持全国学政后，规定除北京外，分别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一所国立大学，以扩充高等教育。他亲自起草《大学令》，仿效欧美有关制度，着重提高现有学校的办学质量，规定：大学设置预科，预科毕业或经考试证明具有同等学历者始得升入大学；大学高年级学生须完成一定研究课题方可毕业；大学分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而以文、理二科为主，使之成为研究高深学理之机关。这些主张虽为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所采纳，但大多成为具文，并未切实施行。然而，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一系列构想，却为他几年后办理北京大学准备了行动方略。

尽管这位书生参政的总长秉持“教育应立于政潮之外”的愿望，但他在苦心经营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尚未结束之际，便以纯粹的政治原因辞去内阁的职务，使得热心教育改革的人士遗憾不已……

3.2 在民初政争中

事 事实上，从蔡元培由德归来、踏入国门之日起，便已置身政治活动的舞台，在民国初年的南北政争中甚至一度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举国注目的人物之一。

归国之初，寓居上海，正值张謇、章太炎、汤寿潜及赵凤昌等沪上名流酝酿大元帅人选，此时孙中山还未归国，多数人倾向

黎元洪，陈英士等人则属意于黄兴。蔡元培两相权衡，选择后者，因为黎氏有与袁世凯部下妥协之嫌，恐于革命不利。表决之前，他夜访章太炎、汤寿潜，劝说二人改推黄兴，章、汤勉从其意。翌日，黄兴被举为大元帅，黎元洪次之。蔡氏此举，显然与同盟会诸人有所默契，在各派势力之间，他的政治归属颇为分明。亦因如此，当同盟会与光复会这两个反清革命团体之间的矛盾日显尖锐之时，蔡元培的处境便有些微妙。还在辛亥的前一年，章太炎脱离同盟会，在东京设立光复会总部，公开与孙中山等人闹分裂。武昌起义后，他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意在解散同盟会。由于一些光复会系统的浙军将领在推举临时大总统问题上持有异议，章氏便乘此要求十七省代表延缓选举。蔡元培与光复、同盟两会均有渊源，身处内争之中，只得调停、周旋。他曾赶赴南京，代为转达章太炎的意见，又将各省代表决意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情况告知章氏。太炎此时在上海自组统一党，邀蔡共寓一处。鉴于孙中山当选将成定局，章氏乃与蔡相约，浙人不入南京临时政府任职，蔡敷衍应之。不久，孙中山派人招蔡入阁，太炎援引前约，扣其行装，极力阻止。蔡则顾全大局，执意赴命，不惜刊登通告，以谢“背约之罪”。随后，蔡元培出任孙中山政府的总长，而章太炎却没有发表蔡拟就的“谢罪通告”。^①此事当可窥见，蔡元培在内部纷争中的实际倾向。

1912年2月中旬，国内军事和政治的实权人物袁世凯，借南方革命之威，迫使清帝退位，孙中山如约让以临时大总统之位，但坚持袁氏须南下就职，以避由清禅位之嫌。为此，迭发电报，促袁南行，而袁氏则托词延宕，殊无来意。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决定派遣专使，北上迎袁。专使的条件，为同盟会员同时又

^① 蔡元培《自写年谱》，见《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05页。

是南方政府阁员者，蔡元培具备这些资格，遂被派为专使。南方政府派专使迎袁南下，似乎是要表明一种政治姿态，但也显示了孙中山等人维护革命成果的意志和决心。不过，这一使命能否达到目的，局内之人表示悲观者居多。有的朋友认为，此乃“倒霉的差使，以辞去为是”，蔡元培则觉得：南京政府必须有此一举，畏难推诿，实不足取。遂偕宋教仁、汪精卫、魏宸组、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等八位欢迎员与唐绍仪、李石曾等共乘招商局“新裕”号客轮由海路北行。船行海上，众人畅论迁都及改良社会风习等话题。同盟会诸人大多主张迁都南京，惟宋教仁持异议，以为首都南迁势必减缓对北方的控制力。此前不久，吴稚晖等在上海发起进德会，提倡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不作官吏、不当议员，旨在砥励私德，净化风气。同船之人多数热衷政治，乃删除后两项，索性俗称“六不会”；唐绍仪进而提议成立社会改良会，以破除迷信，改变陋俗。蔡元培均列名其间，日后亦以培育良好风气自任。

2月下旬，蔡氏一行由津入京，刻意布置的欢迎场面虽然隆重浩大，但舍舟登岸后感受到的气氛却与南方迥然不同。前来访晤的当地代表反对迁都几乎众口一词，蔡元培屡屡申明来意，排除“误解”，不胜其苦。与袁世凯相见后，接连三天会谈，这位权倾一时的“大人物”似乎心无芥蒂，表示，只要军队有人统摄，颇愿脱离北京这个“臭虫窝”。然而，袁派要人则力持袁氏不能南行，蔡坚守来意，履行使命。会谈并无实质性进展。29日夜晚，蔡元培在专使团下榻的东城煤渣胡同法政学堂寓所与钮永建、汪精卫闲谈之间，骤闻枪声响起，急忙打电话询问陆军部，答以第三镇兵变。枪声渐近，守护专使团的卫兵不知何往，情急之中，蔡等越墙避入相邻的青年会教士、美国人格林的寓所。乱兵闯入专使团住地，大肆抢掠。翌日晨，蔡一行人避往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不久，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孙宝琦首先赶来慰

问，述说昨晚正在袁氏官邸，得知兵变，袁即传令切实保护专使团，并说：人家不带一兵，坦然而来，我们不能保护，如何对得住云云。经此变乱的专使团诸人姑妄听之而已。乱兵声称：“袁宫保自己要到南京做总统去，不要我们了！我们还是各人抢一点，回老家去！”京中舆论视此为兵变起因。继北京之后，天津、保定等地也相继发生兵变。外国列强借口护卫使馆和侨民，拟议调兵入京，更无异火上浇油。面对如此局面，蔡元培及专使团承受的压力之大，可以想见。几经磋商之后，蔡致电孙中山，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大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进而具体建议：取消迎袁南下之议，确定北京为临时政府之地点。^①同时，推定宋教仁等返宁面商变通办法。这一事态的演变，显然对袁氏集团有利，袁氏甚而乖巧地提议请副总统黎元洪代其赴宁就职。南京方面并无良策可施，最后只得让步。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代表南方接受誓词，并致祝贺。此刻，他的使命已戏剧性地发生了改变。

迎袁失败，表面上的责任在蔡元培一行人。以往史家责其“胆量不足”，“为袁所欺”，大多着眼于当事人的政治素质。不必讳言，书生气十足的蔡元培出任艰巨，与历尽波凶浪险的政界高手袁世凯相周旋，居于下风当在意料之中。问题在于，促袁南下就职这一决策究竟有多大的可行性。辛亥之后，政体变更，国基未稳，袁世凯的北洋系占居北方军政重心，牵毫发而动全身。促袁南下隐含国都南迁之义，如此重大举动急骤行之，显然有失草率。京、津一带兵变，固然不排除袁氏施用伎俩的因素，但北方既得利益集团抵制军政重心转移的社会心理也有其作用。政治较量的成功，取决于军事、财政、社会等多种实力要素构成的综合优势。孙中山领导的南京政府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与袁

^①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43—144页。

世凯所代表的传统势力相比，还过于稚嫩、弱小，几经交手，均为输家。蔡元培迎袁不果，可谓南方一系列失败中的一例。

专使团离京之前，受命筹组南北统一政府的唐绍仪拟议一内阁名单，蔡元培仍名列其中，主管教育，蔡极力辞却，遂改为范源濂。外界不鲜，乃传言：蔡迎袁无效受惩而被削职。此说一出，涉及南北关系，孙中山、唐绍仪等力主其留任，蔡亦不便再辞。唐绍仪内阁由南北两方面人员混合组成，十名阁员，双方各居其五。同盟会方面除蔡外，尚有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分主司法、农林、工商各部。唐本人与袁世凯有二十年的交谊，曾任南北议和的北方代表，前不久，由谋客赵凤昌提议，经孙中山、黄兴赞同，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兼顾南北的特殊人物。内阁中的外交、陆军、内政、财政、交通五部则由袁派大员分任。置身于这样一个政府之内，蔡元培充分体验了民国初年政治风云中专制与共和的矛盾冲突。他信守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原以为创建民国之后，共和政治即成为现实，依法履行公务的政府应当有所建树。然而，袁世凯作为总统却蔑视《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独揽大权，专断行事。内阁中的袁派成员，事无巨细，惟袁命是从；南方阁员欲有所为，却受多方掣肘。遇事认真的蔡元培在内阁会议上不免常与段祺瑞、熊希龄等袁派阁员发生争执，但收效甚微。总理唐绍仪力持责任内阁制，亦遭袁氏疑忌，接连受到诋毁。深深的失望，使蔡元培感到，与其“任此伴食之阁员”，不如高蹈远引。于是约集同盟会阁员，对他们说：“目前情形，政府中显分两派，互相牵制，无一事可以进行。若欲排斥袁派，使吾党同志握有实权，量力审时，决无希望。不如我辈尽行退出，使袁派组成清一色的政府，免使我辈为人分谤，同归于尽。”宋教仁对此主张不甚赞同，但面对内阁现状亦无可如

何，乃相约：遇适当机会，一齐辞职。^①

不久，唐绍仪与袁世凯就直隶总督人选发生尖锐对立。唐组阁时，孙中山提出由王芝祥任直隶总督，唐商之于袁，并无反对表示。然时日迁延，此项任命迟迟不见发表。唐催促再三，岂料袁氏另有安排，直督一职委于心腹冯国璋，王芝祥改派他职。唐坚执原议，袁则将未经总理副署的委任状迳自颁发。唐愤而出走天津，随后辞职。蔡元培等同盟会四阁员践行前约，连带辞职。袁氏设法挽留，其亲信梁士诒奔走游说，力劝四人取消辞意。宋教仁对公开与袁抗争有所保留，但蔡元培援引前约，执意共同退出政府。他在7月10日起草的致继任总理陆征祥的四阁员联名辞职函中毅然宣布，到部视事以14日为截止期限。这样，袁世凯只得准予辞职。蔡等此举，被某些人视为“闹党见而不顾及国家”。为此，蔡元培发表《答客问》，陈述原委，辨析是非。其实，蔡元培真诚追求民主政治，极愿在共和制的政党内阁中为国家开创一个新格局，可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相距甚远，厕身于“无方针无线索”之政府中，“机关停滞，万事丛脞”，在袁氏的集权高压之下，不过“充纸糊台阁之片断”而已，于国家前途毫无裨益可言。所以，他申明：“吾党不必无执拗粗暴之失德，而决无敷衍依阿之恶习。”显示出为了理想和人格，决不与污浊的现实共浮沉的高洁气度，因而被颇具识见的新闻界人士赞许为“同盟会第一流人物”。

7月底，蔡元培离京南返上海。十余日后，武昌起义领导人张振武及方维二人未经审判即被袁世凯杀害。随后，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又在汉口被无理拘捕。此类破坏法律、蹂躏人权的事件，与共和政体极不相容。蔡元培与吴稚晖等十余人发起组织法律维持会，致电参议院，要求追究当局的法律责任。然而，民国

^① 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10页。

成立以来的风风雨雨使蔡元培对于辛亥革命的实际意义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他在致蒋维乔的信中写到：“此次革命，实专属民族问题，于政治上排去满洲亲贵之权力而已。清代汉官之流行病，本未曾动，望其一时焕然更新，谈何容易。惟乘此波动之机会，于各种官僚社会中，已挤入新分子，将来竞争之结果，必新胜而旧败。”^①冷静的思考，切身的体验，并没有磨蚀掉他笃守进化公理的信念，而可行的方法是在民族革命后进行社会改良。可以说，这是他辛亥之后选择的政治路径。闲居沪上，冷眼观察国内时局，他料想到政治上的纠纷正方兴未艾，自己一介书生亦难有作为，不如仍往德国，继续深造。9月，即携眷赴德，仍进莱比锡大学听课与研究。翌年三月，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宋案”调查结果显示，袁世凯及其党羽正是这一政治谋杀的指使人。孙中山力主与袁世凯决裂，遂招请海外同志归国。蔡元培接到陈英士催促其返沪的电报后，迅即与汪精卫经西伯利亚回国，于6月初返抵上海。此后的三个月，他经历了“二次革命”从酝酿、发动到失败的全过程。

到达上海当天，蔡元培便到爱文义路100号访孙中山和黄兴，筹商对策。孙中山主张兴师讨袁，黄兴则鉴于兵力不足，倾向通过法律解决争端。蔡元培的态度如何呢？6月8日他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的演说足以反映其主张，他说：“吾党革命，本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今仍当体察大多数人民之心理。现多数人民不主极端进取，……吾党只须以坚忍之决心，持稳健之步调，誓死缔造真正共和，则多数国民，必表同情，吾党自有战胜之一日。吾同志诸公，处此危疑艰险之日，惟有运静细之心思，蓄坚实之力量，采取舆情，以维持大局，则民国幸甚。”^②不难看出

① 《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286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296页。

出，蔡元培注重民意，强调稳健，不赞同军事冒险，企望从长计议。这一立场与孙中山不同。因此，当张謇、赵凤昌等约请他和汪精卫往谈，声称北京方面愿意与黄兴探讨妥协办法之时，他曾积极奔走赵黄之间，磋商条件，希望和平解决南北之争。当然，对于军事抗争，蔡亦并非完全放弃。激烈主战的李烈钧欲赴南京劝说精锐之部第八师起事，因该师旅长王用功曾为爱国学社成员，乃请蔡同行，以便洽谈。蔡亦曾与之前往，无奈高级军官反应持重，只得废然而返。7月中旬湖口起兵“讨袁”之后，南京等地纷起响应，蔡再次赴宁，为已参加起兵的第八师起草反袁通电。“二次革命”进行期间，蔡元培与吴稚晖、张继等在上海编印《公论晚报》，并在《民立报》撰文，投身反袁斗争。他还与唐绍仪、汪精卫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其“宣布辞职，以塞扰攘。”国民党在南方各省的军事行动不久即相继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人流亡海外，革命进入低谷时期。

9月，又是秋风乍起之时，蔡元培与吴稚晖各自挈妇将雏，踏入日本邮船“北野丸”的三等仓，离开上海，驶向海天万里之外的欧洲大陆。

3.3 变动不已的旅欧生活

进人民国以后，蔡元培活跃于政坛和教育文化界，每当因故不得不退离这个舞台时，他便远走海外，息影欧洲腹地，一面领略西洋人文哲理，一面著译书籍传播学术。这几乎成为他个人生涯中的一个“周期性”现象。

还在北京教育部任总长期间，蔡元培接到莱比锡大学教授兰普来西的一封信，请其派遣两名中国留学生来他主持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蔡即规定公费名额，物色人选。此后不久，他辞职离京，鉴于国内政局扰攘不定，萌生继续赴德深造之念，其学友顾孟余亦有此意。于是，蔡致函主持教育部的范源

廉，希望得到先前规定的两个公费留德名额，范随即批准。当年秋间，蔡元培偕黄夫人及子女，与顾孟余夫妇同乘奥地利“阿非利加”号客轮，由海路驶抵德国，仍进莱比锡大学。兰普来西教授大概不会想到，应邀前来的中国学生，竟是卸任不久的教育总长，按照研究项目和计划，他要求蔡、顾二人提供中国文明方面的文字资料。这样，蔡元培一边听课，一边撰写有关文稿，而由顾孟余译为德文。在莱比锡的治学生活仅仅持续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因国内发生“宋案”，应召回国而中断。……

此时，蔡元培乘船行驶在一年前曾经走过的这条航线上，算来已是第三次赴欧了。他本想返回熟悉的莱比锡大学，继续那宁静的治学生活，可是受老友吴稚晖的劝导，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却是法国巴黎。法兰西的灿烂文化和大革命时代形成的精神传统，对他是有吸引力的，何况，那里还汇集着李石曾等一班热情的朋友。行前，他与商务印书馆再次约定：在国外每日以半天时间撰择书稿，该馆每月致送二百元稿酬用以维持生活。此外，教育部故旧蒋维乔、董鸿祯等亦设法筹集款项，助其旅欧。1913年10月中旬，蔡元培到达巴黎，与家人暂寓市郊科隆布镇的中华印字局内。前来迎接和款待他们的，正是老友李石曾。这位热心公益而办事疏阔的世家子弟，来法已近十年，他在此创办的豆腐公司闻名遐迩，成为旅法华人的聚会地。早在四、五年前，蔡从齐寿山那里闻知李提倡素食的主张，深以为然，从此力行素食，坚持十余年之久。这一特殊的生活习性，使蔡李二人相处颇为契合。来法之初，蔡家每日伙食即包于豆腐公司。然而，此处人员杂沓，应酬频繁，蔡元培设想的编书计划无从实行。到了12月下旬，他便举家迁入一法国人出租的房舍内，子女陆续进校就学，他一边编书，一边与黄夫人学习法语。其编著计划，拟先编《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和《中国文学史》三书，然后撰述哲学、心理等学科的著作。看来这些书目，既有蔡自选的，亦有商

务指定的。由李石曾推荐的法语教师是性格开朗的欧思东先生，这位擅长音乐的比利时人，对教授法语似乎并不在行，既不用课本又不讲语法，只从文学书中随意摘录几段予以讲解而已，故而蔡自称：“我们的法语学得不切实。”

在巴黎近郊居住的近十个月里，蔡元培参与了旅法学界的一些活动。相距不远的蒙塔尔纪城，聚集着百余名留法俭学生，他们是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于民国元年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设立留法预备学校以来陆续到达这里的。当时，蔡主政教育部，曾赞助其事。此刻，面对初具规模的留法俭学事业，作为教育家是颇感欣慰的。他与汪精卫、李石曾等人每星期轮流为俭学生们作有关中西学术问题的演讲，并为解决俭学生创办《农学杂志》的印行事宜，与在国内的王宠惠联系，请其推动中华书局承接此事。同时，蔡还与汪、李及张继诸人酝酿筹办一份刊物，面向旅欧华人，宣传新思想新学说，倡导俭学主张。刊名初为《民德报》，后定名《学风》杂志。蔡元培为此撰写了《发刊词》。他写道：当今时代实为全世界大交通之时代，人类社会应当通力合作，增进世界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完全世界主义”的科学和艺术两项。他认为，以中国特有的诸多优越条件，本应为人类文明作更多贡献，但令人自愧的是，除了值得夸耀的古代成果外，近代的许多领域却大多为欧洲人越俎代庖。欲改变这一现实，只能象日本人那样，承认欧洲学术的价值，“奔轶绝尘以追之”，舍此别无出路。他强调，中国吸收外来文明，汉唐之际业已行之，佛学广涉诸学即是显证。然欧洲学术不似佛学的只限哲理，而已渗透于社会生活广大方面，欲学习欧洲学术，舍派员留学别无他途。历来留欧者甚少，倘以俭学行之，必可大为改观。这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文章，广泛涉及中外古今的文化问题，极言学习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急切和必要，反映出作者撷西洋之精华挽故国之衰敝的真诚心理。由此篇《发刊词》，当可想见蔡元培在蒙塔

尔纪所作学术演讲的大致内容。

可是，随着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隆隆炮火的响起，筹备多时的《学风》杂志不得不停办，蔡元培等人的旅欧生活也为战争的阴影所笼罩。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俭学生，由于学校关闭、国内汇款难以寄达，孤悬海外的俭学生面临困境，一些人主张辍学回国。为救助俭学生，李石曾等发起成立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蔡元培撰写该会通告，语重心长地劝导俭学生以学业为重，转入战火未及的法国西南部各校，继续求学。维持会代觅学校，提供救济，帮助俭学生们渡过了战争初期的难关。进入9月，德军迫近巴黎，法国政府迁往西南沿海城市波尔多，蔡、李等人亦于是月中旬举家避往西部乡间的谟觞村。这个人口不足千人的村庄，交通极不方便，但蔡元培却兴致勃勃地参观考察了邻近的许多学校，并与我国和日本的同类学校进行了比较。半个月后，他们又迁至附近的小镇圣多耐，蔡一家人住在一家帽店楼上，房东是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她们对中国人的友情给蔡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蔡、李等移居法国南部城市都鲁士，其生活才渐渐安定下来。在这频繁的迁徙之中，蔡元培并没有停止编著工作，他完成了《哲学大纲》一书的编译，并着手继续进行《石头记索隐》的考证。

1915年春，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披露于报端，旅法学界闻悉群情激愤。汪精卫、李圣章、谭熙鸿等纷纷来到蔡元培的住处，共商对策。蔡依据众人的议论，草拟《华人御侮会会章》七条，供大家讨论。从这一文件看，所谓华人御侮会，是采取激烈手段抗御外侮的秘密爱国团体，会员应尽的责任分为“普通”与“特别”两种，诸如：“见有敌人侮我同胞者击之，事变如有株连，则挺身任之；不租屋于敌人；不售地产于敌人；不服役于敌人；见有华人之助敌而侮我同胞者，诛之；入敌境而侦探之”等等。蔡元培拟组秘密团体的设想，没有被众人采纳，

但国难当头显示出的忠勇气概，确非一般文弱书生可比，此举与他当年参与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活动不无异曲同工之妙，足以显现其一以贯之的爱国激情。蔡元培等国民党人在海外的一些活动也曾断断续续甚或不无歪曲地反映于国内报刊之上。当万众瞩目“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政府内外交困之时，上海《新闻报》转发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说：孙文、蔡元培宣言，国危停止革命活动云云。姑且不论这一消息的可信度如何，但其受益者显然是袁氏政府。事实上，袁世凯、袁克定父子曾通过不同渠道软化和拉拢海外的国民党人，其中包括蔡元培。他们利用李石曾的故交朱芾煌，汇寄巨款予李及汪精卫、蔡元培三人，言称：三君现状颇窘，以此相助。其后，朱又来函，说是“总统极器重三公，……深愿归国共襄危局”云云。此外，袁氏还经由他的法国顾问及驻法公使胡惟德转告于蔡、汪：“总统甚倚重二公，现在国事艰难，务请劝告党人勿再图内乱”。对于袁氏父子的“好意”，蔡元培并不为所动，他在当时写给吴稚晖的信中即认为：

“弟与袁世凯绝交，至分明。在彼亦不过笑弟为一迂儒，未必置于意中。……大约彼等总不肯放过精卫先生，而弟适与之同留法国，又二次革命时，适同时归国，适同发一电，劝退任，遂生出种种连带之关系。”^① 蔡的分析自不无道理，但袁氏视其为温和派而与孙中山等人有所区别似亦是事实。

同年夏，蔡元培、李石曾等来到法国南部海滨的罗埃避暑，此后，蔡一家人便留居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小城。这时，旅法华人的勤工俭学活动呈现活跃发展的态势，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人于6月组织起勤工俭学会，倡行“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此项活动的始作俑者其实是李石曾。他与齐竺山创办豆腐公司之初，从河北高阳招募许多乡人入厂，为使其适应生活环境，实行

^① 《复吴敬恒函》，《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389—390页。

了以工兼学的方法，效果颇佳，随后逐渐推广，一些学生亦仿效实行。李进而编印《勤工俭学传》，以富兰克林、卢梭等名人早年做工苦学的实例，宣扬勤工俭学的精神和效果，藉以推动旅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广泛开展。蔡元培早先与吴稚晖参观法国地淡泊人造丝工厂时，就曾探讨过“学生做工，工余求学”的可能性。此刻，对李石曾等倡行勤工俭学尤为支持，乃应约为《勤工俭学传》撰序，以教育家的身份充分肯定和大力扶助这一可行的求学方式。几乎与此同时，他与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正式组建世界社，使这一发起筹备了三、四年之久的同人团体终于得以落实。列名发起人的尚有张人杰、褚民谊、谭熙鸿和陈璧君。蔡起草的《世界社意趣》称：“同人就学异国，感触较多，欲从各方面为促进教育之准备，爰有世界社之组织。”从该社社章来看，创办刊物、编译图书为其重要社务，故偶或亦称“世界编译社”。此外，推广和扶助留法勤工俭学亦被列为社务之一。就实质而言，这是一个文化教育性团体，尽管其发起人大多具有政治背景。世界社成立后，责成汪精卫在东南亚及上海筹资，是年秋，蔡元培、吴稚晖等又联名致函在美国的张继，请其作为该社代表在美洲募款。实际上，民国以来先后成立的进德会、留法俭学会、世界社之类团体，尽管名目各异，而核心人物不外乎李石曾、吴稚晖二人。蔡因为与他们的密切关系而置身其间，对于各项事务亦颇多助力。

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法国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于是有招募大批华工赴法之议。在此背景之下，1916年3月，中法两国教育界人士发起筹组华法教育会，旨在开展华工教育，推动双向文化交流。该会于6月正式成立，蔡元培与巴黎大学教授欧乐分任中方和法方会长，汪精卫与法国众议员穆岱分任副会长，李石曾、李圣章担任中方书记，吴玉章为中方会计，该会组建之后，即受法国有关部门之托，派员回国到西南各省招募华工。蔡、汪

等人联名致函各省当局及教育机关，极言华工赴法的利益所在，即：“扩张生计；输入实业知识；改良社会”，请其协同择取体健品端，略具知识而不染恶习之青壮年应募赴法。显然，蔡元培、李石曾等设想通过招募华工，吸收知识青年赴欧，励行其勤工俭学，进而达到变相留学的目的。这便是后来大规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轫。为了施行华工教育，华法教育会于4月初开办了略带师范性质的华工学校，蔡元培主持入学考试，并编写了德育、智育讲义四十篇。其中德育三十篇颇具特色，它重于辨别疑似，如：“文明与奢侈、理信与迷信、循理与畏威、坚忍与顽固、自由与放纵、镇定与冷淡、热心与野心、尖锐与浮躁、果敢与鲁莽、精细与多疑、尚洁与太洁、互助与依赖、爱情与淫欲、方正与拘泥、谨慎与畏葸、有恒与保守”等，十分契合面临多种价值观念的人们修养品性、判明良莠的需要，堪称难得的修身教材。8月，蔡元培与李石曾等编撰的《旅欧杂志》正式创刊，这个半月刊“以交换旅欧同人之知识，及传布西方文化于国内为宗旨”，是反映旅欧华人思想及活动的主要园地。在这个刊物上，蔡先后发表了《文明之消化》和《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两篇文章，足以代表这一时期他的文化主张和政治思想。

《文明之消化》一文的主旨是，学习和吸收西方文明，应当有所甄别，如同人体摄入养分，需要选择食物，倘囫圇吞之，必致消化不良。文章指出：“欧洲文明，以学术为中坚，……而附属品之不可消化者，亦随而多歧。政潮之排荡、金力之劫持、宗教之拘忌，率皆为思想自由之障碍。……审慎于吸收之始勿为消化时代之障碍，此吾侪所当注意者也。”可见，蔡元培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较之两年前撰写《学风》杂志发刊词时，已经深入冷静得多，这一前一后两篇文章颇有相辅相承之效，展示了作者在学习西方文明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轨迹。《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一文，系写于袁世凯败亡归葬、黎元洪走马继任之时。文

章认为，“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蔡元培理智地意识到，在袁氏专制劣迹的背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恶性基础，此乃造就历史丑角的温床。他不无感触地写道：“中华民国约法，有责任内阁之制，而当时普通心理，乃不以为然。言统一，言集权，言强有力政府。于是为野心家所利用，而演出总统，又由总统制而演出帝制。此亦崇拜总统、依赖总统之心理有以养成之。”因此，革新政治，关键在于改造社会。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在致友人的信函中明确表示：将来回国后，“必不投身政治之漩涡，而专在社会间效力。”^①

旅居法国的三年，由于涉足社会公务，蔡元培在治学著述方面不像在德国时那样专注，与商务印书馆议定的编书计划亦大体未能完成。最先着手编写的《文字源流》，是一本“小学”入门著作，蔡原本精于此道，又颇有兴趣，但因缺乏必要的参考书，只得从《说文解字》中逐一钩稽，编成二十课后便停顿下来。之后，转而编译《哲学大纲》一书。这本哲学导读性著作，是他参照德国李希脱尔《哲学导言》和泡尔生、冯特的《哲学入门》两书编译而成，其中除“历举各派之说”外，在“宗教思想”一节则阐发了他自己的独特见解。此书于1915年1月初版，至三十年代初已出至十一版，是一本受读者欢迎的“引人研究哲学之作。”早在任职翰林院后期，蔡元培受前人徐时栋观点的启发，深信《红楼梦》为影射小说，乃开始考证工作。在法期间，他将疏证旧稿加以整理，又按商务编辑的提议作一结束语，辑成《石头记索隐》，于1916年上半年在《小说月报》的“名著”栏连

^① 《复蒋维乔函》，《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395页。

载。蔡氏之说在红学研究领域引发争议，学术界乃以“索隐派”目之。其实，蔡的兴趣仍然集中于美学及美术方面，他自选题目，拟编《欧洲美学丛书》和《欧洲美术小史》，但直至回国之前，仅撰成《康德美学述》、《赖斐尔》各一卷。其中《赖斐尔》于1916年8月在上海《东方杂志》刊出。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国内政局出现转机。7月间，范源濂出任教育总长，他表示，要“切实实行（民国）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其时，浙籍人士陈介石、马叙伦等提议迎请蔡元培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沈步洲亦极力促成此事，范源濂征得当轴首肯，即致电于蔡。电文谓：“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①对于蔡元培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缘。推进祖国高等教育的抱负，以及从思想文化入手改良社会的宿愿，似乎均可藉此去施展，去实现！他没有理由推却这来自故土的召唤。

10月，蔡元培启程回国。这位教育家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即将来临。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第35页，中华书局1980年。

第4章 主持北京大学的六年

4.1 学术至上

民国五年（1916）初冬时节，蔡元培回到上海。“二次革命”后流居海外的一班同志已经陆续归来，可是在他抵沪的前一个星期，革命挚友黄兴却已长辞人世。追念故人，不胜依依。他慨允为亡友撰写碑文，随即托请黄的同乡章士钊等代觅有关资料。其间，回故乡绍兴小住数日，旋即返沪。多数友人对他就职北京大学之事不甚赞同，认为北大腐败，颓风难挽，整顿不成，徒毁名誉。但有的朋友却主张不妨前往一试，即令失败，亦已尽力。后者的意见颇合蔡元培的心愿，遂于12月下旬北上进京。抵京之后，他与范源濂、沈步洲等商讨数次，觉得“北京大学虽声名狼籍，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翌年1月4日，蔡到校视事。在其后不久写给尚在国外的汪精卫的信中，他陈述了自己的心迹：

“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这位笃信“教育救国”理想的教育家主观上认定，担任大学校长是办教育，而非做官。故而，到京之初，他在接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出不涉政界之决心。”^①显然，他企望通过整顿教育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而避免直接卷入政治，陷入纷扰。可以说，这至少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初所抱定的一个宗旨。

创立已近二十年的北京大学，对蔡元培来说，并不生疏。戊戌年间，作为变法新政之一的京师大学堂创办之时，他正在翰林院任职，其好友张元济即受命出任大学堂总办一职。八年之后，蔡担任大学堂所属译学馆的国文教习，并兼授西洋史，任教虽仅数月，却颇得学生推重。又过了六年，他主政教育部，改定大学名称，推荐校长人选（严复），变革学科设置，还亲临校内发表演说，倡明“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他与曾先后主持该校的吴汝纶、马相伯等人亦均有交往。应当说，对于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兴废利弊，蔡元培大体上了然于心，亦因如此，他才不惜违逆众意而矢志有所作为。客观地讲，产生于清末“中西并用”时代的京师大学堂暨北京大学，经过张百熙及严复等主持人的努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教学规模，尤其是进入民国之后，学生数量稳步增加，教学内容逐渐改进，呈现缓慢发展的势头。但是，与欧美近代大学相比，其校内体制、师生素质及学术风气等还存在相当一段距离。科举积习的流弊，满清末世的颓风，深深浸染了这所处在历代帝都的学府。开办之初，学生均系京官，入学雇用差人，上课起居例称“老爷”，真心求学者寥若晨星，热衷功名利禄却趋之若鹜。名为学府，实与官衙无异。后来，虽历经嬗

^① 蔡元培：《致汪兆铭函》，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6页。

变，官僚政治的遗风却难以革除。辛亥以后，学生视法科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蜂拥报考，而理工等科则倍受冷落。学风不正必然校纪松弛，一些师生甚而涉足风月场中，致使学校清名大受玷污。北大之腐败，深为一般社会所菲薄。蔡元培认为，北京“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欲救其弊，关键是将大学改造为“纯粹研究学术之机关”。^①

蔡元培作为校长，来到北大的第一天，校役们照例排列校门两旁深深行礼，以示欢迎。这位新任校长竟摘下礼帽，鞠躬还礼。向来不受重视的校役们对这一举动惊诧不已，不禁感到：这位平等待人的蔡校长与以往的校长大人似乎很有些不同。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校内发表就职演说，他向全校一千余名学生提出三项要求：“一、抱定宗旨，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其中，突出强调：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应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这番讲话，将学术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与他民国元年在此所作演说的精神实质完全相同。可是，在有的学生看来，以为不过是校长训诫学生的泛泛之谈而已，并没有立刻引起足够的重视。随后，蔡发布了一个通告：“以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原来，学生有事与学校当局接洽，须写呈文，待校长批复之后，公诸告示牌上。革除这一近乎官衙的形式，使学生们隐约感到某种清新气象。1月中旬，主编《新青年》杂志，宣扬“德先生”与“赛先生”的陈独秀应蔡之邀来北大出任文科学长，这一人事安排，使敏感的人们开始领悟到新校长整顿大学的决心和魄力。

办好一所大学，最重要的莫过于聘任有真才实学的、高水平

^① 蔡元培：《致吴敬恒函》，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1页。

的教师，以满足青年学生的求知欲望，进而诱发其研究问题的兴趣，这是培养良好校风、提高教学质量的不二法门。蔡元培深悉此理，以极大的精力，从各个方面“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进京伊始，他便采纳汤尔和、沈尹默二人的提议，决定聘任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以接替业已辞职的原学长夏锡祺。其时，陈因事来京，客居前门附近。蔡往访数次，以诚相邀，并劝其将《新青年》迁京续办，陈欣然应允，并向蔡推荐《新青年》的投稿人，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蔡翻阅有关文稿后，嘱其促胡早日来校任教。几乎与此同时，刚刚二十三岁的自学青年梁漱溟通过范源濂的介绍，慕名访谒蔡元培，并出示所撰《究元决疑论》一文请予垂教。蔡从《东方杂志》上已读过此文，对作者的佛学造旨印象颇深。此刻，他便邀梁到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梁大感意外，极力辞却。此后，蔡与陈独秀约梁商谈，多方劝导，梁终于同意任教，到1917年冬，这位并无大学学历的青年便以讲师身份走上北大的讲坛。同年4月初，经许寿裳和鲁迅的推荐，曾任绍兴教育会会长的周作人应聘来到北大，由于时逢学期中间，不宜开设新课，蔡元培先安排他在附设于大学的国史编纂处任职，到新学期开始，便聘其为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7月间，曾继严复之后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而未到任的章士钊，应聘为文科教授，主讲逻辑学，并兼任学校图书馆主任。这期间，蔡元培还曾分别函请吴稚晖和汪精卫，希望他们来学校担任学监或教学工作，但均无结果，只有李石曾“惠然肯来”，出任生物学教授。8月，学成归来，且因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爆得大名”的胡适应聘为文科教授。9月以后，曾在北大代课的钱玄同和《新青年》撰稿人刘半农，相继出任文科教授。11月，经章士钊提议，李大钊进北大担任了原由章氏兼任的图书馆主任之职。这一年，蔡元培还聘请了因列名“筹安会”而潦倒于天津的国学大师刘师培为文科教授，主讲中

国中古文学史。

新聘教师的同时，蔡元培对北大原有教师进行甄别，视其学术造诣的深浅，分别予以留聘或解聘。精通多种外语，擅长英国文学的辜鸿铭，尽管思想守旧、行为怪诞，仍留任教授之职。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素来恃才傲物，狂放不羁，因其国学根柢深厚，成果斐然，亦被留聘。此外，被留聘的知名学者还有：陈黻宸、陈汉章、康宝忠、沈尹默、马叙伦、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等。对于那些学业荒疏、滥竽充数的教师，蔡元培依照合同解除聘约，即使颇有些背景和来历的外国教师亦不例外。几位被裁汰的英、法教师扬言要与蔡诉诸法庭，此事甚至惊动了外交当局，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亲自过问，英国公使竟然造访于蔡，始而劝诱，继而威胁。然而，这些压力，都被蔡元培学术至上的正气一一顶了回去。至于个别道德沦丧、毒化校风的学林败类，他则坚决予以除名，摒之于校园之外。

由于文科自北大创办以来即居于主干地位，故而蔡元培投入较大精力首先整顿和充实这一传统领域。而对学术规模相对薄弱的理科似乎有些无暇顾及。这一状况，曾引起留美学界的疑惑乃至不满。任鸿隽、朱经农曾先后致函胡适，认为，北大“尽管收罗文学、哲学的人才，那科学方面（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却不见有扩充的影响，难道大学的宗旨，还是有了精细的玄谈和火茶的文学就算了事了吗？”甚至批评说：“大学专重文科，把理工科看得无关紧要，这种眼界太偏浅了”。^①留美学界的尖锐意见，自然有其道理。不妨说，这多少反映了美国式的大学观念与蔡元培崇奉的德国大学观念的微妙分野。然而，公平地讲，蔡元培在理念上极为尊崇科学的价值，平生倡导科学不遗余力。其主持北大，受到多方面的客观制约，科学落后的现实即其一，企

①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9、96函，中华书局1979年。

望各个领域齐头并进，同时获取显著硕果，近乎有些苛求。这一时期北大的理科，在夏元璠等原有教员的基础上，陆续从欧美毕业留学生中招聘了李四光、丁燮林、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何杰、翁文灏、朱家骅等一批杰出学者，随着他们的来校任教，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开始比较系统地输入我国文化教育领域，逐渐形成一种新知识体系。此外，法科教学也改变了先前主要由政府官员兼课的状况，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周鲠生、王世杰等专业学者相继应聘而来，法律、经济及社会科学等学科渐趋独立和完善。总之，蔡元培选聘教师，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学术造诣，在这个神圣的标准之外，不曾有第二个标准。因此，国内各方面的名流硕学及后起之秀逐步汇集于北京大学，很快便形成了崇尚学术的良好氛围，大大激发起学生们的求知兴趣，衰颓的学风骤然为之改观。

在蔡元培主持北大的第一年，便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除发布校内各种规章、消息之外，还刊登师生对于改进教学及管理工作的建议，并发表学术论文，引起论辨，活跃校内空气。鉴于北大学生彼此关系松弛、自由散漫成风的情况，蔡元培召集学生骨干，敦劝他们分别发起组织各类学会，广泛吸引学生参与，学校则在经费、设施等方面予以鼓励和赞助。随后，诸如画法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社、体育会、哲学研究会、数理学会、化学研究会、音乐会、技击会等各类学术团体相继成立，学生根据兴趣爱好，自由参加，充分表现，健康的追求逐渐取代了低级趣味。即以新闻研究会为例，蔡元培兼任会长，以其办报体验及对新闻事业的独特见解，数次发表演说，从学理上阐发新闻与史学的异同；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为副会长，宣讲新闻理论及采编业务。该会还邀请著名报人、《京报》社长邵飘萍来校讲解他捕捉各类新闻的经验和技巧。凡此种种，使得教师与学生、知识与趣味融为一体，校园生活变得多彩多姿，丰富充实。

1917年底，蔡元培与其他国立高等学校校长陈宝泉、汤尔和、金邦正、王家驹、张谨、洪谔等倡议组织“学术讲演会”，“以传布科学，引起研究兴趣为宗旨”。他们刊登启事称：“我国近年所以士风日敝、民俗日偷者，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学术消沉，实为其重要之一因。教者以沿袭塞责，而不求新知；学者以资格为的，而不重心得。在教育界已奄奄无气如此，又安望其影响及于一般社会乎！同人有鉴于此，特仿外国平民大学之例，发起此会，请国立高等学校各教员，以其专门研究之学术，分期讲演，冀以唤起国人研究学术之兴趣，而力求进步。”该讲演会自1918年2月以后每星期日上午举行活动，其办事处即附设在北京大学内。

蔡元培深知，大学教师要革除年年抄发旧讲义的陋习，而不断提高授课水平，就必须在教学之外从事必要的学术研究。到校一年之内，他便要求各学科成立相应的研究所，由专业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共同研讨学术问题。最先创办并坚持开展活动的是国学研究所，其中的小说科由胡适、刘半农、周作人及两名学生组成。他们定期举行学术讨论，根据研究所得分别作了《论短篇小说》、《中国之下等小说》、《日本近代小说的发展》等专题报告，既浓厚了学术风气，也促进了各人研究问题的深度。当然，北大各学科研究机关的建立需要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但蔡元培力主创办研究所的主张，使得素以完成教学为满足的中国大学增加了科学研究的成份，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文化教育界固守已有知识不求进取的积习。为使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文化，蔡元培与张元济协议，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北京大学丛书”，分批出版北大教师的学术著作。1918年7月，张元济访问北京大学，与蔡元培、陈独秀、夏元瑛及各科教授座谈，磋商丛书出版的具体事宜。两个月后，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陈映璜的《人类学》和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作为第一批北大丛

书正式出版。对于某些立意新颖、方法独特的开创性学术专著，蔡元培极为欣赏，热情推荐，曾先后为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徐宝璜《新闻学大意》、黄右昌《罗马法》等书撰序，扶助青年学者迅速成长。1918年秋，他又提议创办《北京大学月刊》，作为师生发表学术论文的专刊，并为之撰写发刊词，系统阐发学术自由的宗旨，该刊遂成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蔡元培这一系列举措，对于“振兴学术”产生了极大作用，史家吕思勉评述道：“北京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种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幡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的研究，才不为众所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后生小子，也知道专讲肤浅的记诵，混饭吃的技术，不足以语于学术，而慨然有志于上进了。这真是孺民先生不朽的功绩。”^①

整饬北京大学的风纪，改变这所最高学府在社会上的腐败形象，是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初即已确定的目标。当校内的学术风气开始初步确立之时，他便着手正面触及这个“难题”。1918年1月，《北大日刊》发表了校长撰写的《进德会旨趣书》，随之，校方向师生们散发了参加该会的志愿书，一股“进德”之风迅即吹拂于校园之中。作为一个清正自守的知识分子，蔡元培对弥漫于清末民初社会之上的污浊风习十分反感，民国元年他列名发起“六不会”及“社会改良会”，希望矫正世风，但实效甚微。袁世凯当政时期，收买议员，鼓动帝制，挥霍公款，投机钻营，世风日下，谬种流传。蔡从法国归来，目睹江浙一带在教育、实业各界崭露头角者无不以嫖赌相应酬，内心倍觉伤感。及至北京，方知此风尤甚，官僚阶层姑且不论，堂堂最高学府内竟存在什么“探艳团”、“某公寓之赌窟”之类名目，一些师生打牌听戏捧

^① 吕思勉：《蔡民论》，载《宇宙风》第24期，1940年5月1日。

坤角，致使学校成为“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尤其使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现象！”^①为此，他曾在南洋公学同学会和译学馆校友会等小范围内提议实行禁止嫖、赌、娶妾的“三不主义”。此刻，他确信，将进德会的主张行之于北大，乃“应时势之要求，而不能不从事矣”。北大进德会的戒规类同于民国元年“六不会”的基本内容，但会员分甲、乙、丙三种，视遵守条件的多少而定。同年5月底，进德会正式成立，教职员及学生入会者近五百人，约占全校总人数的四分之一。经过通讯选举，蔡元培为会长，李大钊等三十余人作为纠察员。陈独秀、夏元瑛、胡适、温宗禹、马寅初、傅斯年、罗家伦、张申府等知名教授和学生骨干均为会员。其实，北京大学的腐败，不过是社会恶浊风气的一个缩影，蔡元培力矫时弊，执着地开辟一块“净土”，其精神、其境界，委实令人赞佩。进德会的一纸规范尽管不可能约束所有会员的行为，然而它在改变观念、扭转校风方面还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尽快使北京大学接近和赶上欧美近代大学的水平，乃是热衷高等教育的蔡元培奋力追求的大目标。为此，他对北大的教学体制和行政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的基本思路大体仿行德国的大学观念和体制，在某些方面也参照了美国大学的现行做法，其中心主旨，是学术至上和教授治校。蔡元培始终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应当偏重于学理。因而，他特别重视文、理两科，以此作为其他应用性学科的根本。还在民国元年，他起草的《大学令》中即明确规定：“设法、商等学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

^① 《北大进德会旨趣书》，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26页。

大学。”主持北大以后，又进而主张，大学只须设文、理两科，其它偏于“术”的应用学科可仿德国之制，另设专科性高等学校，其修业年限及毕业资格与大学相同。循此，他将北大原有的工科并归天津北洋大学，以办工科的经费充实理科；取消商科，改为商业学门，归入法科。他原设想将法科分离出去，另建独立的专科学校，由于遭到多方反对，未能实行。鉴于预科自行其事，课程与本科不相衔接，遂将预科分别归属各本科，统一管理，以求一致。经过调整，北大以原有的经费，集中扩充文、理等科，使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得到突出和加强。其后，蔡元培又取消文、理界限，试行两科勾通式教学；并采纳留美教师的意见，以学分制取代年级制，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行政管理方面，蔡元培一改往昔校长独揽校政的传统，全面推行教授治校的体制：首先，成立由校长、各科学长及教授代表组成的校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决策机构，统领校政。评议员任期一年，由教授选举产生。随后，建立各学科（即学系）教授会，负责规划和组织各科教学活动，教授会主任亦经教授们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后来又设立了教务长、总务长等职，均由教授出任。教授治校的实质，是校长将权力下放，交由教学及学术活动的主干人员自行管理，切实按照教学规律兴学办校。这一体制变革，在“五四”前后的北大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清末以来历久不衰的官衙习气得到了根本性克服，一个合乎近代大学规范的新型学校渐渐出现在世人面前。

在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的第二个年头，新建的红楼竣工投入使用，这座在当时堪称雄大的建筑物，似乎象征着“学风丕振，声誉日隆”的最高学府正在焕发着的勃勃生机。

4.2 兼容并包

正经历着深刻变化的北京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学派林立，任情抒发的“自由王国”——

《新青年》杂志离沪北迁后不久，即成为事实上的北大同人刊物，它的创办人陈独秀既没有开设课程，也没有单纯投入文科学长的公务，其活动重心仍是通过《新青年》的激扬文字推动新文化运动不断升温。在他身边聚拢而来的是一批同他一样崇奉科学和民主、立志更新中国文化的激进学人，诸如胡适、陶孟和、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李大钊、周树人、周作人、沈尹默等。他们倡行白话文，创作自由体新诗，传扬西方最新学说，力主个性解放；同时，抨击封建礼教，批判孔孟传统，痛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甚至提议废除汉字……这些新派人物在北大、在全国知识界涌动起巨大的波澜，形成辛亥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内除旧布新的强劲激流。

青年学生为老师们的大胆言论所鼓舞，纷起效尤。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创编《新潮》月刊，“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杨振声、俞平伯、汪敬熙、成舍我、康白情、顾颉刚、毛子水、谭平山等一批有才华的学生参与其间，他们以评论、诗歌、小说等形式，与《新青年》密切配合，颇有“青胜于蓝”之势。

视中华文化为最高价值的刘师培、黄侃、陈汉章、林损等国学教员，对《新青年》一派的激越高论大为不满，“慨然于国学沦夷”，他们商议续编清末民初曾风行一阵的《国粹学报》及《国粹丛编》，作为护卫古学的阵地。后来终于面世的《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也确乎吸引了一些热心国学的教师和学生。那个曾宣称：“进北大，除了替释迦、孔

子发挥外，不做旁的事”的梁漱溟，对校内盛行新思潮，以致“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的气氛颇为抵触，同时，对于《国故》只“堆积一些陈旧古董”的做法亦有所保留，他独自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启示，公开征求研究东方学的同道，并组成“孔子哲学研究会”，系统研讲儒家学说，与新派人物的批孔反其道而行之。

在激进与保守的两派之间，持调和观点的也大有人在。由易家钺、许德珩、黄日葵、段锡朋等北大学生组成的《国民》杂志社，在新、旧文化问题上便具有中性色彩。这一由学生救国会派生出的刊物，仍采用文言文，其政论文章启迪国人爱国意识，宣扬新观念，而学术论文则多采刘师培、马叙伦、陈仲凡等人的著述，其创刊之际，黄侃特为之撰写了祝词。在教员中，朱希祖等亦被外界舆论视为介于新、旧两派之间持中调和的人物。

各种不同的思想主张和学术观点在北大能够各行其道、尽情表现，适足反映了校长蔡元培所秉持的办学原则和方针，那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位曾长期在欧洲学习和生活的教育家，理性地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念中的自由思想，同时，经过考察德、法等国的大学教育，确信学术自由乃各国大学的通例，不如此，便不会有发达的学术文化。他认为：“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①。在他看来，大学乃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地，应当包容各类学问、各种观点，“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

^① 《大学教育》，见《蔡元培教育论著》第488—48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

展。”他的这一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发之自然，并非出于某种功利性的策略考虑。然而，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虽说已进入民国时代，但自由民主的空气仍然十分稀薄，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人们习惯于那种定于一尊的固有秩序，相当多的读书人也未能革除“专己守残之陋见”。显然，社会政治的表层变革并不能替代文化心理的深层更新。蔡元培于民国元年曾提出世界观教育，“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但时人对他的这番用意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理解和赞同。经过袁世凯的祸殃，迟至的新文化运动方始悄然发轫。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中，蔡元培这位“自由主义者”，借助北京大学这方“圣土”，励行“兼容并包”，将世界各大学的通例行之于孔孟之乡，在传统社会瞠目结舌、啧啧非难之中，迅速改变着最高学府的面貌。

“兼容并包”主张的最初阐释，是在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他申明，大学乃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而学术研究“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可以说，这是他对中西两大文化系统所持的进取态度，也是实行兼容并包的目标引导。他尖锐批评学界存在着的株守一家之言而排斥其它学问的积习，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要拓展学术视野，必须广设学科，增进交流，这便是实行兼容并包的现实需要。他借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儒家古训，说明众家学说争鸣于大学之中，似

相反而实相成。并进一步强调：“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期望通过《北大月刊》的印行，使外界了解“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习相绳。”借助国学经典，陈说世界通则，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传统和时代两方面求得合理性，从而使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开放、多元和自由选择的气氛中得到完善和发展。这便是蔡元培“兼容并包”主张的底蕴所在。

根据这样的办学宗旨，蔡元培在选聘教师、安排课程、丰富课外活动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广泛的包容性。他意识到，陈独秀等人编撰的《新青年》杂志代表了辛亥革命以后思想文化界的进步潮流，足以指导青年学生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认知境界。因而将这些时代精英纳入北大的教师阵容。陈独秀进入北大之后，由于锐意推进新思潮，加之性格耿介而有时又细行不检，招致一些同人的不满和议论。蔡从大处着眼，对陈极尽维护之力，保障其启蒙事业不致夭折。与此同时，许多在中国旧学方面研究有素的学者，也被蔡元培请入北大，并得到应有的重视。研治经学、造诣颇深的崔适，著有《春秋复始》等书，对《公羊春秋》详解有加，阐释甚明，蔡便邀请他开设课程，讲述研究心得。精通中国戏曲艺术的专家吴梅，擅长词曲，蔡请其担任国文系教授，从而使先前视为“淫词艳曲，有伤风化”的词曲艺术，被作为一门学问而占有一席之地。素以研究殷商甲骨文而著称于世的罗振玉、王国维，亦曾受到蔡的邀请，王还一度允为担任北大研究所国文门的通信导师。诚如当年北大学生顾颉刚所言，蔡先生聘任教师“不问人的政治意见，只问人的真实知识”。正因如此，象辜鸿铭、刘师培那样政治上保守反动的人物，因其确有学识，亦被延聘。各类学者相继踏上北大讲坛，使这所大学的课程表空前的博

杂：在经学方面，既有主讲今文学派的崔适，也有古文学派的刘师培；在文字训诂方面，既有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也有其他学派的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宗汉魏的黄侃，同时并存；在政法方面，有英美法系的王宠惠，又有大陆法系的张耀曾；在外语方面，也一改以往仅偏重英语的倾向，增设法、德、俄等国语言文学，甚至还将世界语列入选修课……在此基础上，蔡元培努力实践其“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他希望人家发展个性，他鼓励人家自由思想，他惟恐人家不知天地之大，他惟恐人家成见之深，他要人多看多想多讨论。”在比较和选择中，确立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和学识基础；在比较和竞争中，自然完成对各种学派、各类观点的择优汰劣。无疑，“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内含着发展教育和学术的客观运行法则，北京大学的变化和进步，证明了“兼容并包”方针的可行和有效。

其实，蔡元培提出并付诸实行的“兼容并包”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及其“融和中西文化”的思想。他早年饱读儒家经典，并登临科举阶梯的顶端，中年以后，激于时变转而涉猎西洋文化，以至数年旅居德、法，深入接触欧洲文明，充分感知西方人文的精神实质。从而形成了多元、立体的文化价值观念，认定“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和时代”。他认识到：一个民族要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必须具备两项条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文化以为滋养料。”^①这即是说，在并不毁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前提下，积极引入外来文化成果，通过并存与竞争，造就一个既有根基又不乏活力的适合时代的融和型文化。他认为，“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创造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往往发端于几种文

^① 《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目录序》，见《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484页。

化接触时代。”^①没有接触，便无融和、创造可言。这位矢志培育新文化的教育家，一方面“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专制做法，另一方面，力主“对于新思潮要舍湮法，用导法，让它自由发展，定是有害无害”。因此，促使中西两种文化接触、融和的必由途径，便是实行“兼容并包”，舍此别无选择。就学术文化而言，蔡元培确信，“思想学术，则世界所公，本无国别”。他曾多次表明这样的观点：学术的派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并非永远不相容的。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点也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应当说，蔡元培实行的“兼容并包”，为旧学提供了求得更新发展的可能性，为新学开辟了立足和张扬的空间，这就使中国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争奇斗艳、百家鸣放的活跃局面。五四新文化的空前繁盛与北京大学推行“兼容并包”方针有着显而易见的因缘关系。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兼容并包”，成为日后中国知识界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人们或以此印证学术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或从中揣度蔡本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基本偏向，甚或藉此伸张文化压抑状态下扭曲的正当要求，等等，不一而足。即使当年新文化阵营中人对此的认识亦颇不一致。青年教授胡适认为：

“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似乎在埋怨校长未能独力扶助新学。陈独秀则不同意这一看法，在致胡的信中写到：“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展；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

^① 《在檀香山华侨招待太平洋教育会议各国代表会上的演说》，见《蔡元培全集》第72页。

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①二十多年后，陈独秀及蔡仍赞叹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②看来，在此问题上，陈独秀较之胡适更能理解“兼容并包”的深刻意义。曾经作为《新青年》重要成员之一的周作人，在其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谈到“兼容并包”主张时却认为，“我以为是真正儒家，其与前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持此以判断事物，以合理为止，所以即可目为唯理主义。”^③周氏一生思想起伏颇大，暮年冷寂深沉，所发议论不失独特精到之见。梁漱溟曾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评论了蔡的个性与兼容并包的关连，他在四十年代初所写一篇文章中指出：“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北大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包容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才是真器局，真度量。”^④他认为，实行兼容并包乃蔡之至性所致，寻常人是不可企及的，这番论说，多少有些玄奥，然其知人论事的识见不可谓不深刻。当年的北大学生冯友兰在七十年代后期口述自传时，忆述在北大的感受说：“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

① 陈独秀：《致胡适》，转引自周天度《蔡元培传》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 陈独秀：《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69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③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78页，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

④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见《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25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

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①这一观点目前在学术界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编年中，思想文化的百家争鸣局面仅仅在短暂的时刻出现过几次。每一次百家争鸣局面的到来，都为人才涌流、思想创新和文化建设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优越环境，其观念定势往往影响后世的几代人。这思想上自由“狂欢”的辉煌时刻，常常令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珍念不已。“五四”之前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带着历史的启蒙使命，由实行“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辐射于九州方圆，形成近代中国第一次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学术文化风气由此为之改变。人们如此高度评赞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做法，其根由或许就在于此。“兼容并包”主张的思想根基是学术至上和思想自由，蔡元培牢牢地把握住这两个原则尺度，不因一己的爱好和倾向而有所变通，从而在校内真正造就了一种学术民主的空气，也在相当程度上赢得各方面的广泛敬重和拥戴。即使顽固守旧的辜鸿铭于校内也信服蔡的领导，在“五四”之后的“挽蔡”活动中同样维护其权威。固守旧学的黄侃甚至对人表示：“余与蔡子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子民外，亦无能余之人。”^②当年北大的教师戏称其校长为“古今中外派”，颇为贴切地说明了蔡元培实行“兼容并包”方针所保持的“超然形象”。正如梁漱溟所说：“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25—326页，三联书店1984年。

② 关于辜、黄对蔡的态度，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蔡子民”节和周天度《蔡元培传》第104—105页。

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①

4.3 “五四”前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方面的胜利，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建议”，在中国知识界鼓荡起强烈的政治激情和对未来的乐观向往。人们欢庆“公理战胜强权”，以为倍受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从此可以摆脱厄运，踏上坦途。原先决计致力文化建设的学人们，再也掩抑不住热衷社会政治问题的兴致，《新青年》杂志遂衍生出政论时评性的刊物《每周评论》。这一对世界时势的浪漫估计和新文化运动的重心移动，构成五四运动得以勃发的直接潜在因素。

在此过程中，作为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蔡元培的言动是引人注目的。他曾目睹欧战爆发之初的残烈景象，对战时欧洲亦颇多观感，随着战事的演变，他内心所接受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思想更为坚定了。他认为，“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相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自十九世纪末年以来，由于严复《天演论》的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在中国知识社会中几乎独领风骚，少数知识分子有幸接触西方其他社会学说，对“优胜劣败”一类观点有所丰富甚或修正。蔡元培即代表了思想界这一动向。1918年11月，当北京城内完全沉浸在欢腾气氛之中时，他与北大同人及社会名流在天安门广场连续演讲，即广泛宣扬其“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的信念，为欧战结束后的乐观情绪注入了思想旨归。中国虽然宣布参战，但派往战区的却是几十万华工，劳工们用艰辛和汗水，为祖国换得“战胜国”的名义。欢庆之际，蔡元培没有忘记

^①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见《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24页。

劳工们的作用，特意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说。他以罕见的激情大声疾呼：“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这个给时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说，反映了蔡元培“泛劳动”的激进平民思想，在同类场合的演说中别具一格，尽管还看不出它与一年前发生在俄国的工人革命有何直接关连，却为日后中国工农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养份。

从这时起，蔡元培亦复明显涉足社会政治领域。自民国建立以后，对于国内政治争端，他基本倾向于和平解决，不赞成诉诸武力，即使对于高扬护法旗帜的南方政府亦是如此。由于欧战结束，国内的和平呼声大起，旨在终止南北分立的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国民制宪倡导会等相继成立，蔡元培参与了上述组织的初期活动。1918年11月18日，他致函孙中山，婉劝其赞同南北和平，提挈同志，共同营造民主政治的基础，“倘于实业、教育两方面确著成效，必足以博社会之信用，而立民治之基础，较之于议院占若干席，于国务院占若干员者，其成效当远胜也”。此后不久，他又与熊希龄联名致函孙中山，以和平期成会负责人名义，恳请其“大力匡勸”。孙中山于12月4日复函蔡元培，表示，争取和平，应是有法律保障的和平，敷衍苟且，只会暂安久乱；欧战之后，公理大昌，要实现真正的共和政治，决非少数暴戾军阀所能做到。因而要“贯彻初衷，以竟护法之全功，而期法治之实现”。^①显然，孙、蔡二人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上的具体主张并不一致。蔡似乎更多地倾向于维护一个公认的中央政府，在统一、和平的条件下，通过发展实业及教育，奠立共和政治的社会基础，逐步完善国家体制。孙则保持了一个革

^① 蔡、孙来往之信函，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20—221页。

命家的本色，为了民主共和的目标，毫不妥协，执着地进行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政治抗争。他们二人的民主价值观大体相同，但外在表现形式在排除满清之后却有某些不同。在国内和平问题上，二人基本上各行其道，谁也没有说服对方。

与此同时，蔡元培与教育界人士发起了“退款兴学”运动，促使西方列强退还庚子赔款，用以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同年12月，他与陈独秀、夏元瑛、黄炎培、沈恩孚、王兼善等人联名提出《请各国退还庚款供推广教育意见书》，吁请各界借助欧战结束后有利的国际条件，敦促各国将“此后每年赔款，悉数退还吾国，专为振兴教育之用度”。并进而提出“促成此事之方法”，即上书行政当局，请其赞助；致函各国贤达人士，求得支持；发动国内外舆论，造成声势等等。此后，他即与学界同人着手进行具体工作。是年底，梁启超、叶恭绰等赴欧考察，并旁听巴黎和平会议，蔡特意拜托他们，请其向各国宣传退款兴学主张，扩大影响。翌年4月，他又致函在法国的李石曾：“运动赔款退还一事，已由北京及上海各教育机关推定先生及陶孟和、郭秉文二君在欧办理。郭、陶已到美洲，不久赴欧。对于英语各国，以郭为代表；对于法语诸国，则当请先生为代表。”^①其后，李、郭等人开始在英、法朝野进行退还庚款的游说，退款兴学运动自此发轫。至1921年，北京政府因参战而缓付庚款五年的期限已满，运动勃然达到高潮。此后，有关的交涉持续进行，直到三十年代初方告结束。在此过程中，蔡元培精心擘画，多方奔走，始终是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

北京大学的诸多改革措施，尤其是陈独秀、胡适等人汇集北大之后，迭发抨击旧思想旧学术、倡行白话文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固守道统的人们对此类“离经叛道”行为大为不

^① 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87页。

满，皆视蔡元培为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责任者。就蔡个人而言，对于《新青年》等刊物上的各种言论未必都能赞成，但在传扬科学的价值、反对独尊孔孟、使用白话文以改变国人“言文不一致”现状等方面，他与陈、胡一派的主张基本相同。而这些，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内容。尽管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确实做到了容纳各方、兼收并蓄，但对陈独秀等人的扶持和保护亦十分明显。因此，他愈来愈感受到来自传统社会的压力。1919年2月间，桐城派古文家林纾在上海《新申报》的“蠡叟丛谈”栏目中先后发表影射小说《荆生》、《妖梦》，诋毁北京大学的革新力量。其中，以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影蔡，述其对校内教师毁伦常、倡白话之举动“点首称赏不已”，结果为阎罗妖所吞杀，化成一堆“臭不可近”的粪土。诚如胡适所言，这类“游戏文字”，“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与此同时，林纾还在北京《公言报》开辟《劝世白话新乐府》一栏，复行先前为《平报》撰写白话讽谕新乐府之例，“遇有关世道人心题目，即出一篇。”并称言：“琴南年垂七十，与世何争，既不为名，亦不为利，所争者名教耳”。这位当年曾以译述《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等西洋文学作品而风靡一时的文坛骄子，此刻却成了新思潮反对派的代言人。上述间接地影射攻击似乎尚嫌不够，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公开发表《致蔡鹤卿元培太史书》，陈述他对学界前途的“悲悯之情”。

林、蔡二人均科举出身，先前曾有过交往。蔡出长北大之后，有人提议聘林任教，蔡认为林的那套桐城古文功夫已过时，未予延揽。不久，一位名叫赵体孟的人，为出版明季遗老刘应秋的遗著，函请蔡向商务印书馆代为先容，并请其介绍梁启超、章太炎及林纾等名流为遗著题字。为此，蔡致函林氏，告知此事。林却借机发作，回复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略谓：大学为全国师

表，五常之所系属。但近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用以哗众，必以覆孔孟，铲伦常为快。且实行白话，尽废古书，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更有甚者，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切不可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很明显，林纾将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改革斥责为“尽反常轨，趋怪走奇”，对新文化倡导者们更是极尽诋毁，即使市井传言，亦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且词令间充斥教训口吻，俨然一派“伸张正气”之概。《公言报》在刊载林氏公开信的同时，还发表一篇《请看北京学界思潮之变迁》的文章，此文以貌似客观的笔调，指出，北大自蔡元培任校长后，气象丕变，尤以文科为甚；进而评述校内各学派及其主张，指责陈独秀、胡适提倡新学、否定传统，“其卤莽灭裂，实亦太过。”^①

面对传统社会的强劲挑战，蔡元培没有保持沉默或退缩，他于林氏公开信发表的当日，便写就《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寄交《公言报》于4月1日发表。他首先表明，虽林氏原函称“不必示复”，而“鄙人为表示北京大学真相起见，不能不有所辨正”。他指出，林责备北大各项，多据外界纷传之谣言，并非真实情况，如此混淆真伪，实在有悖其爱惜大学的本意。其后，他论事说理，对林氏公开信中“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的指责进行有力地申辩。他写到：北大教员中开设涉及孔孟学说之课程者所在多有，其中尊孔之人亦非少数，岂有覆孔之虞？即使“《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

^① 《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

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校内所组织之进德会，增进道德风尚之意甚明，岂有铲除人类伦常之理？至于文言与白话，仅仅形式不同而已，并非势若水火，两不相立，谨严之文言，于授课之时，亦须通俗之白话讲解。善作白话文的胡适、钱玄同、周作人诸位，其古文根底甚深，有著述可资为证，并非以白话藏拙，逊于先人。最后，他重申自己办学的两种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因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他强调，教员授课，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为界限，其校外之言动，本校既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况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蔡氏的复函，分明是一篇为北京大学洗去“不白之冤”的辩护词，通篇平实深沉，重在说理，毫无意气轻浮之态，于细谨的辨白之中，申述坚定的办学主旨和革新意向，人情入理，不卑不亢，恰到好处地护卫了新思潮的生存权利，同时也避开与守旧顽固势力正面激烈冲突。

林、蔡二人的信函，一来一往，一攻一守，反映了“五四”前夕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内的矛盾对立。这种相对意义上的观念论争，往往不可避免地引来传统社会的政治介入。刘半农曾回忆说：“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地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刻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①蔡元培作为北京政府的简任官，当然更能感到来自权力中枢的不安与干扰。大总统徐世昌几次召请蔡等

^① 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目》，见《半农杂文二集》第354页，上海良友印刷公司1935年。

学界人士，亲自过问“新旧两派冲突”之事；势焰正炽的安福系成员甚至提出撤消蔡的校长职务，整饬北大文科。一时间，各种谣言沸沸扬扬，不胫而走。3月26日，对北大的兴革尚能理解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也致函予蔡，对《新潮》杂志大胆批评传统社会的言论表示担忧，内称：“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辨难，因辨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并且劝导说：“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他企望北大师生“遵循轨道”，稳健行事。蔡元培于一星期后复函傅增湘，这封由傅斯年代写的信函略如蔡答林纾函之格调，一方面坚信“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另一方面则恳请总长代为“消弭局外失实之言”，同时也表示：“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问之竞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①就此函而言，蔡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对傅增湘来函所提要求基本予以合作，至少在字面上没有拂逆这位同样承受很大压力的教育总长。

其实，蔡元培此时正为北大新派内部的问题所困扰。高擎新文化大旗的陈独秀，以其明快的思想和洒脱的文笔，开辟出思想启蒙的崭新局面，成为众多新青年仰慕的偶像。可是由于他在个人生活方面不够检点，嫖娼丑闻被公诸报端，以致舆论哗然，议论蜂起。反对派对此不无炫染，而新派人物却无以为辨。此事无疑使蔡元培陷于被动、难堪的境地。社会上反对新思潮的人扬言要将陈独秀逐出北大，而先前向蔡推荐陈的汤尔和、沈尹默等人此刻也坚决主张解聘其职。蔡欣赏陈的才干，辛亥之前从事反清革命时即对其苦撑局面，独力办报的精神产生“一种不忘的印象”！两年来的合作共事，尤其是《新青年》北迁之后在思想文

^① 傅、蔡来往信函，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84—286页。

化界开创的新格局，愈加使蔡感到这位新文化运动主将的不可缺少。面对内外压力，蔡最初并不让步，甚至不惜自己被革职。然而社会道德牵引下的公众舆论，其力量是强大的，作为进德会的倡导者，蔡亦自有苦衷。几经商议，最后不得已采取变通方法免去陈文科学长之职，留聘为教授，校方给假一年。显然，这是一个折衷的处置办法，不难想象在此过程中蔡元培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应当说，在新、旧思想尖锐对立的情势下，陈独秀引发的风波早已超出了“评斥私德”的范围，而成为新旧较量的一个热点。蔡元培执意将陈独秀留在北大，其用心可谓深远。

1919年春天，正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越来越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在“公理大昌”的心理作用下，人们期待中国外交获得前所未有的大成功。2月中旬，蔡元培与汪大燮、林长民、王宠惠、熊希龄等人组成国民外交协会，旨在作为政府外交的后援。他们致电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要求其据理力争，一举收回先后被德国、日本侵占的山东主权。可是，随着夏季的临近，从西边传来的竟是令人大失所望的讯息：和会决定将德国原在山东掠得的权益悉数让予日本，此决定分三条写入《凡尔赛和约》。5月的最初两天，上海《大陆报》和北京《晨报》分别披露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惨讯。人们终于明白：强权依旧蔑视公理，贫弱的中国仍是列强的俎上肉，于是激愤的情绪开始蔓延。5月3日，蔡元培从汪大燮那里得知：北洋军阀操纵的钱能训内阁已密令中国代表签约。这是一个危急的时刻，他迅即召集学生代表，告知这一消息，同时与王宠惠、叶景莘以北京欧美同学会名义急电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劝诫其切勿在和约上签字。北大学生闻风而动，当晚即在北河沿第三院礼堂召开大会，议决将原订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活动提前到翌日进行。5月4日下午，北大等校的三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随即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而三十余

名学生亦遭警方拘捕。

对于这一事件，蔡元培的心情颇为复杂，甚至矛盾。他个人认为，辛亥光复之后，全国学风应从热衷政治转为潜心学业，不鼓励学生涉及政事。民国元年，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即已表明这一观点。“五四”前一年，北大学生因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而前往总统府请愿，他曾出面阻止，并一度辞职。但此次中国外交失败，令他痛心疾首，环顾国人，惟有热情明达的青年学生勇于率先表达民意，而这在冷漠麻木的社会里尤显难能可贵。因此，得知学生将采取行动，他没有象一年前那样全力阻止，而是保持某种“放任”姿态。虽然当年北大学生的诸多回忆不乏相互矛盾的细节记述，但蔡内心同情乃至赞许学生的爱国举动是毫无疑问的。当然，由于运动而停止课业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至于焚宅殴人的“越轨之举”更非其意料所及。然而不管怎样，当学生与政府形成对立之后，他的处境变得十分困难。政府方面认定此次学生运动与北大平日提倡新思想有关，蔡随即成为众矢之的，安福系进而提出查封北大，惩办校长。在紧张严峻的形势下，他不慌不惧，一方面与政府周旋，减缓压力；一方面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与各国立学校校长奔走营救被捕学生，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如愿。此时，“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持不作不休的态度”，身为校长置身其间，他感到已难有作为；而权力上层正拟议由马其昶取代他出长北大。在此情况下，蔡元培于5月8日夜正式提交辞呈，第二天清晨便悄然离京赴津。

校长辞职出走，北大师生既震惊又困惑。特别对他离京前留下一纸启事中所引僻典，“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颇为费解，甚至以为蔡校长有责备学生之意。10日午后，北大职员段子均从天津带回蔡致学生的一封信，内称：“仆深信诸君本月4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一国民，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5日

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①这封信，道出了作为国民与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的矛盾心理，也解释了何以事件发生数日后才辞职的原由。北大师生及北京教育界迅即发起“挽蔡”运动，要求政府明令挽留蔡校长。学界“挽蔡”出诸挚诚，而政府方面的所谓“慰留”则虚应故事，毫无真意。蔡元培在天津逗留数日，旋即南下远走沪、杭，息影于西子湖畔。几年来在北大经历的风风雨雨，确乎使他感到疲惫，而北方社会浓重的官衙旧习更令人厌烦。置身这湖光山色之中，返朴归真而惬意自如，辛劳奔波了大半生的蔡元培此刻确曾萌生摒除尘嚣，寄情山水，著书译书，就此终老的意念。他草拟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以惊人的率直倾诉了不愿再任“半官僚性质”、“不自由”的大学校长的心曲。其堂弟蔡元康显然认为这篇文字不宜发表，遂以自己的名义在《申报》刊出启事，称：家兄患病，遵医嘱屏绝外缘，俾得静养云云。这样，蔡元培便得到了一段相对宁静的“世外”生活。

在这段时间里，他最终完成了出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工作。李慈铭一生坚持记日记四十年之久，文字达数百万言，其中对清代同、光朝政和北京等地社会风貌有生动具体的记述，尤其是大量的读书札记，文史价值甚高。李病逝后，蔡受其家人之托，对七十余册李氏日记曾作初步整理，以备刻印。后来，沈曾植、缪荃孙、刘翰怡等人先后筹划印行该日记，均未能实现。1919年初，蔡元培得知李慈铭的藏书将要出售，立即与友人商定：“仿曾湘乡日记例”，以影印方式刊出李氏日记。他约请张弧、傅增湘、王幼山、王式通四人作为发起人，谋求社会的支持，得到李的故友及文化出版界人士的大力赞助。蔡进而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议定出版事宜。此刻，闲居沪、杭，他得以

^①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95—296页。

专心致力于日记的编印。其间，李慈铭之侄璧臣带来日记六十四册（另有九册由樊增祥取走），蔡翻检后与之商议，决定先印同治癸亥至光绪戊子，即1863—1888年的日记五十一册，取越缦堂为其共名，以浙江公会名义付印。此后，从送交书稿，审定书样到题签书名，商议书价，蔡都亲自经手。至1920年，《越缦堂日记》终于影印问世。

命运似乎注定蔡元培不可能做“世外之人”。由青年学生发起的“五四”爱国运动，随着工、商阶层的参与，终于实现了拒签和约、罢免曹、陆、章的目标，北京学界的“挽蔡”亦随之成功。6月下旬，沈尹默、马裕藻、狄福鼎等北大的师生代表相继南来，力劝蔡取消辞意，返校复职。北京政府教育部亦派员促驾。同时，各方面敦劝其复职的函电纷纷而至。众意难违，蔡乃于7月9日通电放弃辞职。然此时胃疾复发，难以即刻北上，他电请北大温宗禹教授继续代行校务，却被坚辞，这样，正在江苏教育会任干事长并主编《新教育》杂志的蒋梦麟便以蔡个人代表身份进入北大暂主校政。此后，尽管安福系曾尝试以胡仁源、蒋智由取代蔡元培，但在北大师生的锐意抗争下均未得逞。不过，经历此番风潮的学生还能安心学业，服从管理吗？蔡的一些朋友担心此后学生“将遇事生风，不复用功了”。蔡本人对“五四”以后学生界的认识要积极、全面一些，但也认为有必要做些“善后”引导。他于返京之前与学生代表谈话或公开致书全国学生，均阐发了这样的观点：此次运动，学生唤醒国民，作用重大，然牺牲学业，代价不轻。青年救国，不可单凭热情，主要应靠学识才力，因而目前应当力学报国。由此，他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他十分赞赏北京学界关于“恢复五四以前教育现状”的主张，其中显然含有重建学校秩序、继续全力进行文化学术建设的用意。正是怀着这样的想望，蔡元培于9月中旬回到北京，重主校政。返校伊始，他便提出进一步完善校

内体制，使之不因校长的去留而影响校务正常运转。为此，拟议组织行政会议和各专门委员会，负责日常校务。进校不久的蒋梦麟受命通盘规划，具体实施，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教育学博士组设总务、教务两个职能机构，并聘请各系教授充任财政等专门委员会委员，使北大行政方面的教授治校更形完备。此后，蒋作为总务长，成为蔡最为倚重的助手，每每蔡离校远行，均由蒋代理其职。

“五四”之后的北京学界呈现更加自由活跃的局面，各种思想广为传播，各类团体大量涌现，蔡元培仍旧兼容并包，任其自由竞争。胡适、陶行知等簇拥他们的美国老师杜威博士四处讲学而久居北京，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理论喧腾于一时；景仰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李大钊从1920年起兼任教授，其新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和史学理念开始流行于青年中间；新文学运动中诞生的一代文豪鲁迅正式受聘在北大讲坛研讲其独步一时的中国小说史；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也走出四川谷地来到最高学府，继续点评先秦诸子；就是那位从官场上被迫退出来而转向学术竟成果斐然的梁任公，也不时涉足北大校园登台演说，阐发学理、与人论辩……这一时期，蔡元培一仍其信奉的互助论思想，对周作人积极倡导的“新村主义”颇感兴趣，曾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评论周氏所译日本新村倡办人武者小路实笃的著作，并对青年学生发起成立的工学互助团给予热情赞助。正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他在北大内部大力推行平民教育。他认为，五四运动带给学生的最大收益，是他们由此感受到启迪民智的极端必要性，从而能够以空前的热情利用课余举办平民夜校和星期演讲会，编印通俗刊物，这是极为可贵的行动。对此，他不仅高度赞许，而且从校方的角度提供财、物支持。1920年1月18日，北大平民夜校开学，他发表演说，称这一天“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此前，悬挂在马神庙北大门前那块仿佛虎头牌

一般的匾额被摘了下来，这无异象征性地撤除了横在最高学府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一道传统屏障。这样，相当数量的校外旁听生便自由地登堂入室，选听课程，构成一派自由、开放办学的宏大气象。应当说，这气象来自蔡元培的教育理想、来自五四之后那活跃舒展的社会文化氛围。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这个事实上的“男子学校”也开始出现女生的身影。王兰、邓春兰等九位勇敢的女性先后以旁听生身份进入最高学府，同年暑假，她们通过入学考试成为北大的正式学生。为她们入学敞开大门，开放绿灯的是蔡元培。当时，有人责问他：招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他回答道：

“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三言两语，于轻描淡写之中，智巧地破除了传统束缚，开创出我国大学男女同校的先例。此举，对于封建守旧的中国社会不啻是一种挑战。刚刚经过直皖战争而取代皖系控制北京政权的直、奉两系首领曹锟、张作霖，在中央公园的一次宴会上，竟忽然谈起“姓蔡的”，指其实行男女同校等举措为“闹得很凶”，以至要“看管他起来”。这一动向，引起蔡及其朋友们的警惕，李石曾为了减缓矛盾、免生意外，遂运动政府派蔡赴欧美考察。1920年10月，蔡元培告别北大师生，陪同杜威和到华不久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赴湖南长沙进行学术讲演，他本人亦就文化、美学及教育等问题作了七次系列性演说。一个月后，便束装启行，踏上赴欧美考察的漫长旅程。

4.4 欧美之行

蔡元培此次远行，固然是由于军阀暴戾而促发，但学界需要他在国外办理的事务却并非可有可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各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均发生一定变革，对此加以

考察，显然有益于“五四”之后国内的文化建设；学界发起“退款兴学”运动之后，各国反应不一，要实现这一设想，尤需教育界有力人士之推动；规模颇大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随着法国战后经济形势的恶化而陷入困境，对这一棘手问题，必须做出处置；北京大学计划营建新图书馆，海外募捐乃解决资金不足的重要途径，同时，邀请知名学者来华讲学，聘请海外学子归国任教……上述种种，构成蔡欧美之行的既定任务。与他同行的，有罗文干、汤尔和、陈大齐、李闳初、张申府、刘清扬等。其中，罗文干是以修订法律馆总裁身份受命考察欧美司法情形。1920年12月27日，蔡元培一行抵达法国。

1921年1月，对于蔡元培个人来说是一个暗淡的月份。与他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黄夫人在新年元旦这天病逝，一个多月之后，蔡接到了噩耗。匆匆出国之前最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远在异国他乡，只能独自承受这人生的悲苦和打击。怀着沉重的内心隐痛，却必须责无旁贷地处理难度甚大的留法勤工俭学事务，在此问题上，他的举措招致了严重的非难——

早在1917年，李石曾等华法教育会成员陆续回国以后，便着手建立组织，开办学校，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这期间，蔡元培的活动重心虽在北京大学，但他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华法教育会“京兆分会”的工作，与彭志云等一起动员、联络和管理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湖南学生大批放洋赴欧之前，即首先与蔡等人联系，得其赞助。山西留法学生亦是通过蔡的帮助，得以顺利进入法语补习学校，之后前往法国。当然，在这一特殊的留学教育运动中，李石曾投入了主要精力，起着主导作用。至1919年和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全国各省的青年约二千人先后分作二十批奔赴法国。蔡、李等倡导者的初衷，是鉴于法国因欧战而劳动力缺乏，通过输送中国青年赴法，采用先前成功的经验，实行勤工俭学，使单纯的劳务输出成为变相的留学教

育，为国家培育人才。当留法运动进入高潮以后，他们甚至乐观地认为这一华法教育的盛况肯定有助于促使法国当局退还庚子赔款。然而，留法运动的管理工作十分薄弱，甚至呈现混乱和失控的态势。相当数量的赴法学生未经外语补习且携款甚少，致使华法教育会在法国的安置工作倍感艰难。1919年下半年，蔡元培曾致电在巴黎的李石曾，建议暂停派送学生，李于翌年初回国后，重申勤工俭学生必备的条件，甚至一度宣布停止派送。但留法势头的发展已非他们的意志所能改变。1920年6月以后，法国经济急剧恶化，工厂倒闭或开工不足，加之大批军人退役，勤工俭学生们觅工甚难，处境窘迫，只得依靠巴黎华法教育会救济。而教育会方面人力、财力均有限，已无力负荷如此沉重的负担，而一些工作人员又处事不当，使得学生与教育会的关系日益恶化。同年7月，蔡、李连发两电，嘱教育会挪用正在筹建的里昂中法大学的经费以维持学生；8月，又派高鲁赴法处理勤工俭学事务，高到法后即全面改组了教育会的办事机构——学生事务部。但此类措施治标不治本，危机仍在深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元培来到了法国。

蔡的到来，使留法学界“若大旱之望云霓，以为解决此困难问题惟有斯人”。然而，他只带来一笔须转交湖南学生的省捐助款，别无任何救济经费。而此时巴黎华法教育会的财政已濒临破产：从1920年11月到翌年1月的三个月期间，按月平均计算，经费开支增加四倍多，贷款增加三倍多，到1920年底，教育会负债高达六十余万法郎。面对如此情形，作为教育家，蔡亦无回天之术。1月间，他在巴黎听取各方面所反映的情况后，便于12日和16日以华法教育会长名义发布两个通告。第一个通告说：华法教育会、俭学会、勤工俭学会性质不明，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因此，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应由学生自行组织，与华法教育会分立，教育会只从旁襄助。至于经济方面，须以省为单位寻

求救助。第二个通告则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对于学生的经济维持到2月底截止。这两个通告发布之前，蔡在其日记中写到：“在巴黎参加学生善后事业委员会，因留法勤工俭学生未失业时有存款于华法教育会，及失业者多，皆向会求助，会中款绌，即暂挪学生存款作挹注。积久，不但求助者无可助，提存款者亦不能照付，遂滋纠纷。现委员会议决，速筹法币六十万法郎，还所挪存款及再发七十人维持费两个月，此后华法教育会不再问学生经费事。”^①这是他本人对此事的唯一记述，也是两个通告的最直接的注解。

不难想象，蔡氏两个通告发出之后，原本满怀希望的学生会有怎样激烈的反应。正如当年周恩来撰写的通讯所述：“自两次通告发出后，留法学生之大波澜起矣”。在蔡一生中，恐怕没有哪件事比在此问题上受到来自青年的非难更多、更严重的了。留法学界对于两个通告的态度和评论，大致可分如下几种：1、强烈责难。认为蔡对于“所有勤工俭学生一切困苦情形徒听教育会二三小人之言，专委罪于学生”，所发通告是“临险抽篙”，“陷青年于绝域”。持此观点的大多是集中在蒙塔尔纪等待领取维持费的勤工俭学生及其同情者。2、处置失当。周恩来认为，“提倡勤工俭学诸先生意虽尽善，法未尽美，致演成今日之现象”，他们的精神虽甚可嘉，但“所委托办事之人，所应付之方策，则又不能稍为之曲护，总谓之处置失当。”3、无所谓。这派意见认为，勤工俭学生理应摆脱对华法教育会的依赖，因此蔡的通告并不重要。赵世炎认为，“现在根本动摇，就是因为没有忠于勤工。”李立三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还须勤工俭学生自家猛省，共同补救。”这些人大都是在工厂勤工俭学校有成绩

^① 蔡元培《西游日记》1921年1月2日，见《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24页。

者。4、能够理解。认为蔡此举“纯系经济问题”，乃出于不得已。对此危局，“不能全责教育会，政府和国内父老，亦当分任其咎”。5、代人受过。张东荪认为，勤工俭学“一败至此，俗语所谓拆了这样的大烂污，则主其事者不能不负责任。……蔡先生不恤为人吐骂，而代人揩去烂污，……不过代人受过而已”。^①

客观地讲，蔡的两个通告是在华法教育会财政濒临破产的情况下，不得已发出的。在当时，采取这个非常办法，只是时间问题，迟早总要有人做此处置，舍此别无他法。问题是，蔡对于一些勤工俭学生评价不高，认为他们“既无勤工之能，又乏俭学之志”，而对其实际困难则了解不够，估量不足，更多是从教育会角度考虑问题，给人一种急于甩掉包袱的印象。通告的发出，虽然果决，但面对孤悬海外的勤工俭学生的生计问题，显然还欠细致和稳妥。不过，勤工俭学运动所积存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最后竟由蔡做终结性整顿而为人垢病，倒确乎有些代人受过的意味。需要指出的是，留法勤工俭学实质上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独特的平民子弟留学西方的教育试验，这一尝试虽然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效果（出现了一批共产主义者），但从留学教育角度看，它基本上没有成功。当时留法学界就对勤工俭学的能否问题有过激烈争论，其倡导者显然是以理想主义精神开展这一大规模活动的，因而从一开始便有某些脱离实际的先天不足。当时曾有人指出：“李石曾、蔡子民诸先生提倡的时候，急于要开风气，既没有有耕种这种主义，又没有仔细选择。”似乎是说，勤工俭学的思想既未普及，赴法人员的条件又过于宽泛。因而，一旦客观形势恶化，潜伏的问题和矛盾也就突发出来，导致悲剧性结局。

^① 可参见拙文《蔡元培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载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年。

蔡元培发布两个通告以后，曾应学生代表的邀请，于1月25日在巴黎共同商议善后办法。此后，他又与驻巴黎总领事廖世功、留欧学生监督高鲁联名致电北京政府教育部，报告留法学生现状，吁请各省“从速设法汇银接济。……并祈立即阻止各省遣送勤工俭学生，否则万无办法”。同时，他将湖南捐助款妥为转交给徐特立、汤松等代表，还出面与法国劳动部门接洽，尽力安排一些学生就业。然而这些已是他尽力于勤工俭学运动的尾声了。

在欧洲，蔡元培滞留了五个月，以在法国访问的时间为最长，此外，还先后游历了瑞士、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和英国。原拟顺访丹麦，因遇海员罢工，未能成行。这期间，他走访了包括巴黎、柏林、牛津、剑桥在内的几十所大学，详细考察其学校传统、办学特点、管理体制及专业分布，尤其对法国的大学区教育体制深感兴趣。在英国爱丁堡的一次演说中，他发表感想说：国内正在倡行地方自治，采用法式大学区制，可以解决各省地方教育的提高和管理问题；不过，法国大学区的权力过分集中于校长一人，似应略作变通，设立评议会统揽其权。这一认识，是其日后在中国从事大学区试验的思想基源。蔡元培还与西欧各国的知识精英和教育行政官员进行了广泛接触，旨在建立和加强相互间的学术交流与联系。3月8日，他偕李圣章访问座落在巴黎的镭铀研究所，会晤了居里夫人。这位发现镭元素的科学家向蔡表述了希望中国科学昌明的良好愿望，尤其强调中国不能没有镭铀的研究机构，并提议这个研究机构最好设在北京，因为那里的环境清静，不象巴黎嘈杂而又有污染。蔡深感其“质朴诚恳”，邀请她利用本年暑假访美之机，顺便到中国讲学。居里夫人因假期短暂，难以来华，乃答应以后争取访华。一个星期后，3月16日，蔡与夏元瑛、林宰平在柏林访问了爱因斯坦。蔡询以能否往中国讲学，爱因斯坦表示甚愿访华，

并问来华讲演应操何种语言，称自己的英语“甚劣”，蔡答可用德语，配备翻译。一年之后，爱因斯坦通过中国驻德公使与蔡商定，前往北京大学讲学，但由于书信误期等因，爱氏虽到上海，却未能实现讲学。此外，受梁启超的嘱托，蔡在德国还拜访了著名哲学家倭铿，并通过张君勱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联系，敦请这两位学者访华。其后，倭铿推荐的杜里舒应邀来华讲学。

此次欧洲之行，对于蔡元培来说，真可谓是对欧洲人文传统和近代文明的一次巡礼。他参观了数以百计的各类机关、设施、名胜、景观，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更加全面、具体。他瞻仰了卢梭、黑格尔的故居，观览了拿破仑一世的纪念馆，又一次重游莱比锡，光顾当年歌德写作《浮士德》的奥爱布赫小酒馆，也漫游了那古气森森的庞培城和古罗马时代遗留下的建筑群，更有幸饱览梵蒂冈教皇宫内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大师的艺术杰作。同时，他又广泛领略近代科技的繁盛成果，曾兴趣盎然地参观巴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的语音试验设备，走访六〇六发明人爱里希的研究所，还现场直观体现先进医疗技术的复杂手术。当然，他也切身感受到欧战给各国人民造成的心理创伤，尤其对一位德国大学教授所表现出的激切复仇情绪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异域他邦，蔡元培见到不少在此留学或旅居的学生和朋友，诸如傅斯年、刘半农、章行严、徐志摩、林语堂等，蔡的许多活动，便是由他们陪同进行。

6月1日，蔡元培从法国驶抵美国纽约，第一次踏上这块“新大陆”。他由东向西，遍访华盛顿、巴尔的摩、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等重要城市，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国会图书馆、卡耐基研究院等学校和机构，与孟禄、李佳白、芮恩施等知名人士晤谈。在这个新兴的国度，他充分体味到崇尚实用的学术风气，即使在“形而上”领域，亦呈现“实用哲学渐超过于康德黑格尔派之观念论”的趋

势。与在欧洲访问略为不同的是，他在美几乎每到一地，必作演说，总计接近三十次，演说内容大多涉及国内新文化运动的介绍和有关东西文化融合的观点。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一次演说中，他明确阐述道：东西文化交融的时代已经到来，现今学者应当“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做两种文化交流的媒介。在美期间，他还与罗家伦等北大留美学生座谈，出席国民党海外机关的会议，向各界爱国华侨讲述北大的现状及其与中国文艺中兴的关系，并募集捐款。8月中旬，蔡元培受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出席了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教育会议，韦悫、王天木等陪同其与会。蔡以中国代表身份向会议提交了《小学教育采用公共副语》和《举行太平洋各国联合运动会》两项提案，前者主张对十岁以上的小学生开设世界语课程，后者则建议每年举行一次太平洋地区运动会，由各国轮流承办。同月底，蔡离开夏威夷，乘船回国，经日本、横滨、神户，于9月14日返抵上海。

在近十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作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环球旅行。他以其在中国教育界的崇高声望和对新文化运动的突出建树，受到欧美知识界的广泛尊敬和热情礼遇，法国政府赠送他三等荣光宝星名誉徽章一枚，里昂大学和纽约大学则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值得注意的是，蔡的欧美之行，使中国教育界与各先进国家建立了高层次的广泛的联系，这对二、三十年代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

4.5 “不合作”！

1921年9月18日，蔡元培回到北京。远行归来，环顾海内，依旧是扰攘不已的武人政治和兵戎相见的战乱纷争。京师教育界经历了“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大风潮，刚刚恢复平静，他的许多同事和朋友通过罢课、请愿，甚至受伤流血，才促

使政府发放拖欠已久的教育经费。在军阀主政的年月里，蔡元培深知苦撑教育残局的艰辛，然而目睹欧美各国教育、科学、文化的先进程度，出自一个教育家的天职和良知，他只能振奋自己，劝慰和勉励他人，共图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在北大欢迎他归来的大会上，他劝勉师生们道：从事教育之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苦，也不可自行放弃天职。甚至认为，“罢课是一种极端非常的手段，其损失比‘以第三院作监狱’及‘新华门受伤’还要厉害得多”。^①显然，这位抱定教育救国信念的大学校长企望师生们不为任何现实障碍所阻，潜心于传播知识和建设文化的神圣目标。从这年10月始，蔡元培在北大开设《美学》课程，并着手编写《美学通论》一书。校长亲自授课，吸引了大批学生，据蒋复璁回忆：“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听的很有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挤的连台上也站满了人，于是没有法子，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②此种盛况，自然有益于浓厚校内教学空气，同时，也集中体现了蔡元培倡导美育的实际努力。

还在出任北大校长之初，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的一次演说中，将他自民国元年以来一直倡导的美育主张作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当时，一些人憾于我国无宗教，遂致道德沦丧、国势衰颓，急于要引入基督教；而另一些人则尊孔子为教主，倡立孔教，以维系所谓的“世道人心”。蔡元培认为，在科学发展的近代社会，宗教早已失却了其蒙昧时代曾经发挥的

① 所谓“以第三院作监狱”，是指1919年“五四”事件之后，军警大肆拘捕游行示威的学生，并将其拘禁于北京大学第三院内；“新华门受伤”，是指1921年6月3日，北京大学等校教职员为索薪而在新华门向政府请愿时，被军警殴伤的事件。

② 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86—87页。

作用，欲陶冶人类高尚美好的情操，莫如舍弃宗教而代之以纯粹之美育。因为宗教教义具有很大的排他性，往往强行令人遵从，而美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特点，可使人类心灵的寄托和纯洁情感的生成变为一个自然过程。他的这一演说词，于同年八、九月间先后刊载在《新青年》杂志和《学艺》杂志上，令知识界有耳目一新之感，但人们对于这一主张不甚了然，热心响应者为数寥寥。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处于高潮之际，蔡又在《晨报副刊》发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恳切提醒“致力于文化运动诸君”莫忘美育，他写到：“文化不是简单，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要透澈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不用美育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之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单单凭那个性的冲动、环境的刺激，投入文化运动的潮流，终不免产生种种流弊。在这篇文章中，蔡元培将美育与科学并提，视为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这时为止，至少在北大范围内，美育已在教学和课余生活中占居了一席之地。此后，蔡利用诸多场合，系统宣讲美育的有关理论，出国考察前在湖南所作的七次讲演，竟有四次属于这类内容。他在北大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亲自开设课程，更推动了西方美学理论的传播。这种种努力，引起教育界人士一定程度的关注和兴趣，主编《教育杂志》的李石岑请他撰文介绍实行美育的具体方法，蔡遂撰成《美育实施的方法》。

依照蔡元培的设想，实施美育须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协调一致，从一个人孕育母体中的胎教，到接受各级学校教育，乃至社会生活环境，均注入精妙的美感教育，这不仅要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具备自觉的“求美”意识，还需要科学文化相应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公益设施的充分完善。显然，他为人们勾画了一幅系统美育的理想图景，它绝非可以一蹴而就，却足以成为中国几代教

育家追求不舍的宏远目标。当然，这一炫丽的美育蓝图提出于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时期，与灰暗的历史背景不很谐调，其明显的超前性似乎注定了它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曲高和寡”的命运。惟其如此，痴迷于重造国民精神的蔡元培，才愈发执着地宣扬美育的价值和意义，并在可能的限度内大力扶植各类艺术教育，健全公共文化设施。客观地讲，蔡一生力倡美育，始终不懈，他基本做了两件事：一是全面介绍西方美学理论，使美育观念至少在知识界初步被接受；二是在中国奠立独立的艺术教育基础，培育了一批美术、音乐等方面的人才。不妨说，蔡的倡导美育，基本不是在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方面，而主要表现于具体的教育实践。他努力实施的美育，实质上是一种“心育”，是造就高尚情操和完美道德的一种外在途径，也可以说，是中国士人注重修身养性传统的近代表现形式。他所追求的是感乎于外、发乎于内的自觉地心理完善，而与一般社会倡立某种价值体系迫人就范的道德培养方法大异其趣，这正是其“以美育代宗教”主张的底蕴所在。

人们说，蔡元培奉行“兼容并包”宗旨无所不包。其实，也有例外，他对于宗教是并不包容的。1922年春天，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学校召开年会，引发了上海、北京等地激烈的“非宗教运动”。蔡以极鲜明的立场，参加了北京非宗教大同盟的活动，并发表演说，指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他尤其反对教会学校和青年会诱惑未成年的中国学生信仰基督教，主张“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北大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和马裕藻五人曾对非宗教运动表示异议，认为这有悖于“信仰自由”。蔡对他们的观点颇不以为然，强调信仰自由应包含信教与不信教的双重

自由，实际是为非宗教运动辩护。时隔数月之后，欧美派女学者陈衡哲致函予蔡，对他无条件地赞成非宗教运动表示困惑，函称：“观各处反对宗教之电文，几无一能持平心静气之态度者；而且所持之理由，又大率肤浅，不从历史上及学理上立论，但专事漫骂，此岂足以服敌方之心哉？”对于陈女士的抱怨，蔡复函答曰：“‘非宗教’，本为弟近年所提倡之一端，不过弟之本意，以自由选择的随时进步的哲学主义之信仰，代彼有仪式有作用而固然不变的宗教信仰耳。此次非宗教同盟发布各电，诚有不合论理之言。然矫枉终不免过正，我等不能不宽容之，不忍骤以折衷派挫其锐气”。^①由此可见，蔡元培拒斥宗教，一以贯之，其中既有维护民族自尊的现实情感，又有出自学识理念的思想根由，他摒除外来宗教，也反对国粹宗教化倾向，其主旨仍是秉持“思想自由”原则，保持一个超然的自我和从事一种“超然的”教育。

然而，时势是艰危的。尽管蔡元培怀抱发展教育的真切愿望，但教育经费短绌的阴影始终驱之不散。连年的穷兵黩武，耗占了国家的大部分收入，拨到教育项目上的经费仅为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一。即使这些，还被经常拖欠，大学教员往往只能领取半月工资。二十年代初，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比从前更形困迫，盼政府发款，像大旱的时候盼雨一样艰难。添聘教员没有钱，购买书籍没有钱，购买仪器没有钱，购买试验用的化学药品没有钱，乃至购买一切用品都没有钱。学生终日惶惶，觉得学校停闭就在旦夕，不能安心求学；教职员终日惶惶，迫于饥寒，没有法子维持生计，亦不能安心授课”。在如此窘迫的情状下，各校要求“教育经费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蔡元培曾经设想发放教育公债，使“教育经费从由政府间接取得变成直接向国民取得”。

^① 陈、蔡来往信函，见《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226—227页。

1922年3月，当“教育独立”运动步入高潮之际，他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因为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计，谋求远效，而政党的政策追求近功，变化不定，将教育委之于政党，必然更变频仍，难有成效；至于教会，则保守成性，拘泥信条，与教育发展的自由规律格格不入。因此，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和教会之外。那么，如何实行“超然的教育”呢？他的方案是：采用法国的教育体制，在全国划分若干大学区，每区建立一所大学，大学事务，由大学教授所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并推举校长；教育总长须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各区教育经费仿美国的做法，从本区中直接抽税，贫困之区则由中央政府拨付税款补助之。蔡元培的“教育独立”主张及其方案，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教育界力图摆脱恶浊政治的困扰，从根本体制上为发展教育寻求出路的强烈愿望。它固然是那个时代的特有产物，但也是蔡这一代人仿行西方教育制度所刻意追求的一个迷人的梦。

“教育独立”运动终于并无实质性成效，北大等几所国立高校依旧艰难度日。随着国内政局显现某种转机，蔡元培等学界中人开始企盼出现一个“好人政府”。

同年四、五月之间，第一次直奉战争在京、津附近爆发，双方的十余万兵力在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激烈厮杀。为了保障学校安全，蔡元培提议组建北大保卫团，由李四光、丁燮林、白雄远负责筹备，学生参加者达三百余人。此前，北大刚刚举办了中断六年之久的运动会，重视体育和“知识阶层武化”的现实需要，使这所最高学府出现了“学生军”。后来蔡还约请军事家蒋百里等来校讲演，对学生进行军事教育。这些做法，与民国元年蔡元培的军国民教育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两派军阀的激战，以直胜奉败而告收场。此后的两年，直系军阀单独控制了北京政权。这个

由英美等国支持的军阀集团，较之当时的皖、奉两系，似乎略具一点清名，特别是那位秀才出身的“常胜将军”吴佩孚颇得时人的好感。直系当权，使不少盼望政治清明的人一度想入非非。曾经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居然也“第一次作政论”，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当他觉得“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时，便约请北大的十余名同人及校外朋友在蔡元培寓所汇集，经众人讨论修订后，于5月14日联名发表。这篇“书生议政”的文字，主张好人应当站出来参与政治，组织一个为各方面均能接受的“好政府”，推行政治改革；首先实现南北议和，召集民国六年被解散的国会，制定宪法，进而裁兵、裁官，使国内政治渐次步入正轨。应当说，这一宣言反映了欧美派知识分子和平改良现实政治的善良愿望，在当时舆论界引起一定程度的共鸣。蔡元培肯于领衔发表此种宣言，除了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之外，还与他深悉一般社会的心理趋向有关。故此，当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完成了“法统重光”之后，他便电请孙中山终止北伐，结束护法。尽管此举招致一些南方国民党人的严厉指责，但他我行我素，自信其言动合乎民意。在北大任职的几年内，蔡基本是作为社会名流涉足国内政治，却较少顾及自己的党派身份，从而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相当大的自由度。他与梁启超等“研究系”要员时相过从，以至林长民提议另组新党，拥蔡、梁二人为魁首；他与吴佩孚系统的孙丹林等人亦曾多次聚首，畅论时局，在一段时间内，他象许多人一样对吴寄予期望^①；王宠惠、罗文天、汤尔和等好友入阁秉政之后，他与北大同人更几乎成为“院外集团”；而苏俄代表越飞抵京，他又隐然代表国民党与之晤谈。总之，蔡元培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虽非主要方面，却是颇为

^① 上述情况，可参见《胡适的日记》中的有关记述及《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的有关信函。

复杂的。

这一年的暑假，国内教育界人士齐集济南，举行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蔡元培作为该社董事向大会致开幕词，会议重点是讨论修改学制问题。9月下旬，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审议和通过学校系统改革草案等议案，蔡以会议主席身份主持其事。随后公布的新学制（壬戌学制），较之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有了很大的改进：小学由七年缩短为六年，义务教育暂以四年为准；注意地方实际需要，不做硬性规定；重视学生的职业训练和补习教育；课程设置和使用教材侧重实用；实行选科制和分科教育，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需要。同时，新学制还确定了普通教育的“六三三”制。此次教育改革所确立的改革标准中有“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等项，这与蔡元培平素的主张十分吻合，显然他为新学制的制定和实施做出了很大努力。

蔡元培任职北大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度过的。整个8月，他与北京其他七所国立高校的校长一起同政府进行了顽强地交涉，以求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他真切感到，“解决经费困难，实一最大而最重要之事”。因为，“开学在即，不名一钱，积欠在五月以上”。向政府索要欠款的同时，北大在经费开支方面也采取了措施，其中规定向学生征收讲义费。此举导致一场学生直接抵制学校当局的风波。10月17、18两日学生代表数十人先后到会计课和校长室请愿，要求校方撤销征收讲义费的校令，蔡元培向学生解释无效，双方形成僵局，学生意欲罢课，蔡则断然辞职，随后，北大其他行政人员亦连带辞职，校务陷于停顿。后经多方调解，蔡收回辞意，仍返校主政，历时一周的“北大讲义费风潮”始告平息。收费暂缓实行，学生冯省三却被开除。社会上对此次风潮议论纷纷，而个中情由及其苦楚，只有蔡等主要当事人体味最为深切。在政治、经济状况不足以维持

公益事业的社会里，求学难，办学尤难，人们大可不必苛求某一方面而任施褒贬。

1922年12月，北京大学创建二十四周年，17日，校内举行纪念会，蔡元培发表讲话，回顾和总结了这所最高学府的发展历程。他说：北大的二十四年可分三个时期。自开办至民元，为第一时期，在这十余年间，学校历经波折，其体制主要是模仿日本。开办之初，北京环境多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倾向，学校方针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故教者、学者大都偏重旧学，西学方面不易请到好的教习，学的人也不很热心，很有点看作装饰品的样子。但是，中学方面参用书院旧法，考取有根底的学生，在教习指导之下，专研一门，这倒是有点研究院性质。自民元至民六，为第二时期，校长和学长率多为西洋留学生，加之国体初更，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概。教员、学生在自修室、休息室等地方，私人谈话也以口说西话为漂亮。那时，中学退在装饰品的地位了。但当时的提倡西学，也还是贩卖的状况，没有注意到研究。自民六至今，是第三时期，校内提倡研究学理的风气，力求以专门学者为学校的主体，在课程方面也是谋求贯通中西，即如西洋发明的科学，固然用西洋方法来试验，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也要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①这番讲话，以中、西文化在大学的消长和融合为主线，概括地论述了北大的发展历史和各时期的特点，其中对他主持校政六年来学校所发生的变化也作了客观陈述。是否可以这样说，蔡元培对自己在北大的作为还是充满了自信的，他的总结和估价，经过后人的审视，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

在蔡元培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个月，北京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罗文干案”。罗文干是北大的兼职教员，曾在《我们的政治主

^① 见《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295—296页。

张》上签名，时为所谓“好人政府”王宠惠内阁的财政总长。王内阁在政治上倾向于吴佩孚，招致直系军阀内部曹锟一派的不满，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迎合此意，诬指罗文干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受贿行为，致使总统黎元洪下令将罗逮捕，造成内阁危机。经过近两个月的司法审理，1923年1月11日，罗被无罪释放。但军阀政客集团不肯罢休，教育总长彭允彝竟献计提出复议，使罗再次蒙冤入狱。目睹这种种政治阴谋和卑劣行径，蔡元培已无法忍受，他认为彭氏此举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而在情谊上又深信罗的为人和操守，为其大抱不平。乃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等人商议此事，均认为有表示的必要，蔡遂于17日愤然提出辞职。其辞呈谓：“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这可能是近代中国最直率、最能体现知识分子气节的一份辞职书。两天之后，他在各报刊出不再到校视事的启事，当即离开北京。随后，便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不合作宣言》，向世人剖白心迹：

“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

一天地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①

在蔡元培看来，一个政府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有德能的人便应离它而去，这即是不合作，持不合作立场的人多了，政府自然也就消亡了。他曾在不少场合宣扬这些高妙的道理，此刻则躬身实践其“不合作主义”了。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在愤世嫉俗时所做的“自由主义”选择。不论外界舆论如何品评此举，北方的胡适撰文称许也罢，南方的陈独秀指责其消极也罢，这一次，蔡元培是决心高蹈远引了。北大师生的“驱彭（允彝）挽蔡”、北京政府的被迫“慰留”，只不过使他又保留了几校长名义，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至此则是无可挽回地结束了。

^① 《申报》1923年1月25日。

第5章 “党国元老”和学界泰斗

5.1 元老参政

辞职离京后，蔡元培在天津暂住了两个多月，才南返上海，后回绍兴。其间，曾到上虞白马湖，参观春晖中学。1923年7月20日，他与爱国女校初期的学生周养浩女士在苏州留园喜结良缘，这是蔡的第三次婚姻。十天后，蔡元培携带妻儿，搭乘“波楚斯”号客轮离沪赴欧，又一次旅居海外。

这一年的秋天和冬天的大部分时间，他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渡过的。抵欧伊始，他便重操旧业，着手编译《简明哲学纲要》一书，同先前一样，这是与商务印书馆约定的惯例，其预领稿酬用以维持举家旅欧的费用。此书于翌年8月在上海出版。在比期间，他应邀前往沙洛王劳工大学作《中国之文艺中兴》的演说，纵论中国和欧洲文明的发展程序，主旨仍是东西文化融合，该演说词后在《东方杂志》刊载。1924年初，为了便于妻女学

习美术，蔡移居法国。3月底，他应留英学人之约，赶赴伦敦游说英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力促将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文教事业，并向当地散发《处理退还庚款的备忘录》。随后，他前往哥尼斯堡，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德国学术界为康德诞生二百周年举行的纪念大会，表达中国学界对这位哲学大师的“重视和尊敬”。返回法国后，又协助留法学生举办旅法中国美术展览，并为展品目录撰写序文，向欧洲公众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他还参与了里昂中法大学的部分事务。8月间，蔡到维也纳出席第六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其后，又在荷兰海牙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民族学会召开的学术会议，其中心议题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美洲的民族问题。此时，蔡对民族学产生浓厚兴趣，与会期间，适遇莱比锡大学的同学但采尔，这位德国民族学专家劝他不妨到汉堡去，因为那里的博物馆收藏资料甚丰。11月底，蔡元培即到汉堡大学报名入学，进行有关民族学的学习和研究，时年已五十八岁。从他初到德国留学迄今，已经流逝了近二十个春秋，其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却未曾改变他那童心般的求知欲。这除了秉性如此之外，似乎还找不到其他的解释。蔡一生不乏高官显位，但始终不失书生本色，世人服膺其人格，未尝不出于此。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传到欧洲，蔡元培立即撰写挽联和祭文，深切悼念这位“中国自由神”。4月间，他前往伦敦，参加中、英人士举行的追悼会，并致悼词。孙、蔡二人均为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在民国创立前后他们合作共事，交谊挚诚。孙作为革命领袖，倾力于社会政治的变革；蔡作为教育家，则主要侧重文化学术的建设。二人追求的总体价值目标完全相同，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主张又不尽一致。孙充分理解蔡在北方推动新文化的积极意义，因而在一年前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坚持将蔡选入领导机构。蔡高度崇信孙的三民主

义和五权分立的构想，将此奉为晚年参政的政治基准，但对其思想体系的解释有时也不免见仁见智的成份。其所撰祭文称：“凡先生之所昭示，至大如《建国方略》，至高如《三民主义》，无不以学术为基础，而予吾人以应出之途程。尤扼要者，谓革命之根本，在求学问之深且闳。”于此可见一斑。

同年“五卅运动”发生后，不少外国报刊大肆渲染中国的“排外倾向”，以当年的义和团比附之，甚至散布中国有“赤化危险”，鼓噪由日本和英国动用武力了结争端。为此，蔡元培撰写《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各列强》一文，澄清事件真相，驳斥无稽之谈。此文被译为英、法、德等文字，在欧洲各报发表。这篇文章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提出各国对华不平等条约乃酿成事端之主因，急应无条件废除，从而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二是反驳所谓“赤化”时，蔡氏对于国内的反共团体及其活动颇为了然，几乎能够信手拈来用作驳论的证据，可知他虽远在欧洲，而对国内的时局演变还是比较关心和了解的。此次旅欧，蔡元培始终无法解脱来自北京大学的缠绕，代理校长蒋梦麟和北大评议会不时来电，催促他返校主政。就蔡而言，一方面为实际上卸下了校长重任和摆脱开北京官场环境而庆幸，另一方面在感情上又仍旧眷恋这所由他一手整顿而焕发生机的学府，在很大程度上与之藕断丝连。这样的矛盾心态，使得他数次婉拒和延宕请其回校的要求，同时，也不得不认真考虑重主校政的可能性。因此，当北京政府教育部电促其回国时，蔡元培终于踏上归程，于1926年初春返抵上海。

初入国门，他便在沪上的沧州饭店接受《国闻周报》记者的采访，就政治、教育、共产主义诸项问题发表意见。关于国内政治，他只作泛泛而谈，无多新意。论及教育，他则明确表示：“今日学生界之浮嚣现象，余至不赞成”，并且认为，一些学生的活动，是“由少数操纵其间”，那种“强人以同，不惜出于恫

吓无理之手段”，完全悖离思想言论自由之原则。至于共产主义，他说：“共产主义，为余素所服膺者。盖生活平等、教育平等，实为最愉快、最太平之世界。然于如何达到此目的之手段，殊有研究、讨论之余地。以愚观之，克鲁泡特金所持之互助论，一方增进劳工之智识与地位；一方促进资本家之反省，双方互助，逐渐疏濬，以使资本家渐有觉悟，以人作工之途，则社会不致发生急剧之变化，受暴烈之损失，实为最好之方法。若夫马克思所持之阶级斗争论，求效过速，为害无穷。”他甚至认为，俄国的共产主义试验，徒凭理想，已“遭遇失败”，中国“既有前车之失，又何必重蹈覆辙”^①。这番谈话，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蔡元培对于现实“热点”问题所持的态度，须知，这是他回国之后第二天所表明思想见解，足以说明他这一时期对国内问题的独立观察和认识。

回国之后，蔡元培显然面临着重要的政治抉择。是如约北上，仍旧充任北京政府的简任大学校长？还是“不合作”到底，为南方政府即将开始的北伐做政治上的策应？他选择了后者。这其中，既有他个人做出的决断，也有明察时局的朋友们进行劝导的因素。在此后的一年间，他参与了苏皖浙三省联合会的工作，以“联省自治”反对占据东南的军阀“联帅”孙传芳，配合北伐军的军事行动。并且，与褚辅成、陈仪等在杭州宣布浙江自治，进而筹组浙江省政府。此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函请蔡为浙江政治会议委员及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并请其在张静江返浙之前，代理政治会议主席职务。可以说，这是蔡元培以元老身份涉足国民党政权的开始，也是他与蒋介石建立直接政治联系的最初阶段。由于东南局势的反复，蔡与马叙伦等人为躲避孙传芳的通缉，曾于1927年初避走福州、厦门等地。随着2月中旬北伐军

^① 见《蔡元培政治论著》第25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进占杭州，他便开始正式代行浙省政务。至于北京大学方面，尽管教职员一再促其返校重理校务，甚至连十年来“除教课外，于教务素不过问”的周作人也致长信促驾，而胡适更以不北来则“资格丧失”相警告，可是，在国内政局剧变前夕，蔡元培的选择颇为坚定，几十年的政治阅历和党派归属毕竟有其作用，这是他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有所区别的一个方面。他曾正式提出辞去北大校长名义，只是由于师生们的坚持，北京政府才未予允准。到奉系军阀入主北京，将北大等数所国立高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后，蔡的校长名义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以后，国民党内对待共产党及其工农运动等问题上的分歧趋于表面化。蒋介石在南昌自成中心，抗命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他在政治上的迅速“右转”，得到相当一些社会势力的支持。素称国民党四元老的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采取了一致的拥蒋立场。蔡没有张、吴等人与蒋的那种渊源关系，此前他与党内这位“后起之秀”的接触似乎也甚为一般。蔡之倾向于蒋，除了江浙势力的连带影响之外，恐怕与对时局的共同认识不无关系。1927年4月间，蔡在上海与蒋频繁往来，成为这一时期该政治圈内的一个重要人物。蒋与“四老”及其他军政要员就“清党”和在南京建立政府的连日密商，蔡与闻其间；国民党监察委员会的部分委员数次开会，以监委会名义讨论和通过由吴稚晖提出和拟就的弹劾共产党的文告，蔡则主持会议并提出“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蒋氏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蔡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同时发表演说，痛诋武汉政府为俄国人操纵之“破坏政府”。此后，蔡元培在南京政府中一度出任要职，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成为他从政生涯的高峰。

国民党的“清党”，导致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惨遭屠戮，血雨腥风使知识界为之震惊。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青年编辑胡愈之目睹发生在宝山路的惨状，遂起草一份抗议书，经郑振铎、

章钫琛、周予同、李石岑等同人签名，“交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文化界著名人士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远在北方的周作人也在他主编的《语丝》上先后发表《怎么说才好》、《功臣》等文，抨击“清党”中的残虐径为，并不无愤慨地指出：“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他认为，“南方之事全败于清党”，而“吴、蔡诸元老”难卸其责。当年曾是国民党左派的柳亚子在后来忆及其老师这段经历时写道：“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一纸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布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受影响”^①。显然，蔡元培的参与“清党”，使得“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中曾对之产生某种失望情绪，一些当事人更是印象深刻，以至耿耿于胸。应当说，蔡之介入“清党”，自有其思想意识上的根由，前述其自欧归国的言论，颇可窥知他反对俄国式阶级斗争的基本政治倾向；同时，他站在维护国民党的立场上，对吴稚晖所提“共党谋叛情形”抱有同感，因而很自然地投入到这场所谓“护党救国”的运动之中。当然，他毕竟仍是“书生从政”。在“清党”实施过程中，不赞成乱捕滥杀，而希望将这种政治上的弹压行动纳入较为规范的“法治”程序。如此斯文的主张与残酷的现实极不谐调，但它所透露出的某种价值取向，却埋下了他与国民党最高当权者之间产生一定程度心理裂痕的思想种源。

从1927年“宁汉合流”，到三十年代中期，蔡元培在南京政府中的处境颇为微妙。他的活动重心仍在教育、科学和文化的行政管理方面，先是出任大学院院长，后又主持中央研究院，但

^① 柳亚子：《纪念蔡元培先生》，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125页，中华书局1984年。

也时常以元老身份调停各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尽力维护统一的政治格局。同时，随着他对蒋氏集团认识的变化，开始与国民党内的左翼派别建立联系，合作共事，在保障人权和推动抗日方面用力尤著。

1928年8月，由于试行大学区制受挫，加之国民党内的派系倾轧，蔡元培提出辞去大学院长和代理司法部长等本兼各职。10月，他致函蒋介石、胡汉民和谭延闿，表示：“此后，愿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资格，尽力于党务；以政治会议委员之资格，尽力于政务；以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资格，尽力于教育、学术。”^①不妨说，这是蔡遭遇事业上的重大挫折之后，为自己在南京政府中所选择和确定的基本位置，从后来的活动看，他大抵是依此行事的。1929年3月，蒋介石与桂系矛盾加剧，桂系主持的武汉政治分会擅自罢免唯蒋命是从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酿成“湘案”。蒋请蔡等人“查办”此事。为了缓解宁汉冲突，蔡苦心孤诣，奔走调停，力避武力解决。然而这种种努力终归无效，蒋桂战事随即发生。两个月后，作为蒋桂战事的延长，粤桂战争又爆发在即，蔡急电李宗仁，劝其“即释兵柄，暂避海外”，以求“两粤得以息争”。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胡汉民，致使宁粤分裂。“九·一八”事变后，蔡出任艰巨，与张继、陈铭枢南下广东，谈判议和，促成“和平统一会议”在沪举行，实现了国难之际的“举党一致”。蔡元培的上述政治活动，尽管是代表南京方面进行的，但他的行动主旨是免除分裂、消弭内战，谋求一个和平、建设的局面。实际上，这个时期，蔡与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发生着变化。蒋的刚愎自用、专断独裁，与蔡格格不入；其滥杀青年，诛锄异己，尤为蔡所反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内争频仍，战事连年，建设乏力，“宪政”缓慢，蔡的内心失望亦

^① 《蔡元培政治论著》第33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不难想见。因此，当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谋求复职时，蔡并不积极助力；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之际，蔡致力于和平息争，曾有意促蒋去职。这些，无疑招致了蒋的不满乃至忌恨。从1930年开始，邓演达、宋庆龄等左派人士逐渐与蔡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至少在争取民主、捍卫人权方面有着高度一致，其活动显然具有反蒋的性质。

随着“九·一八”和“一·二八”两大事变相继发生，民族危机的阴影再次笼罩国人心头，蔡元培的政治活动也明显地超出党派的框限，主要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1932年12月，他与宋庆龄、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即是由社会、文化等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一个民间性组织。该同盟宣言称：“各先进国家皆有保障民权之世界组织，由爱因斯坦、觉雷塞、杜威、罗素及罗兰之流为之领导，此种组织之主要宗旨，在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所必需之思想自由与社会自由。”^①可知，他们组建民权同盟是援此而行，而所针对的却是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蹂躏人权的黑暗现实。同盟正式成立前夕，蔡、宋等人为北平警方非法拘捕许德衍等人一事，致函蒋介石，指出：“年来国事凌夷，民气消沉，皆因民权不立，人民在家时怀朝不保暮之恐惧，对外何能鼓同仇敌忾之精神？欲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惟有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②这是同盟发起人向主政当轴发出的正当吁请，同时也申诉了保障民权的现实重要性。12月30日，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同日，蔡向中外记者发表“个人感想”说：“我等所愿意保障的

① 《申报》1932年12月18日。

② 《蔡元培政治论著》第400页。

是人权。我等的对象就是人。即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受保障的普遍人权。”他提出，保障民权，第一，无党派的成见“决无专为一党一派的人效力，而不顾其他的；”第二，无国家的界限；第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甚区别。他特别强调，“希望诸君，对于普遍人权的保障，能超越国家党派的关系，以下判断。这是鄙人所盼望的。”^①在“天赋人权”的价值观念支配下，蔡的党派意识大大淡漠了。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实质性工作是营救被国民党当局拘捕的政治犯，在其存在的半年时间里，先后营救了许德衍、侯外庐、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丁玲、潘梓年等各方面人士。并且，调查监狱情形，要求改善狱中待遇；抗议军政当局杀害作家应修人和记者刘煜生的暴行，等等。蔡元培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客观地分析，他与宋庆龄等左派人士在从事民权保障的内在动机上还是存在某种差别。1933年2月，蔡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发表题为《保障民权》的演讲，提出，保障民权是“国民党训政时期的需要”，也是“国难时期的需要”，况且，“各种事业，均感人才缺乏；若有为之才，偶因言论稍涉偏激，或辗转联带的嫌疑，而辄加逮捕，甚至处死，则益将感为事择人之困难，而无术以救国。”^②珍惜人才，为国家和民族保留元气，是他作为爱国教育家所秉持的崇高主旨，也是他参加民权保障同盟的基本动因，诚如鲁迅所说：“他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③6月18日，杨杏佛被刺身亡。这是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致命打击，它在蔡元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杨杏佛是蔡晚年事业上的主要助手，也是他从事政治活动所

^① 《蔡元培政治论著》第403—404页。

^② 《蔡元培政治论著》第414—415页。

^③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

倚重的谋士和联络人，杨的遇难，表明国民党当权者在向蔡等人示警。此后，民权保障同盟终止了活动，蔡元培则仍以个人身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保障民权的工作。

作为“党国元老”，蔡元培晚年的心境似乎有些悲戚，他平生追求的许多理想非但没有变为现实，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却日非一日。1934年，辛亥革命二十三周年纪念日，他在青岛发表演说流露了这种心绪。他说：“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本图实行三民主义，以造福于人民。乃二十三年来，人民生计，未能多大改良，不特水旱偏灾，频年不免；而工业不兴，外货倾销，农村有破产之虑，都市多失业之辈，是民生主义尚未能实现也。民权实行，以一省中各县能自治、一国中各省大多数能自治为条件；而今日，不特各省，即各县中能达到孙先生所举自治标准者，殆尚无一也。是民权主义亦未能实现也。至于民族主义，则不但次殖民地之资格未能提高，而“九·一八”以来，连失东北四省，至今不敢言恢复。”^①忧愤之中，隐含着对于当权者的失望和不满。在南京政府中与蒋介石地位相当的另一实力人物汪精卫，早年与蔡颇有交往；还在1932年初，汪、蒋合作后汪出任行政院长，即曾劝蔡常驻南京，“对于行政，时加指导”，却为蔡所婉拒。1937年初，汪从海外归国不久，又致函予蔡，试探请其相助的可能性。蔡复函称：“弟生性迂愚，对于政治问题，毫无兴会；即不得已而参加，亦常持急流勇退之态度；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对于文化事业，虽无专长，要为性之所近，不贤识小，聊尽撮壤涓流之义务而已。”^②相对说来，蔡对于汪，尚能倾诉衷肠，但在涉足政事问题上依旧敬谢不敏，可以看出，他对南京政府能否真正有所作为存在疑虑。

① 《蔡元培政治论著》第458页。

② 《蔡元培政治论著》第481页。

不过，蔡元培回复汪精卫信函中的那段话，也确实道出了他在政治和文化事业两者间的真正兴趣所在，即其自谓的“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大体说来，蔡乃学界中人，而非政治中人，虽然以元老身份参政，然其主要精力还是投入在教育、科学、文化方面，而成为世人公认的学界泰斗。

5.2 学界泰斗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全国形式上的政治统一，为国民党内热心教育改革和文化建设的有志之士提供了施展其抱负的现实可能。蔡元培即是这部分人的突出代表。多年来，魂牵梦绕的“教育独立”构想终于获得了一次全面试行的机会，而系统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宿愿，显然也到了付诸实行的阶段。他的这种主观判断，颇为兴奋地促使他投身南京政府初期的一系列重要活动。很明显，蔡元培指望政治上的变动会有助于教育文化上的更新。正如人们所评论的那样：“蔡先生之进于庙堂，是为了实行他的主张。”^①

在南京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以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先后领衔提出设立大学院和推行大学区的改革措施。早先成立于广东南方政府时期的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在全国性政权创建之后，只能作为一个临时性过渡机构，按照政府体制，应当设立教育部。但是，蔡元培等人“筹议再三，以为近来官僚化之教育部，实有改革之必要。”于是，他们创设了大学院，作为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的最高机关。何以要舍弃人们熟知的教育部之名而代之以国人生疏的大学院呢？蔡等人的考虑是：民国建立后的“十余年来，教育部处于北京腐败空气

^① 胡绳：《争民主的战士永生——纪念蔡元培先生》，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月11日。

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遂使教育部名词与腐化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欲改官僚化为学术，莫若改教育部为大学院。^①从表面上看，此举只不过做了名称上的变动而已，然而，其内中所蕴含的深义却颇堪玩味。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全国学界留下的腐败形象确实应予清除，一个新兴的全国性政权在某一领域推出革故鼎新举措亦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大学院标榜学术化，而反对官僚化，其内部建制中的大学委员会，纯然由学术权威组成，负责“议决全国学术教育上一切重要问题”，这便使大学院从一般政府职能部门中游离出来，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而强烈地表现出教育独立的倾向。大学院全称“中华民国大学院”，而不称国民政府大学院，这在当时就产生诸多议论，甚至被指为欲独立于政府之外。蔡元培的本意，是希望从体制上将教育完全交予教育家管理，减少非学术性因素的支配作用。

与创设大学院相并行的是试行大学区制。这一取自法国的教育行政制度，是将全国划分若干大学区，通常以省为单位，区内各级教育全部委诸作为教育学术中心的大学校负责，其校长综理大学区内全部教育行政。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单元，这便取代了各省、区的教育厅、局，使从事教育的学者直接管理地方教育，排除了政治官员涉足学界的弊端。蔡元培等人认为，先前“一般教育之行政机关，簿书而外，几无他事。其所恃以为判断之标准者，法令成例而已，不问学术根据为如何。于是而与学术最相关之教育事业，亦且与学术相分离，岂不可惜！”^②因此，他们设想通过大学区内组建的评议会和研究院，突出体现“以学术化代替官僚化”的宗旨，从教育体制上改变“吾国年来大学教育之

① 蔡元培：《大学院公报发刊词》，见《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194页。

② 《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呈》，见《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134—135页。

纷乱与一般教育之不振”的状况。仿行法国的大学区制，是蔡元培多年来执着追寻的一个梦想，在他看来，这样做不仅使教育独立能够成为现实，而且会大大促进各省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学术和教育的振兴注入活力。

在触及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改革问题上，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稚晖，甚至张静江，均采取了一致的积极主动立场，从而使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于1927年6月先后通过了他们提出的呈文和议案，同时，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并且决定首先在江苏、浙江两省试办大学区。时隔十五年，蔡元培再次出长全国学政，并且肩负着较之民国元年的改革似乎更为艰巨的重任，因为那次改革主要是适应政治上的更新，而此次变更教育行政制度，则是谋求从根本上解决多年来困扰中国教育的机制性问题，这不仅要涉及人们的观念和习惯，还将冲击乃至打乱社会政治肌体的平衡。对于年逾花甲的老教育家来说，此番“出山”，是实现其生平理想的最后一次尝试。

同年10月，蔡元培在南京正式就任大学院院长。他随即提出“使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的主张，以作为制定教育方针的基本内容。他具体阐释道：“一，提倡科学教育，一方面从事科学上高深之研究，一方面推广民众的科学训练，俾科学方法得为国内一般社会所运用；二，养成全国人民劳动的习惯，使劳心者亦出其力以分工农之劳，而劳力者亦可减少工作时间，而得研求学识机会，人人皆须致力于生产事业，人人皆得领略优美的文化；三，提起全国人民对于艺术的兴趣，以养成高尚、纯洁、舍己为群之思想。”^①应当说，这是一个颇为全面而又理想化的教育方针，其中既强调了科学的提高，也十分明确地提出要使科学方法普及于国人；而关于劳动化的解释，则再一次反映出蔡

^① 《全国教育会议开会词》，见《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228页。

的教育平等思想和“泛劳动”的观念，这是他所企望的理想社会；至于艺术化，则是其美育主张的扩展和继续。这个教育方针的框架，基本上是属于“纯教育型”的，尚未参杂当时的“党化”色彩。在大学院，蔡元培力谋教育经费得到充分保障，他深知，经费支绌，再好的教育计划亦无从落实。为此，曾筹备教育银行，指拨各项附税，充作基金，预为教育事业之用。12月，他与孙科联名向国民政府提出《教育经费独立案》，拟请“通令全国财政机关，嗣后所有各省学校专款，及各种教育附税，暨一切教育收入，永远悉数拨归教育机关保管，实行教育会计独立制度，不准丝毫拖欠，亦不准擅自截留挪用，……如此，则教育经费与军政经费完全划分，经济公开，金融巩固，全国教育永无废弛停顿之虞。”这项议案，虽然在国民政府第十六次会议上获得通过，但几个月后，随着“财政统一”措施的推行，教育经费问题又陷入“有待讨论”的境地。

蔡元培主持大学院，为时仅仅十个月。这期间，大学院在南京举行了全国教育会议，与会的各方代表和专家八十余人，审议议案近四百件，内容广泛涉及各级各类教育的重要问题，这对于国民政府时期各项教育法规和条例的制定具有直接影响。在会上，蔡元培重申了“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的主张，强调此三项乃“今后亟须努力进行者”。大学院先后在上海和杭州创办了劳动大学、音乐院和西湖艺术院，这三所国立高等院校的建立，具体体现了蔡的教育主张。同时，大学院还分别通令全国：废止春秋祀孔的旧典；并在中小学校倡行语体文。废止祀孔之举，曾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一些保守人士痛诋这项决定，尽管如此，座落于广大城乡的孔庙还是终于丧失了其本来的功用，孔夫子的威灵在经历了“五四”冲击波之后，看来确实是气数已尽。在破除独尊孔子的问题上，蔡元培的确做到了前后一贯，义无反顾。此外，大学院还设置了特约著作员，聘请国内在

学术上贡献突出而无职务收入者担任，听其自由著作，每月致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鲁迅、刘海粟等均曾受聘。实质上，这是蔡元培对知名学人给予特别资助的一种独有方式。

作为新式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大学院在创设之初，仅下设秘书处和教育行政处。蔡元培力主简化内部组织，提高办事效能。然而，随着实际工作的展开，这种状况反而有碍于高效率的管理，遂先后两次修改大学院组织法。一方面扩充职能机构，实行对口管理，另一方面增设一名副院长，主持日常事务。这样一来，大学院的内部机构设置便颇近似于以往的教育部。原先，对大学院持怀疑态度的人，即以大学院不伦不类为口实，提出恢复教育部，以求与国民政府其他各部相一致。教育界的一些人士亦对大学区制易于忽略普通教育提出反对意见，而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混乱更增加了反对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声浪。尤其是在试行大学区制的中央大学区（江苏）内，问题和矛盾十分突出，在很大程度上非但未能实现教育行政的学术化，反而助长了官僚化的恶性蔓延，因而招致教育界的极大不满。蔡元培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曾利用不同场合，说明“大学院本为一草创之新组织，无日不在试验之中”，而大学区制的试行更须逐步见效。但是，来自国民党内和教育界的反对意见颇为尖锐，蔡作为始作俑者处于被动境地。1928年8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依据孙中山《建国大纲》确立了政治体制，其中包括在行政院设立教育部。这样，大学院的取消便只是个时间问题。就在此时，蔡元培和李石曾这两位积极倡行大学区制的教育界耆宿，在北平大学区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蔡的主张未被多数人采纳。在此情况下，蔡于8月17日提出辞去大学院长等本兼各职。10月，大学院被恢复为教育部，一年之后，大学区制的试验亦以失败而告终。

蔡元培鉴于北洋政府时期官僚化的教育部扰乱学界事务、阻碍学术发展的种种弊端，认为，只有使教育从政治中分离出来，

获得独立地位，才能顺利发展。他确信，法国的大学区制是实现教育独立的最佳方案，故而，以国民政府的建立为契机，急切地实施了这项改革。这一举措，实质上是对中国集权政治的某种挑战。可是，在法国行之有效的良好制度移植华夏之后，竟弊窦百出，顿成众矢之的，确乎使蔡元培大为意外。问题出在他以理想色彩浓重的良好愿望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嫁接法国大革命之后结出累累果实的根苗，不同的社会物候必然产生大相径庭的结果。蔡氏一生，为理想所驱动，其成功在此，其失败亦在此。令人感兴趣的是，蔡元培等人的大胆改革之举，何以顺利地为国民党核心集团所允准？看看这一改革试验施行的时间，便不难找到答案。蔡于1928年4月发表关于大学院组织问题的谈话时提到：“当时国民政府方以全力应付军事，于对教育事业，尚无具体计划。”因此，当蔡与李石曾、吴稚晖等元老提议试行大学区制时，未遇任何阻力。一年之后，军事行动大体结束，而改革试验则步履维艰，国民政府进入正轨运转，教育界的“独往独来”局面随即终止。可见，蔡元培等人推行的大学区制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次有限的局部试验。教育和学术自有其发展的客观法则，但毕竟仍属社会的有机部分，很难设想它能够真正摆脱政治而独立。不过，减少不合理的行政干预，使教育和学术在宽松的氛围中健康发展，是“五四”以来觉悟了的中国知识界的共同追求。正是在这一点上，蔡元培的努力深刻反映了一种正当的社会心理，尽管他所选取的欧洲方案未必行得通，但人们理解这一尝试背后的拳拳之心。

离开大学院之后，蔡元培没有再直接参与教育行政，他表示，“愿以余生，专研学术”，从此，中央研究院成为这位老人唯一的事业寄托。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是遵照孙中山的遗愿于1928年创办的，蔡元培负责筹备建院，并出任院长。该院最初归属大学院，后直接隶属国民政

府。蔡元培一生中大部分经历是从事教育，而晚年转而倾注全部精力培育和扩展科学研究事业，这一选择，并非偶然。

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蔡元培深深服膺欧洲文化中的科学精神，他认定，“现代文化，基于科学”。正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前提下，近代文明才得以产生。反观中国，令他痛心疾首的是：“我们的教育至少两千年来没有面向更高的科学教育，而却是用完美的品质去塑造人，赋予他一种文学素养而已。”^①尽管中国古代也曾出现一些伟大的科技发明，但在强大的儒家正统文化居于至尊地位的情况下，只能听任其自生自灭，由墨子而萌发的科学精神始终难以形成强劲的文化传统。虽然，在清代中期，朴学大师们颇为表现出严谨的科学态度，但这少的可怜的科学成份与国计民生相去甚远，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难成风气。回首中国的近代化历程，蔡元培指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他反复强调，“欲救我国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欲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中，惟有力倡科学化。”他确信，“我国科学智识之落后，绝非国人智慧之后人，”只要我们“一改空谈之旧习，致力于实际探讨，”国家前途就有希望。^②具有蔡元培这种认识和信念的人，在那个时代决非少数。然而，象蔡那样如此虔诚地尊崇科学的价值，为提高国人的科学素养而数十年不懈地进行韧性的努力，则至少在他那一辈人中间显得十分难得。不论是在民元教育部，还是主持北京大学，他都高度重视科学教育，对诸如科学社、中华学艺社等科学团体也尽全力予以赞助，扶掖其发展。在大学院，他更是明确

^① 《中国教育的发展》，见《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473页。

^② 以上所引，参见《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一书，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地将“科学化”列为教育宗旨之首，主张大力“实行科学的研究与普及科学的方法。”这位毕生致力中西文化融合的学界巨子，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国人：“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故我国不言新文化就罢了，果要发展新文化，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呵！”由此可知，蔡元培晚年专心供职中央研究院，与他的理想和追求大有关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系“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其职责为“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按照蔡元培的说明，该院乃“综合先进国之中央研究院，国家学会、及全国研究会议各种意义而成，…其组织分行政、研究、评议三部，而研究为其中坚。”到1929年初，中研院先后建立了物理、化学、地质、天文、气象、动植物、心理、工程、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等十个研究所，分布于南京、上海、北平等地。担任这些研究所所长职务的，均为在各学科领域具有高深造诣的科学家和学者，诸如丁燮林、庄长恭、李四光、余青松、竺可桢、王家楫、汪敬熙、周仁、傅斯年、陶孟和等。据1931年的统计：中研院的专职研究人员约为170人，其中研究员50人，助理研究员120人。此外，兼职或特约研究员尚有49人。可以说，中研院的科研阵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而且确实做到了极一时之选。许多知名学者都曾先后在这一研究机构任职，如翁文灏、涂长望、严济慈、胡刚复、吴有训、陈遵妫、伍献文、唐、赵元任、王小徐、陈垣、李济、王云五、陈寅恪、林语堂、周鲠生、杨端六、陈翰笙、吴定良等。中央研究院的总办事处设在南京，同时设有上海办事处，行政人员总计二十余人，全院行政事务由总干事负责。在蔡元培主持中央研究院期间，先后担任或代理总干事一职的有杨杏佛、丁燮林、丁文江、朱家骅、傅斯年和任鸿隽。其中，以杨杏佛和丁文江二人的成绩最为突出。

杨杏佛早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康乃耳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机械以及工商经济专业，曾与任鸿隽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大学院成立后，担任教育行政处处长，旋即出任副院长，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蔡自述：“我在大学院的时候，请杨君杏佛相助。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①这种合作关系也带入了中央研究院。中研院草创之时，百事待举，杨协助蔡元培筹划落实，充分展现了他多才多艺，处事干练的管理才能。杨遇刺后，蔡顿失股肱，继而聘请丁文江担任总干事。丁文江早年留学日本和英国，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同时又在古生物学、人类学和军事历史等方面有所建树。他曾先后出任北票煤矿总经理和淞沪商埠督办，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和决策魄力。在中研院，丁在蔡的全力支持下，组织评议会，成立基金保管委员会，制定各研究所预算标准，为该院日后的发展做了必要的基础工作。尤其是组建中研院评议会，意义甚大。由于种种复杂的关系，中研院创立之后，拟议中的评议会迟迟难以组成，延宕七、八年之久。丁文江到院后，广泛与各方协商，拟订条例，在不长的时间内即组织起全面代表国内各类研究机构 and 高等学校的评议会，使之成为全国学术机关的联席会议，十分有利于学术联络和合作，也大大拓展了中研院的工作范围，增强了其权威性。与此同时，丁还针对中研院的实际情况提议将研究工作分为三类，即：一，属于常规或永久性质的研究，如天文、气象、地质等；二，利用科学方法研究本国的原料及生产，以解决各种实业问题；三，纯粹科学研究及与文化有关的历史、语言、人种和考古学。这种分类，使科研工作层次清晰，易于管理，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蔡元培对丁文江的

^①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200—201页，中华书局1989年。

工作予以高度评价，称其“为本院定百年大计”，值得“特笔大书”。^①

那么，在精英荟萃、群龙聚首的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如何实施领导以发挥其各自的特长呢？翁文灏曾作过一段全面的记述：

“蔡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的主要办法，是挑选纯正有为的学者做各研究所的所长，用有科学知识并有领导能力的人做总干事，延聘科学人才，推进研究工作。他自身则因德望素孚，人心悦服，天然成为全院的中心。不过他只总持大体不务琐屑干涉，所以总干事、各所长以及干部人员，均能行其应有职权，发挥所长。对于学术研究，蔡先生更充分尊重各学者的意见，使其自行发扬，以寻求真理。因此种种，所以中央研究院虽然经费并不甚多，却能于短时期内，得到若干引起世界学者注目的成绩。”^②事实确实如此，蔡元培领导中央研究院，奉行的是人才主义和学术自由，以及理论性科研与应用性科研相互兼顾的办院方针。创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蔡尽力网罗一流科学人才，只要学术造诣深厚，胜任研究工作，便不顾及其学派门户和政治倾向，充分予以任用和尊重。同时，倡导科学研究的自由精神，实行西方通行的“学院的自由”，即在保证重点研究项目的同时，充分尊重研究者在合理范围内凭自己的兴趣与见解选择和决定研究方向、研究项目，而不受他人的限制。因为“学院自由，正是学术进步之基础。”上述做法，与蔡在北京大学的实践可谓一脉相承。进行专业性科学研究，往往容易在处理理论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问题上产生偏差。蔡主持制订的《中央研究院进行工作大纲》中强调：“纯粹科学研究之结果，因多为应用科学之基础，而应用科

① 《丁在君先生对于中央研究院的贡献》，见《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第288页。

② 翁文灏：《追念蔡 民先生》，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68页，中华书局1984年。

学之致力亦每为纯粹科学提示问题，兼供给工具之方便。故此，二事必兼顾然后兼得，若偏废或竟成遍废。”^①这就为在中国开展有组织的系统学术研究确立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组织和进行具有一定规模的科学研究工作谈何容易！姑且不论由于科学落后、基础薄弱而面临的困难，以及来自传统观念和落后势力的阻力，即以经费来说，便使蔡元培焦思苦虑，举步维艰。1929年7月，中研院正式创建已经一年，但“并未领有建筑费及设备费。各研究所及图书馆、博物馆筹备处，均于每月经常费中提出大部分，以供设备之需。”草创阶段的这个“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只能就现有经费“截长补短，逐渐布置。”国民政府规定，每月由财政部门拨付10万元，作为中研院经常费用，但实际上由于连年内战，耗费巨资，经费拖欠严重。1930年10月，蔡元培在院务报告中抱怨道：“本院经费经常支绌。以经常费数目而论，用之办理一、二研究所，尚嫌不足，现本院已成立之研究所、处、馆等计有十一处之多，虽平时尽量从事节省，而欲求计划之实现，颇感困难。”这种状况，显然大大限制了中研院工作的全面展开。但同时，愈加展现出蔡元培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他以“非求速成，而常精进”之语恳切勉励院中同人在艰难时世中创造一番业绩。同时，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影响，尽力为中研院创造一个适宜的发展环境。

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国立中央研究院逐渐完善，在短短数年之内形成了一定的学术规模，并在天文、气象、地质和考古发掘领域取得可观成绩。其中，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建立，全国范围内地层结构和矿物资源的调查，以及对河南安阳小屯殷墟遗址的发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之具体的研究成

^① 《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第303、305页。

果更为重要的是，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为中国形成独立的科学研究体系初步奠定了根基，相当一批科学技术研究人才得以组织起来，从事专业性学术工作，发挥其特长，这便造就了一个对于科技落后的中国来说弥足珍贵的科技群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力提倡的“赛先生”（科学）终于在这个东方古国有了安身立命的固定场地。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中国人一味译介转述西方科学成果的状况，到中研院独自进行研究工作时，方告结束。不论中央研究院曾怎样受到时局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它的成立及其工作，是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化建设的一桩大事，它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所具有的转折性意义以及对知识价值的更新作用均是不可低估的。如果说，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开创了“学术至上”、自由竞争的一代风气，那么，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则为学术科学化进程打通了道路。

在领导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同时，蔡元培还兼任了与学术文化有关的许多或属名誉或系实质的职务。1929年始，他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董事长，主持管理和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运用这笔款项，他一意扶持科学研究事业和各项文化教育设施，并资助了众多有志于科学技术的莘莘学子。他还分别兼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等职。众多的学术教育文化方面的兼职，说明了蔡元培在中国学界所受到的高度尊敬和推崇。1935年秋天，蒋梦麟、胡适、丁燮林、王星拱、赵太侔、罗家伦等人，提议集资为蔡元培营造一处住宅，作为庆祝他七十寿辰的献礼。此举立即得到数百人的热烈响应。蒋、胡等人联名致函蔡称：“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没有一个归扰度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我

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以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1936年元旦，蔡元培回复了一封词意恳切的信，内谓：

“诸君子的用意，在对于一个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种纪念。抽象的讲起来，这种对于公而忘私的奖励，在元培也是极端赞成的。但现在竟以这种奖励加诸元培，在元培能居之不疑么？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善从长的美意，无所藉以表现；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而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①

赠屋祝寿，堪称美谈。建屋计划虽因中日战事而流产，但人们心中已筑成的“公共纪念坊”，将会铭记这位近代中国学术建设的大师所立下的不世之功。

^① 《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1—2页。

第6章 著述概观

蔡元培一生主要从事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其学术方面的著译大体是在欧洲留学期间完成的，就他的总体活动而言，属于第二位的工作。但蔡本人主观上始终以钻研学术研究为职志和宿愿，只要条件允许，便锲而不舍、乐此不疲。这便使得他对于近代学术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学术自身的内在规律有着广泛而深切的体验，可以说，他在近代中国文化学术进程中的作为和建树，基本得力于此。蔡元培的学术兴趣相当广泛，几乎达到了“以一事不知为耻”的程度，因而在中西学术方面涉猎的学科十分庞杂。然而认真考察也不难发现，他所特别感兴趣的学科基本衍生于哲学这一基本门类。从十九世纪末开始阅读西方文化典籍，到二十世纪最初几年，他便对哲学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如前所述，他之选择德国为留学之地，主要是出于德国乃近代哲学诞生地之考虑。他曾先后翻译多本哲学导论性著作，向国人介绍西方哲学流派及观点。后来上海《申报》馆庆祝建馆五

十周年而出版《最近五十年之中国》特刊，蔡特为之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充分反映了他对哲学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深刻见解。由对于哲学的偏好，而发展为在伦理学、美学乃至美育等方面的研究兴致，形成可观的学术成果，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不妨说，由哲学而伦理学、而美学，是蔡氏生平治学的主要轨迹。

当然，也有例外。蔡氏晚年笃好民族学，多次撰文介绍该学科及其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兴趣性跳跃。至于其秉承中国旧学的余脉而展现于学术成果者，则是那部实际尚未完成的《石头记索隐》。

蔡元培的研治学术，有着十分明显的一些特点。首先，其治学大体是为其教育实践供给理论依据和养份，不论是伦理学的译著，还是美学的介绍和美育的倡导，均与近代中国教育的更新发展息息相关。其次，刻意追求使中西学术文化之精华合于一体，即是说，在学术观念上无中西优劣之抽象评判，但取各自合理成份而融合之。其三，其治学方法尚未脱清代学者之窠臼，除一般介绍西洋学术之外，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设想难以形成学术实绩，故学术影响终于局限不彰。

6.1 《中国伦理学史》

清季末年，欧风美雨袭入华夏古国，千古不易的伦理道德观念开始受到西洋思想的强劲挑战。社会道德在多元价值观的作用下呈现失衡状态，首先在知识界和青年中传统伦理道德与欧美价值观念发生碰撞，深感困惑和迷惘之人所在多有。鉴于此，文化教育界有识之士力谋构架新的道德体系，以适应时代的变迁。1899年，改良变法失败后退居上海的张元济曾与来华访问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有过一次晤谈。这两位东方学者一致认识到：要培养人才，首先必须兴办学堂；在形成知识分子的伦理道

德方面，则应首先关心学校里的学生。其后，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在编辑出版新式学堂教科书方面，尤其注重修身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其实，此时正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蔡元培与张元济抱有同样的志向，他甚至具体地提出将西洋的自由平等观念与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可取成份加以有机结合的主张，他这个时期所编选的《文变》一书，实际上便体现了上述宗旨。故而，蔡元培、张元济等人共同承担了商务印书馆的修身教科书编写工作。可以说，这是蔡元培涉足近代伦理学的诱发因素。

蔡元培负责编撰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共计五册，是他先后在国内和德国写成的，于1907和1908两年陆续出齐。这套修身教科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计有修己、家族、社会、国家、职业五章，侧重于实践伦理的阐释；下篇则重点介绍西方近代伦理学理论，诸如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道德论等。从内容上看，这部成书于清代末年的修身课本，仍大体上贯穿了儒家伦理实践的传统，在修身齐家、交友处世诸多方面向人们提供了古道可风的君子仪范。值得注意的是，在论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时，蔡元培引入了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强调个人之于国家既有应尽之义务，也有应享受之权利，“人之权利，本无等差”，“国家者，非一人之国家”。这里的“天赋人权”的平等观念和否定专制政体的强烈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书中还大力张扬“博爱”思想，反复申述：“博爱者，人生最贵之道德也。人之所以能为人者以此。”

“博爱者，人生至高之道德。”并且，以儒家经典中早已为世人稔熟的格言古训比附证明，使这一思想易于为国人所接受，以此作为统率人际关系的原则。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十分新颖的伦理道德观念，例如该书开篇即揭明：“凡道德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如此重视体育的作用，在已往的修身教育

中尚不多见。蔡氏《中学修身教科书》在清末乃至民国初期曾为各类学校广泛采用，书中所体现的混合型伦理观念对新、旧过渡时代的中国社会还是颇为适宜的。

继《中学修身教科书》之后面世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是蔡元培向国人系统介绍西方近代伦理学理论的一部有影响的译著。该书著者是德国近代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弗里德里希·泡尔生（1846—1908），这位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柏林大学从事教学和著述的学者，以其《伦理学体系》一书而扬名近代伦理学界。该书共分四编，第一编为人生观与道德哲学的历史纲要；第二编阐释伦理学体系的基本概念和原则；第三编为德性与义务论；第四编为国家和社会理论纲要，主要论述作者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观点及其对合理的社会生活方式的见解。这部著作问世不久，美国、日本等国便先后出版了节译本。蔡元培留学德国期间，参照日译本和原著，将其中的序论和第二编译为中文，是为《伦理学原理》一书。蔡选译此书，是信服著者在动机论和功利论这两种观点之间所持的折衷立场，以及该书阐发学理的“平实风格”。《伦理学原理》一书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西洋近代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对诸如善恶、目的论与形式论、快乐主义和自我实现、悲观主义、灾难与神佑、义务与良心、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道德与宗教以及意志自由等理论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堪称近代中国人了解西洋伦理学观念的精良读物。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杨昌济在长沙执教时即将这部译著作为学生的教科书，青年毛泽东获读此书，曾写下万余言的笔记。可知，《伦理学原理》一书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学界颇受重视。

在翻译泡尔生的伦理学著作之后，蔡元培又译述了日本人木村鹰太郎的《东西洋伦理学史》一书。他发现，日本学者在论及中国伦理思想史时有不够准确和错讹之处，而自古伦理观念素称发达的中国，竟没有一部伦理学史，这不能不令人引为憾事，遂

决定自己动手编撰《中国伦理学史》。他在这部书的前言中称：

“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顾尚无伦理学史。迩际伦理学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槃如烛，几有互相冲突之势。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准，则益将旁皇于歧路。盖此事之亟如此。”^①的确，古代中国的伦理观念早在《尚书》中即有记载。此后，儒家学说占据主导，一套相当完备的伦理观念系统便随之渗入人文民俗之中，历代学者不断阐发己见，不同流派贯通衍替，伦理道德之说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中长盛不衰。这方面的文字材料可谓汗牛充栋，俯拾即是。然而，中国学术分科宽泛，伦理思想主要附归于哲学、政治学之中，从未独立分科，自成体系。建立独立的伦理学科，显系受西洋学术的影响和启示。重视道德教育而又对中国旧学谙熟于心的蔡元培，在欧洲学术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首先来挖掘和梳理祖国伦理思想素材，进行开发性尝试。需要指出的是，在异国伦理学说相继涌入的情势下，蔡元培非但没有舍弃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道德，反而视整理民族伦理遗产为当务之急，不如此便难以救助一代青年“徬徨于歧路”的困扰。在他看来，“近二十年间，斯宾塞尔的进化功利论，卢骚之天赋人权论，尼采之主人道德论，输入我国学界。青年社会，以新奇之嗜好欢迎之，颇若有新旧学说互相冲突之状态。”而蔡所做的工作，实质上是通过条理传统伦理素材，以证明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与近代西方的价值观念具有相通性，从而融合、折衷中西伦理观念，构建适应新时代的道德体系。这应当是蔡元培编撰《中国伦理学史》的深层动机。

《中国伦理学史》一书计有十余万字，它从“唐虞三代伦理

^① 《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1页，中华书局1984年。本节以下所引除另注之外，均为《中国伦理学史》。

思想之萌芽”写起，一直介述到清季中期戴震、俞正燮等人“渐脱有宋以来理学之羁绊，是殆为自由思想之先声”为止。其间，将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和宋明理学时代。蔡元培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暨传统伦理观念在周季即已十分完备，诸子各家所分别阐释的伦理道德观实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唐虞三代以来由实践伦理向理论伦理的归趋和飞跃。这些人伦理想的集中展示，便是儒家学说的不断成熟和系统化，因为这派学说在当时“足以代表吾民族之根本理想。”汉代以降至唐，虽然出现不少思想家，但基本是演释儒家学说之大义，独立的创见并不多。魏晋时期的“玄学清谈”明显地具有佛老色彩，但并不能撼动儒家独尊的地位。总观汉唐时期的伦理学，“学风最为颓靡，其能立一家言，占价值于伦理学界者无几焉。”关于宋明理学时代，蔡元培认为，这时的学者已受到佛老二家闳大幽渺之教义的濡染，他们虽已对齐梁以来的靡丽文风生厌，但并不回复到汉儒解经的传统之中，而是在遵从儒家大义的基础上，另辟新径，“竟趋于心性之理论，而理学由是盛焉。”以实践伦理论之，至宋明理学产生，儒家的道德规范才最终凝炼为“普及的宗教”，具有了一种难以悖逆的思想威势，后代虽不乏博学明敏之士，却大多难以挣脱理学范围，这种限制思想发展的负面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中国社会的内部活力。此种情状，进入清代以后方渐趋弱化，戴震等学者忤逆理学的言论，昭示着中国伦理思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中国伦理学史》简明概略地介绍了中国历代伦理思想家的生平和学说，并十分重视处于相同时代的思想家之间的比较和联系。书中较为集中反映作者观点的部分，是对每位历史人物及其观点概括介绍之后所写的“结论”。可以说，各章节后面的“结论”是该书的特色和精华所在。当记述先秦时代伦理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时，蔡元培敏锐注意到，“家长制度”在中国伦理社会

中的基源作用。他写到：“家长制度者，实行尊重秩序之道，自家庭始，而推暨之以及于一切社会也。一家之中，父为家长，在兄弟姊妹又以长幼之序别之。以是而推之于宗族，若乡党，以及国家。君为民之父，臣民为君之子，……各位不同，而各有适于其时其地之道德。”正是由家长制度而衍生出先秦时期的尊卑秩序，决定了人们相应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政治伦理关系。当然，这种社会伦理在特殊状态下亦有例外，其明显的一例便是“汤、武革命”。蔡元培认为：“夏、殷、周之间，伦理界之变象，莫大于汤武之革命。其事虽与尊崇秩序之习惯若不甚合。然古人号君曰天子，本有以天统君之义，而天之聪明明威，皆托于民，……故获罪于民者，即获罪于天。汤武之革命，谓之顺乎天而应乎民，与古昔伦理，君臣有义之教，不相背也。”在这里，蔡元培不仅一般地揭示了古昔的伦理观念，而且突出强调了儒家的“民本”思想。

在评述先秦诸子各家的伦理观念时，蔡元培从历史的角度对儒家的社会伦理观持基本肯定态度，他尤其赞赏儒家学说在实践伦理方面采取的调和折衷立场。他认为，儒家学说，虽其哲学之闳深，不及道家；法理之精核，不及法家；人类平等之观念，不及墨家。但儒家之言，本诸周公遗义，又兼采唐虞夏商之古义而调理之，在实践上抱持折衷主义。如“推本性道，以励志士，先制恒产，乃教凡民，此折衷于动机论与功利论之间者也；以礼节奢，以乐易俗，此折衷于文质之间者也；子为父隐，而吏不挠法，此折衷于公德私德之间者也；人民之道德，禀承于政府，而政府之变置，则又标准于民心，此折衷于政府人民之间者也；敬恭祭祀而不言神怪，此折衷于人鬼之间也。”儒家学说的广泛适应性及其理性特征，成为社会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思想观念，而终于成为“吾族伦理界不桃之宗。”蔡元培对于儒家伦理观中折衷性的肯定，并非只限于清末时期的一时认识，至三十年代，他在

《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一文中更加突出了上述观点，该文中称：“在儒家成立的时代，与他同时并立的，有极右派的法家，断言性恶，取极端干涉论；又有极左派的道家，崇尚自然，取极端放任论。但法家的政策试于秦而秦灭；道家的风气，试于晋而晋亡。……（至汉）武帝，即罢黜百家，专尊孔子，直沿用至清季。可见极右派与极左派，均与中华民族性不适宜，只有儒家的中庸之道，最为契合，所以沿用至二千年。”^①姑且不论蔡文中的现实含义，只就其论史而言，可知，他在伦理学史中对儒家所具折衷性的肯定性评价是前后一致，具有思想根基的。这一点，在对蔡元培的学术研究中颇值得引起重视。

当然，具体到先秦诸子，蔡元培的评论是比较客观的。他认为，孔子是将中国的伦理思想全面加以总结、阐发的“集大成者”，但对其某些思想则仍需分析鉴别。他指出：“孔子之言忠恕，有消极、积极两方面，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消极之忠恕，揭以严格之命令者也。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积极之忠恕，行以自由之理想者也。”可见，蔡氏论及孔子学说，是抱着分析态度，并非统而赞之。《中国伦理学史》对于老子及道家学派，评价不高，蔡认为，“老子之学说，多偏激，故能刺冲思想界，而开后世思想家之先导。然其说与进化之理相背驰，故不能久行于普通健全之社会，其盛行之者，惟在不健全之时代，如魏、晋以降六朝之间是已。”他还认为，老子以至巧之策而精于处世之法，“此其所以为权谋术数所自出，而后世法术家皆奉为先河也。”至于墨子，蔡元培则以近代价值尺度给予充分评价，他称墨子为科学家、实利家，其兼爱而法天，颇近于西方的基督教，其所言名数质力诸理，多合于近世科学，“墨子偏尚质实，而不知美术有陶养性情之作用，故非乐，是其

^① 《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488页，中华书局1988年。

蔽也。其兼爱主义则无可非者，孟子斥为无父，则门户之见而已。”关于法家，蔡元培认为，法家之言，“以道为体，以儒为用”，开启法家学脉的管仲，首先揭明道德与生计的关系，对于伦理学界有重大价值。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以法律统摄道德，不复留有余地，“故韩非子之说，虽有可取，然其根本主义，则直不容于伦理界者也。”

在总结先秦时代的各家伦理思想时，蔡元培从理论伦理角度做了一个概论，他写道：“老子苦礼法之拘，而言大道，始立动机论，而其所持柔弱胜刚强之见，则犹未能脱功利论之范围也。商君、韩非子承管子之说，而立纯粹之功利论，庄子承老子之说，而立纯粹之动机论。是为周代伦理学界之大革命家。”然而，“其时学说，循历史之流委而组织之者，惟儒、墨二家。”显然，这是中国人接触西方近代伦理学说以后，对自己的思想祖先所作的首次学理上的分类，尽管在某些方面还嫌简略笼统，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毕竟藉此而有了一个可资人们考鉴的认识体系，这不能不说是近代文化建设中的一桩益事。

《中国伦理学史》对汉代以后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描述，其中写道：汉代学者，为先秦诸子之余波，唐代学者，则为宋代理学之椎轮；宋代程灏、程颐兄弟虽师法于周敦颐，然其学派亦有分野，“盖明道者，粹然孟子学派；伊川者，虽亦依违孟学，而实荀子之学派也。其后由明道而递演之，则为象山、阳明；由伊川而递演之，则为晦庵。”^①蔡元培还特别比较了程氏兄弟以及朱熹与陆九渊之间在各人性情、理气观念等方面的异同。论及朱熹，他指出，“朱子偏于道问学，尚墨守古义，近于荀子。……朱学平实，能使社会中各种阶级修私德，安名分，故

① 明道，即程灏；伊川，即程颐；象山，即陆九渊；晦庵，即朱熹。以下之横渠，即张载；濂溪，即周敦颐。

当其及身，虽尝受攻讦，而自明以后，顿为政治家所提倡，其势力或弥漫全国，然承学者之思想，卒不敢溢于其范围之外。”他进一步分析说：“晦庵学术，近以横渠、伊川为本，而附益之以濂溪、明道。远以荀卿为本，而用语则多取孟子。于是用以训释孔子之言，而成立有宋以后之孔教。”故此，宋之有朱熹，犹周之有孔子，“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蔡元培认为，朱熹的学说，承袭了中国往昔思想的主流，与我族大多数之习惯相投合，尤其适于权势者利用，因而依凭科举制度盛行于明代以后。然而，“朱学近于经验论，而其所谓经验者，不在事实，而在古书，故其末流，不免依傍圣贤而流于独断。”及至清代，士人热衷考据，“其实仍朱学尊经笃古之流派，惟益缩其范围，而专研诂训名物。”到这时，新思想的产生益加困难，传统伦理观念已接近于定型和僵化。因此蔡元培对于众多的清代学者，只选取了黄宗羲、戴震和俞正燮三人加以评介。

清季以来，黄宗羲、戴震二人的思想颇有特色和影响。人们对此已有相当的关注。蔡元培依据黄氏《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二篇，评价黄为唐以后正确阐发君臣大义之第一人；关于戴震，则指明其所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涉及到伦理学的内容，而戴氏之“特识，在窥破宋学流弊，而又能以论理学之方式证明之。”多少有些不寻常的是，蔡元培将清代中期学者俞正燮特别列出，而与举世公认的两位思想大家并提，这适足体现了蔡氏编著《中国伦理学史》所具有的价值取向。

俞正燮，字理初，安徽黟县人，生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卒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生长于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好学，“性强记，经目不忘”，二十余岁时离乡出游，足迹遍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这位博学强记，见多识广而又性格耿介的学者，属于乾嘉考据学派的晚流，其学术成就没有前期考据大师的恢宏博大，但其考据范围较前人广泛，其考据的细密程度

亦更为精深。所以梁启超说他“长于局部考证”。俞正燮经历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变化，饱读经史的学力和“足迹半天下”的阅历，使他对种种社会弊端具有清楚认识。从其所著《癸巳类稿》及存稿中考证题目的选择和直抒胸臆的真知灼见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样，他的治学态度就从纯粹“汉学家”的立场发生一定程度的游离，多少带些“经世致用”的色彩，清人张穆就曾赞他既有“宏通淹雅之才”，又有“陈古刺今之识”。在俞氏《癸巳类稿》及存稿中，关于妇女问题的考证和议论十分引人注目，其中的男女平等思想及为妇女鸣不平的许多见解与封建伦理道德大相径庭，被视为是“发千载之覆”的议论。鲁迅曾经在《病后杂谈之余》中写到：有史以来，中国人身受过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苦难，“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象活在人间。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觉得义愤填膺的人。”俞正燮在《节妇说》、《贞女说》、《妒非女人恶德论》、《女子称谓贵重》、《女吊婿驳义》、《尼庵议》、《娣姒义》、《书旧唐书舆服志后》等篇中，对千百年来歧视妇女的道德、风俗、观念等大胆提出异议，用精严的考证说明上古时代男女平等的事实，从人道的角度论证理学道德规范的不合理和“非人性”，启迪人们改变此种不公平的人类现象。

蔡元培认为，“凡此种种问题，皆前人所不经意。至理初，始以其至公平之见，博考而慎断之。虽其所论，尚未能为根本之解决，而亦未能组成学理之系统，然要不得不节取其意见，而认为至有价值之学说矣。”因此，在《中国伦理学史》中，他将历来不被世人注意的俞氏言论予以介绍，做了十分可贵的思想资料的挖掘和充分评价。蔡晚年回忆自己青年时期的读书生活时指出：“自《易经》时代以至清儒朴学时代，都守着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称谓贵重》……等篇，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

等的理想。……我至今还觉得有表彰的必要。”^① 蔡元培对于俞正燮的推崇，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俞氏能够“认识人权，认识时代”，勇于突破宋代理学的思想樊篱，其思想底蕴已颇接近于近代西洋伦理价值观念，在茫茫中国古代思想界堪称凤毛麟角。虽然，俞氏仅仅发出了一些就事论事的独特议论，思想深度和理论体系均还谈不上，但他所表现出的鲜明倾向，却具有十分可贵的伦理价值，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理性的人道主义认识。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上特予记述，恰恰表明了他与俞氏在思想上的一致性。蔡生平致力于女权的提倡，奋力推进中国的男女平等进程，与他受到俞正燮伦理思想的影响大有关系。

在《中国伦理学史》的结尾处，蔡元培不无感慨地论述到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中国学术文化的长期停滞、难以与时俱进的问题。在他看来，“我国伦理学说，以先秦为极盛，与西洋学说之滥觞于希腊无异。”此后，西洋学术文化不断发展，其成就已远非古人所能及。而中国自汉以后，思想之“大旨”不能超出儒家的范围，即使以朱熹的勤学、陆九渊、王阳明的敏悟、戴震的精思，其学术所得亦不过尔尔，终难有突破性创见。他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四：“一、无自然科学以为之基础；二、无伦理学以为思想言论之规则；三、政治宗教学之结合；四、无异国之学说以相比较。”印度的佛教虽阔深，但其厌世出家之法，与我国通行的实践伦理不甚相合，因而不能产生根本性影响。蔡元培预计，随着西方学说的传入，思想自由的空气不断浓厚，中国传统思想与新观念的碰撞和融合，将会造就出新的伦理学说，这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伦理学史》是一部开发性著作，它以近代西方伦理学观点为主导，对中国两千余年的思想史料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整理

^① 《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550页，中华书局1988年。

和论述，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新文化建设中一件颇有意义的工作。1937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列入“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二辑，重新印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部著作是中国伦理学研究方面的唯一成果。诚然，该书以日本学者的著作为蓝本，在一些地方留有编译的痕迹，但蔡元培作为中国旧学的饱学之士，又有机会充分接触西洋伦理学说，因而该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修正了日本学者所著书中的错讹之处，而且对古代思想学说点评比较，又有所充实，具备了自己的特点。正因如此，1941年日本学者将该书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蔡元培当年编撰这本《中国伦理学史》，是为学校伦理教学提供参考书，“故至约至简”。今天看来，该书只是相当粗略地描摹了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但它确乎为此后的有关研究开辟了路径。

6.2 哲学、美学与美育

在蔡元培一生所发表的较为系统的文字中，有关哲学的内容最多，其中主要是译述。如果说，他的关于伦理学方面的著述还只是集中在民国之前完成的话，那么，对于西方哲学的介绍和对中国哲学的阐释则贯串于他的中年和晚年，即令在其对于美学的兴致极高之时，也不曾中断对于哲学问题的关注，垂暮之年，他还兴致勃勃地为青年刊物撰写《怎样研究哲学》的文章。本来，不论是伦理学抑或美学理论，均涵盖于哲学的范畴，离不开哲学这个学科基础。因此，说蔡元培生平学术的根基是哲学，大致是不错的。

引发蔡元培对于哲学问题产生兴趣的，应当是他早年“寝馈其间”的中国旧学经典。自中年之后，大量阅读西学译本书，使他对于近代西洋哲学萌生倾慕之心。追本寻源的求知热望，推动着他谋求留学德国的机缘。他所翻译印行的第一本书便是德国学者科培尔的《哲学要领》，其时，他正在青岛躲避“苏报案”的

风波并准备赴德求学。为什么要译述这本书？蔡元培在该书序言中谈到他的本义说：时当新旧过渡，各类学说樊然并峙，哲学方面自有不同流派，倘断章取义，难免误入迷津。”初学者不得正宗之说以导之，将言唯物而诋纯正哲学之蹈空，言惟心而嗤物质文明之为幻，言有神而遂局古代宗教之范围，言无神而又以一切宗教为仇敌。门径既误，成见自封，知之进步，于焉窒矣。”^①有鉴于此，他选译了德国科培尔在日本文科大学的授课笔记。在他看来，科氏所言，“皆以最近哲学大家康德、黑格尔、哈尔妥门诸家之言为基本，非特唯物、惟心两派之折衷而已。其所言神秘状态，实有见于哲学、宗教同源之故。而于古代哲学、提要钩元，又足以示学者研究之法，诚斯学之门径书也。”二十世纪初，西洋哲学在中国还属相当生疏的新学，即使在开新较早的上海学界，对于诸多哲学概念、学说及其相互关系亦处一知半解的朦胧状态。要使国人较为全面了解西方哲学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一部相对严谨而通俗的入门书显然是十分必要的。蔡元培适时地做了这项工作。《哲学要领》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理念、学术类别、研究方法及派别体系，从古希腊哲学家的学说到近世欧洲哲学的各种理论，均作论列，其中尤其详述归纳法、类推法、演绎法和辩证法的各自特点，对学习和研究西洋哲学颇有助力。蔡元培最初译述此书虽较为粗糙，但后来经过修订，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出至七版，可见该书还是受到社会欢迎的。

此后，蔡元培还翻译了一部份量颇大的学术著作，这就是日本学者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井上圆了曾在日本创办一所哲学学校，潜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和教学活动。他的著述比较适合东方民族的求知心理，其著作在本世纪初的中国读书界颇为流

^① 《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17页，中华书局1984年。

行。《妖怪学讲义》采用近代科学原理解释自然界种种奇异现象，又通过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说明人类的各种异常精神感觉，使人们视为“妖怪”的现象逐一求得科学解释，堪称一部新奇之书。虽然此书并非哲学专著，但其内容涉及人类的认知心理和过程，与哲学问题有不少联系。蔡元培奋力翻译了该书总共八大卷中的绝大部分，交杜亚泉在上海开办的亚泉学馆付梓。因学馆失火，书稿大部被焚，仅先行排印的总论部分得以保存，遂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1906年8月印行的《妖怪学讲义总论》。值得一提的是，井上圆了此书在当时有多种中译本，章太炎、何琪等人亦曾对此书进行翻译，可见该书受重视的程度。蔡元培对此书的译述，是他赴德国留学之前所进行的一项重要文字工作。

进入民国以后，蔡元培还曾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先后编译了两本哲学导论性书籍，作为师范学校的教科书。一本是1915年出版的《哲学大纲》，一本是1924年出版的《简易哲学纲要》。两书均是蔡旅居欧洲时所完成，而依据的蓝本又都是德国哲学家的著作。在德国四年的留学生活，以及后来数次旅居欧洲，使蔡元培的学术视野大为拓展，广泛接触西方哲学著述和学者，使他对现代哲学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化，在借鉴和比较中，开始形成自己的某些固定见解。这些，都不同程度的反映在上述两本书中。《哲学大纲》和《简易哲学纲要》虽然主要是依据李希脱尔、泡尔生、冯特和文德尔班四人的有关著作编译而成，但蔡元培同时兼采的其他哲学著述却相当广泛，在论述过程中又往往加入他自己的观点，故而，可以说，这两本书所体现的学术水平和素养，与先前译述的《哲学要领》一书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它们均以哲学入门书的形式出现。《哲学大纲》中“宗教思想”一节，蔡元培便表达了他那“真正之宗教，不过信仰心。……凡现在有仪式有信条之宗教，将来必被淘汰”的宗教观。在

《简易哲学纲要》“自序”中，他告诫“初学哲学的人，最忌的是先存成见，以为某事某事，早已不成问题了。又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就奉为金科玉律，以为什么问题，都可以照他的说法去解决；其余的学说都可以置之不顾了。入门的时候，要先知道前人所提出的，已经有哪几个问题？要知道前人的各种解答，还有疑点在哪里？自己应该怎样解答他？这一本书，大半是提出问题与提出答案中疑点的，或者不至引入到独断论上去。”^①可见，这两本书确乎是“引人研究哲学之作”。两书的章节框架大体相同，但由于其所据底本出版时间相隔约二十年，故学术观点的时代性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这也反映出蔡元培治学的进取精神。

那么，蔡元培何以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编写哲学入门读物呢？这与他对中国近代学术的总体认识有关。在他看来，宋代以后，中国的哲学思想便渐趋僵化，到清代，几乎无哲学思辨可言。这种学术状况，是导致近代中国全面落后的要因之一。欲救此弊，便应学习西方先进的学术成果，创造中西合璧的新文化。因此，大力介绍西洋哲学即成为至关重要的急务。二十年代初，《民铎》杂志出版“柏格森专号”，集中向国人介绍这位西方哲学大师的生平和学说，蔡元培特为之译述《柏格森哲学导言》，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完全可以说，在传播西方近代哲学方面，蔡元培做了许多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在广泛接触西方哲学思想过程中，蔡元培深受德国哲学家的影响，其中尤以康德为甚。蔡几乎没有保留地接受了康德学说中有关“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思想，并将之运用到他的教育实践之中。蔡首次在国人面前演绎他的哲学观念，是民国元年发表的那篇知名度颇高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在这篇阐释

^① 见《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389页，中华书局1984年。

民国教育方针的文章中，蔡元培所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充分展现了出来。在论及政治家与教育家的不同时，他搬出了哲学依据：

“盖世界有二方面，一如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那么，所谓“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二者区别何在？蔡元培解释道：“前者相对，而后者绝对；前者范围于因果律，而后者超轶于因果律；前者与空间时间有不可离之关系，而后者无空间时间可言；前者可以经验而后者全恃直观。”他指出，“实体世界”，难以名状，“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神，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其名可以万殊，而观念则一。”^①在这多少有些玄奥神秘的论述中，人们不难看到康德“心物二元论”的思想成份，也似乎感受到某种略带宗教色彩的高妙与超然。在蔡元培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倡导“教育独立”，提倡美感教育与心灵陶冶，追求“完全之人格”，在在都含着这个哲学意识作为其理念根基。虽然，他没有能够撰成专著，阐发其哲学思想，但在为数可观的文章、演说中，康德哲学所给予他的影响一再表露，并且间或掺杂着叔本华等人的思想成份，这些确乎构成他庞杂的哲学思想的中坚部分。

蔡元培对于使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甚为热心，大力提倡。他曾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以及《自由哲学》、《逻辑学》、《佛法与科学比较之研究》、《哲学辞典》、《中国思想研究法》等多种专著作序，热情推广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界的变迁，他也予以高度关注，并有精到评论。这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

^① 《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133页，中华书局1984年。

学》^①一文中。这篇写作于1922年的三万字的长文，详述清末民初几十年间中国哲学领域的学者及其学说、特点，并适当进行评价。他写道：“最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现在只能讲讲这五十年中，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关于西洋哲学的介绍，他高度赞许严复译介西方人文社会学说的贡献，指出：“严氏介绍西洋哲学的旨趣，虽然不很彻底，但是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译得很慎重，常常加入纠正的或证明的案语，都是很难得的。”蔡元培以很大的篇幅充分评述了王国维介绍德国哲学的学术活动，他评论说：“王氏介绍叔本华与尼采的学说，固然很能扼要；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关于中国旧学的整理，他认为，近年整理国故的人，不是受西洋哲学影响，就是受印度哲学影响，在孔子学派上想做出一个“文艺复兴”运动的，是康有为，康是把进化论的理论应用于《公羊春秋》的“三世说”和《小戴记》“礼运”篇的小康大同上面，仿效其路径的还有谭嗣同。蔡元培特别提及，与康、谭同时的宋恕、夏曾佑两人都有哲学家的资格，宋也是反对宋、元烦琐哲学，要在儒学里面做“文艺复兴”的运动；而夏则是一个专门研究宗教的人。蔡同样以相当数量的文字评述了宋、夏二人的著述和观点。

在这篇总结性文字中，蔡元培以十分突出的笔触论及章太炎的学术成果，他写道：“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他认为，章氏对于佛教各宗，除密宗、净土宗外，虽皆所不弃，而所注重的是法相。章以齐物论为作用，又时取“随顺有边”之法。

^① 载于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1923年出版。

看国内基督教的流布，在日本时，见彼方学者稗贩欧化的无聊；所以发矫枉的议论。章氏《检论》中订孔、道本、道微、原墨、通程、议王、正颜诸篇，都可当哲学的材料。其中说王阳明是“剗切”，不是“玄远”；说颜元“所学务得皮肤，而总搯之用微”，都是卓见。其《葑汉微言》上半卷，用“唯识”证明《易》、《论语》、《孟子》中的玄言，也都很有理致，并非随意附会。蔡元培也对胡适、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的著述有所论列。他从哲学史的角度概括道：“凡一时期的哲学，常是前一时期的反动，或是再前一时期的复活，或是前几个时期的综合。”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是中国学术界对清末民初几十年间思想学术成果的首次全面回顾和总结，他那平实的叙述和精到的点评，不仅帮助时人进行了一次学术巡礼，也为后代留下了可贵的学术思想史料。

在广泛涉猎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过程中，蔡元培对美学产生浓厚兴趣。从他在德国留学的活动来看，对欧洲民族艺术的欣赏是促使他研究美学的触媒。然而，几乎从一开始，他所从事的美学研究便含有一种社会功利的动机，即通过美来陶冶心灵，净化社会。这样，蔡元培对于美学理论的兴趣和钟爱就主要不是进行理论体系的架构，而是致力于对大众的感化——美育。蔡元培在民国以后的二十余年里，曾经写过不少有关美学的文章，诸如《美术的起源》、《美术的进化》、《美学的进化》、《美学的研究法》、《美学讲稿》、《美学的趋向》、《美学的对象》等等。其中，除了运用西方人类学材料探讨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具有明显的学术研究性质以外，大部分是对西方美学理论（尤以康德美学观点为中心）所作的转述性介绍，虽然偶或亦掺有蔡的个人见解。是否可以这样说，在美学方面，蔡元培向国人所作的普及工作远远甚于理论研究。这便是人们所遗憾地看到的：他的美学观点既不系统（缺乏思辨性），又在许多方面显得浮泛。的

确，在美学理论的研究方面，蔡元培不如同时代的王国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蔡元培在其教育生涯中力倡美育，不论是民国元年首次将美育列入教育方针，还是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伊始即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鲜明主张，甚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大声疾呼“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都不同程度地在学界产生了影响。相形之下，他探讨美术起源的学术文章，在湖南教育界所连续进行的关于美学的演说，以及以校长身份在北大等校讲授《美学》课程，似乎都是在为使国人认同和接受美育所做的一种必要的基础性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认识蔡元培的美学研究与美育实践的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他研治美学的“入世”倾向。

无疑，蔡元培是中国提倡美育最力的第一人。王国维、鲁迅等人虽在理论或某些实践方面均有建树，可是不足以与蔡元培的影响相比较。在时间的久长、范围的广度和提倡的力度上，蔡堪称中国近代美育之父。他自称：“美育者，予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之者也。”但是早在1900年3月他手订的《夫妇公约》中，已经能够找到与后来的《美育实施的方法》几乎相同的一些内容。那时，其美育主张即已初露端倪。这一主张的正式提出是在民国元年，“针对当时疲惫的人心，动乱的社会，极力倡导美育。”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知识界深切关注国民性问题，进行反思和探索之际。美育的提出，实质上是蔡元培从进取的方面，为重新塑造合于近代文明标准的完美国民性所提出的设想。他认为，要使国人从蒙昧状态中彻底觉醒，非“扩充其知识，高尚其道德，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其中心是培养“完全人格”的道德教化，而“世之重道德者，无不有赖乎美术及科学，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科学与美育，在他看来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两个支点：“文化是意志活动的现象，意志的活动，恃有两种能力：一是推理力，以概念为出发点，演成种

种科学；一是想象力，以直观为出发点，演成种种文艺。”^①基于此，他在大力推行科学教育的同时，连篇累牍地撰写文章，并多次发表演说，以一种虔诚而激切的心理向国人宣讲美育的作用和价值，同时，设立艺术院校，开展美育活动。这样做，显然是从陶冶人的性情人手，改变国民的生活和心理环境，使整个民族具备一种内在的优美气质，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改变文化人的精神面貌，是推行美育的重要一步。蔡元培多次指出，“专治科学，太偏于概念，太偏于分析，太偏于机械的作用了。”应当“求知识以外，兼养感情，就是治科学以外兼治美术。”^②这里的所谓“美术”是指文学、艺术的广义概念。内在精神的变革常常是最重要的变革，蔡元培的美育主张是深得此要领的。鲁迅亦曾讲过类似的话：“盖使举世惟知识是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③显然，充溢优美气质的民族，必定是有生气而富于创造力的。蔡元培曾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法两国交战，谈起美育与国民素质的关系，佐证了其以美育改造国民性的深层动机。然而，这个良好愿望在条件不充分具备的历史时代，显得大大“超前”了。人们抱怨这种来自书房或客厅的一相情愿的理想，并非毫无道理。蔡元培也不无遗憾地回顾：“我以前曾经很费了些心血去写过些文章，提倡人民对于美育的注意。当时很有许多人加入讨论，结果无非是纸上空谈。”^④事实确实如此，当二十年代初，蔡元培力倡美育之时，文化教育界颇有人应和。刘伯明、

① 以上所引，分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12页；第120页；《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第305页。（后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② 《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33—34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③ 鲁迅《坟·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5页。

④ 蔡元培《与〈时代画报〉记者谈话》，见《蔡元培美育论集》第21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

李石岑、吕澂、孟宪承、张竞生等都曾发表文章或演说，赞成实行美育。甚至梁启超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演，亦以《美术与生活》为题，盛言美育之作用。但是，实际社会成果则寥寥无几。当然，美育在人类生活中有一个伴随环境变化而逐渐被接受的过程，由于蔡元培的大力提倡，在中国人的教育观念中毕竟已占据了一个位置。

不能不指出的是，蔡元培在美学理论上的薄弱，使他在提倡美育时常常处于论据不充分的境地。“以美育代宗教说”提出后的二十年中，虽被反复重申和强调，但终因这一命题缺乏足够的理论论证而难以为社会认可和接受。仅仅单纯传扬西方美学理论，不做细密的理论再创造，这一欠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育的社会普及进程。如果不是苛求的话，这或许是蔡元培力倡美育而成效不彰的一个主观因素。

6.3 《石头记索隐》

蔡元培著述中引起学术界特别关注，以至引发一场争论的，是那部《石头记索隐》。由此，蔡氏得到了旧红学家索隐派的称号。

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兴趣，蔡元培是受到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中所述徐时栋观点的启发，徐氏认为，《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清初巨宦明珠食客，其中以薛宝钗影射高澹人（士奇）、妙玉影射姜西溟。蔡开始作《红楼梦》疏证，是在1898年或这之前。他在该年的日记中曾有如下记述：“前曾刺康熙朝士佚事，疏证《石头记》，十得四、五，近又有所闻，杂志左方，以资印证。”如“林黛玉（朱竹垞）、薛宝钗（高澹人）……宝玉（纳兰容若）、刘姥姥（安三）。”^①此时，蔡元培正在北京清政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第1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府翰林院供职。以后，他又接触到清人《乘光舍笔记》等书，其中关于红楼梦小说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的说法，使他感到：“尤与鄙见相合”。循此思路，蔡元培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陆续考证出十余则，但他自忖这项红楼梦疏证的工作尚不成熟和完备，并未付诸梓版。不过，他对于这部文学巨著的研究在其朋辈之中该是有所了解的。因此，1914年，蔡在法国将《红楼梦疏证》（《石头记索隐》初名）基本定稿之后，上海商务印书馆便驰函建议他加一结束语，尽快发展。蔡氏《石头记索隐》首次面世是1916年1—6月在商务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出版者特辟“名著”一栏，以示重视。依照蔡原来的想法，刊载后本不急于将此稿结集出书，而愿进一步润修增补，以成全璧，至少在内容上要更加充实。可是同年秋，蔡被任为北京大学校长，旋即回国。同时，上海出版界已经刊出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一书的发行广告。故此，张元济函劝蔡元培：“……若大著此时不即出版，恐将来销路必为所占。且驾既回国，料亦未必再有余闲加以润饰，似不如即时出版为便。”这样，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遂于191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单行本。

长篇小说《红楼梦》问世后，从清季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一直为历代文人所津津乐道。围绕这部内容宏大、构思奇巧的文学巨著，人们曾进行热烈地评论和多方面的猜度、探讨。其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自清光绪初年，便出现“红学”这一专门概念，有人甚至将“红学”与“经学”相提共论，小说家言俨然步入了大雅之堂。进入民国以后，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有增无已，一些有分量的红学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学术界似乎正酝酿着一次红学研究的“突破”。蔡元培作为民国名人，在学界有很高地位，他亦加入到红学研究的行列，自然引起世人的关注。《石头记索隐》从1917年初版，到1930年已出至第十版，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

蔡元培从事《红楼梦》疏证的十余年间，正是“排满”之声四起、民族主义激情高扬之时，这种时代氛围，对于他显然有深刻影响。《石头记索隐》劈头便写道：“《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①从这段文字可知：蔡元培考证疏解红楼梦的基本动机是宣扬民族主义思想。由此出发，他认定，小说作者“于汉人之服从清室，而安福尊贵者，如洪承畴、范文程之类，以娇杏代表之。娇杏即徽幸。……于有意接近（清朝），而反受种种之侮辱，如钱谦益之流，则以贾瑞代表之。……叙尤三姐，似以代表不屈于清而死者。”他还指出，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蔡元培甚至断定，贾府即伪朝，乃指斥清廷之意。诸如此类的疏证，其根据是否充分、论断是否可信，我们暂且不论，只就其中所强烈显现的民族的、政治的意念而言，可以说，蔡氏作此《索隐》有别于闲适文人的“戏笔”之谈，而寓有相当的社会现实深义。也正因如此，人们称蔡为红学中的“政治索隐派”。

《石头记索隐》采用对比的方法，广泛征引史籍记载的相关材料，与小说情节相比附，以支持考证者的论点。蔡元培对《石头记》探索幽隐的具体成果是，他考证出：贾宝玉，即是传国玉玺之义，乃影康熙时的废太子胤礽；林黛玉，影朱竹垞，即朱彝尊；薛宝钗，影高江村，即高士奇；探春，影徐乾学；王熙凤，影余国柱；史湘云，影陈其年；妙玉，影姜西溟；惜春；影严荪友；宝琴，影冒辟疆；刘姥姥，影汤潜庵。此外，他还列举了若

^① 蔡元培著《石头记索隐》，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69—112页。

干小说情节与康熙朝时事相关连的条目，以佐证自己的观点。在结束这四万余字的考证文章之前，蔡氏写到：“以上所证明，虽不及百之一、二，然《石头记》之为政治小说，决非牵强附会，已可概见。触类旁通，以意逆志，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可也。”总之，蔡元培认为，小说《红楼梦》实在是把康熙朝的种种伤心惨目的事实，寄托在香草美人的文字上面，完全可以视为政治小说，只要剥离作者故意布下的“障幕”，便可作为历史书籍来读了。在这部著述中，蔡广征博引，努力使自己欲证明的问题具有充分的依据，从而达到他主观上所认真追求的“严谨”和“审慎”。看来，蔡元培对这部《石头记索隐》也颇为自信，视为自己著述中的精心得意之作。

清末民初时期，学术界探索《红楼梦》本事的倾向趋盛，人们依照各自的观感和理解，参考不同资料，分别作出论断。其中，即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书。由于他们着力于钩稽探寻红楼梦小说中“真事隐去”的那部分内容，因而通常被称为“索隐派”。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篇幅要小得多，其内容亦并非逐回索证，而只是就其考证所得详实记述而已。但是，蔡氏该书在其疏解问题方面所征引的资料较为丰富，表明了作者用力之勤；尤为重要的是，该书在进行人物疏证时，绝非毫无原则可循，而是自有其一套“规范”。蔡元培称：小说中所影射的人物“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他举例说：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孙友，是用第一法；以宝玉曾逢魔魇而推为允初，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国柱，是用第二法；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是用第三法。并且“每举一

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①当然，这并不是说蔡氏这部《索隐》比那个时代的同类著作高明多少，而是意在指出，蔡元培在主观上是追求比较严谨的治学方法的，与那些游文戏笔的红学研究文字不同，蔡的治学和写作是认真的。正因如此，当胡适一派新红学家大胆批评包括蔡元培在内的旧红学索隐派时，一向雍容大度的蔡先生禁不住站出来与之争论短长了。

《石头记索隐》出版四年之后，年轻气盛的胡适推出了他的《红楼梦考证》一文。这篇近二万字的论文，系统考证了《红楼梦》的作者、家世和版本，得出该书乃作者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传的结论。胡适在文章中对以往的红学研究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向来研究《红楼梦》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料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他嘲笑“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只是“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由于胡适考证出曹雪芹的家世，又发现脂评红楼梦抄本，因而在红学研究领域产生绝大影响，新红学派由此发轫，他的许多观点也渐为学界所信服。应当说，胡适对于旧红学的批评，用语虽稍嫌尖刻，但显然是正确的。不过，胡适的考证亦有自身的弱点，如过于夸大考证小说作者的意义，断定红楼梦为作者自传之说仍是建立在假设、猜度的基础之上，论据不足而显得武断。正因如此，蔡元培对于胡适的批评不大服气，遂撰文进行自辨，并与之“商榷”。

1922年1月，蔡元培趁《石头记索隐》出版第六版的机会，写了一篇“自序”，其副题即标明“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

^①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69页。

梦考证》之商榷。”他申述了自己进行红楼梦疏证的起因和方法之后，颇为自信地表示“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故而，对于胡适的批评“殊不敢承认”，而胡氏考证红楼梦的观点，“实有不能强我以承认者。”接着，蔡从几个方面与胡展开“商榷”。他写道：胡先生考证出作者的生平与家世，固然有功于红学研究，但“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他列举中外文学研究中的许多实例，证明考证情节，不能一概视为附会而加以排斥。他还写道：“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以为必如是而后值得猜也。”蔡的这一辨白，从形式上似乎颇与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相吻合。总起来看，蔡元培的自辨虽罗列了不少材料，但因逻辑松散、偏离主题，而显得不很有力，倒是他驳论胡适“自传说”的文字比较切中要害。他写道：“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大端考定，遂断定《石头记》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案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又使宝玉为作者自身影子，则又何必有甄贾两个宝玉？”最后，蔡仍坚持认为，“《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

对于蔡元培的这篇驳论性文章，胡适颇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写到：“蔡先生对于此事，做得不很漂亮。我想再做一个跋，和他讨论一次。”（1922年2月18日）胡的弟子俞平伯读了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蔡元培文章后，先自在上海《时事新报》撰文予以批评，指出，“《石头记索隐》确是用附会的方法来考证情节的。我始终不懂，为什么《红楼梦》底情节定须解成如此

支离破碎？又为什么不如此便算不得情节的考证？为什么以《红楼梦》影射人物是考证情节，以《红楼梦》为自传便不是考证情节？况且托尔斯泰的小说，后人说他是自传，蔡先生便不反对；而对于胡适之的话，便云‘不能强我以承认’，则又何说？”字里行间，颇具一种质疑辨难的气势。胡适从事红楼梦考证的主要“同道”顾颉刚则在致胡的信中深入剖析了蔡的观点，他认为，“蔡先生的根本错误有两点。第一，别种小说的影射人物只是换了他的姓名，男还是男，女还是女，所做的职业还是这项职业。何以一到《红楼梦》就会男变为女，官僚和文人都会变成宅眷？第二，别种小说的影射事情，总是保存他们原来的关系。何以一到《红楼梦》就会从无关系发生关系。例如蔡先生考定宝玉为允初，林黛玉为朱竹垞，薛宝钗为高士奇，试问允初和朱竹垞有何恋爱的关系，朱竹垞与高士奇又有何吃醋的关系？这两项是蔡先生无论如何不能解答的。若必说为性情相合，名字相近，物件相关，则古往今来无数万人，那一个不可牵到《红楼梦》上去！实在蔡先生这种见解是汉以来的经学家给与他的。”^①在顾颉刚看来，蔡氏研究红楼梦的方法，颇有几分类似于经学家诠释孔孟典籍的“注经之法”，实际是说，在治学路径上，蔡受旧学影响太深。不妨说，顾的见解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新型知识分子对蔡研治红学的基本评价。

胡适于同年5月撰写了《跋红楼梦考证》，其第二部分便是“答蔡子民先生的商榷。”他认为，蔡氏的“性情相近，轶事相征，姓名相关”这三种推求小说人物的方法，只适用于《孽海花》、《儒林外史》等少数小说之中，而“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他引述顾颉刚来函中所提出的两个问题，

^① 俞平伯文和顾颉刚函均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284—28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作为对蔡氏自辨的反驳，进而突出强调考证作者生平的意义，指出，离开作者生平而索解小说，只会陷入荒唐可笑的盲人说象的境地。蔡、胡之间的这场争论，曾被有的学者称为“一场震撼全国的论战”，它确乎反映了在红学研究领域里新与旧两种学派的意见对立，其分歧的内含，则显示出两代学者不同的学术背景和思维训练。争论的结果，仍是各执己见。直到三十年代，同样性质的学术争论还时有出现。红学研究中“索隐派”著作依然相继出版，其中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承袭了蔡元培的主要观点。甚至到五十年代末海外出版的研究专著中仍有学者坚持认为红楼梦乃反清吊明之书。不过，应当承认，胡适所开辟的研究路径业已成为“五四”之后红学研究的主导，旧红学的余脉却日渐萎缩。

客观地讲，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反映了“五四”之前红学界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水准，在后人看来，其治学方法的幼稚和所得结论的不确是不言而喻的。人们并不会因为它宣扬了在那个时代具有革命意义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认可其学术价值。当年，胡适等人对他们素所尊敬的蔡先生进行的尖锐的学术批评，表现了后辈学者的进取精神和更新意识。蔡元培能够扶助胡适一代人从事新文化的建设，却在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流露出相当程度的滞后倾向，这充分显示了蔡文化性格上的复杂性。就文化教育的背景而言，蔡与胡一辈人属于两代人，他们之间发生学术争议并不足怪。问题在于，蔡长期吸吮西洋文化的养份，主观上亦十分注重科学方法，在中国的文化建设上颇多卓越见解，并有非凡建树，何以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与传统的中国文人并无二致？这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现象，还是暴露出蔡在思想方法上的严重缺欠？显然，在他身上，西洋近代学术的科学精神还没有化解为得心应手的思维方法，在一些问题上，中国旧学的影响仍具有十分强韧的张力。这样一种混合型的知识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复杂文化性格，在清末民初那样的过渡时代，很具有代表性。《石头记索

隐》及其所引出的故事，十分明显地提示人们：要理性地认识作为学者的蔡元培的成败得失及其因由。

6.4 暮年倾心民族学

1934年12月10日，蔡元培在南京中央大学发表了一个题为《民族学上之进化观》的演说。其中谈到：“我向来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的范围太广，想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一点，乃专攻实验的心理学。当时有一位德国教授，他于研究实验心理学之外，同时更研究实验的美学，我看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是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于美学得一彻底的了解，还须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须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适值美洲原始民族学会在荷兰、瑞典开会，教育部命我去参加，从此我对于民族学更发生兴趣，最近几年常在这方面从事研究。”^①这段自述，勾勒了蔡氏中年以后研治学术的基本轨迹，同时告诉人们，他对于民族学的兴趣老而弥坚，以至成为其暮年倾心研讨的一门学问。

蔡氏多年游学于德国和法国，深受欧洲民族学大陆学派的熏染，即使在其对美学和美术史发生浓烈兴趣之时，民族学（或称人类文化学）也始终作为一个密切的相关学科，在方法和材料方面为他研究美学理论和美术史起着辅助性作用。蔡的长篇论文《美术的起源》即广泛利用民族学的学术成果来论述美的起源问题。可以说，在蔡元培研治美术史的过程中，美学偏于抽象的理念，而民族学则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实证，这或许是他晚年较多偏向于民族学问题的某种原因。1924年，他在欧洲参加国际民族

^① 《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455页，中华书局1988年。

学会议，遇莱比锡大学同学、德国民族学家但采尔，在但氏的鼓动下，他以年近花甲之龄进入汉堡大学，专研民族学。从此，民族学在晚年蔡元培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一个突出位置，他向国人介绍这门学科，并热心从事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工作。

关于民族学的材料，不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古希腊或其他地区，均有大量的文字记载和文物资料。但是，民族学正式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则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欧美等国家的许多学者为这一学科的创立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形成不同的学派。西方民族学著作首次传入我国，是1903年由北京大学堂书局出版的林纾、魏易合译的《民种学》一书。该书原作者为德国人哈伯兰，英人罗威译成英文为《Ethnology》（民族学），林纾等据英译本转译为中文，而称民种学。次年，蒋观云又译称“人种学”。在一段时间内，有关民族学的定义既不固定，也不统一。在我国，正式提出“民族学”这一概念并使之沿用至今的，是蔡元培。他于1926年12月在上海《一般》月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阐明“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偏于记录的，名为记录的民族学”；举各民族物质上行为上各种形态而比较他们的异同的，名为“比较民族学”。他详细考比了法文、德文、英文关于“民族学”这一名称的词义，并溯源到古希腊文的语义演变，说明自己提出民族学概念主要“是依傍德国语法”。其实，就广义而言，民族学属于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英美学者通常将民族学视为人类学，亦即相当于人类文化学和社会人类学。但在欧洲大陆，如德、法等国，习惯上将体质人类学称作人类学，而社会人类学则另有民族学（ethnologie）之称。蔡元培提出并确定民族学概念，显系源于德、法等国的学术传统。

在《说民族学》这篇文章中，他还着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有关民族学的资料，以证明这一学科在中国具有良好基础，并

非纯然的舶来品。他指出,《山海经》一书中有很多民族学的丰富记载,“例如《山经》,于每章末段,必记自某山以至某山,凡若干里,其神状怎样,其祠礼怎样,那都是记山间居民宗教的状况。”此外《史记》“匈奴”、“西南夷”等列传和后来史书中的这类部分,以及唐樊绰的《蛮书》、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元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明邝露的《赤雅》等书,都是记录民族学的专书。而《小戴记·王制篇》中则有颇为详明的比较民族学方面的记述。随后,蔡元培分别阐述了民族学与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在他看来,尽管西方学术界有以人类学包含民族学的倾向,但现今民族学注重于各民族文化的异同,头绪纷繁,决非人类学所能包容,实际上民族学久已脱离人类学而独立。这样,便使民族学在中国创立伊始,即与人类学脱钩,具有了独立学科的地位。在这篇文章中,蔡还初步论证了“民族的文化随时代而进步”的观点,认为民族学的研究颇可补中国史前史若干方面的阙如,从而显露出他与欧洲民族学中进化学派的某种学术渊源。

《说民族学》一文,是二十世纪初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以来,第一篇系统论述民族学的文章,它不仅确定了这门学科的名称和定义,还具体介绍了该学科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又用中国固有的文献资料进行演释,为这门新兴学科增大了可接受性。自《说民族学》发表之后,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在中国学林中得到了立足之地。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按照蔡元培的设想,拟议创设民族学研究所,但由于经费和研究力量的不足,改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内组建民族学组;蔡以院长身份兼任民族学组主任,并从事具体项目的研究。从中央研究院当年的文件记载中可知,蔡的研究课题为:1、各民族关于数之观念;2、结绳及最初书法之比较研究。在三十年代,年逾花甲的蔡元培在应付各类繁杂事务的

情况下，始终没有降低对于民族学的研究兴致。有文字可寻的，是他公开发表的两次演说词。一次是1930年5月，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会上所讲《社会学与民族学》。他概要论述了民族学对社会学的补助作用，指出，“我们要推到有史以前的状况，专靠考古学家的材料，是不能贯串的。我们完全要靠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状况，作为佐证；然后可以把最古的社会想象起来。”他进而例举母系氏族制度和图腾崇拜等民族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论证中国古代传说和历史，使人产生耳目一新之感，从而推动民族学的普及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另一次，于1934年12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所讲《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他讲道：“民族学上的进化问题是我平日最感兴趣的。……在民族学上，我觉得人类进化的公例，是由近及远的一条，即人类的目光和手段，都是由近处而逐渐及于远处的。”他从美术、交通、饮食、算术、币制、语言、文字、音乐、宗教八个方面阐发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说，就美术而言，“人类爱美的装饰，先表示于自己身上，然后及于所用的器物，再及于建筑，最后则进化为都市设计。”但他同时也指出“尚有不可忘记的一点，即此种进化的结果，并非以新物全代旧物，易言之，即旧物并不因新物产生而全归消灭。”蔡氏提出的这一“由近及远”的进化观点，被后来的民族学专家评赞为进化学说在民族学方面的“一个正确新解”，“此乃折衷历史派与进化派的学说，以补旧进化论之偏。”^①这两篇演说词分别发表在《社会学刊》第一卷第四期和《新社会科学季刊》1934年冬季号上，它们与《说民族学》一起，成为蔡元培民族学研究方面仅存的三篇文字。

但是，晚年蔡元培对于中国民族学的贡献远非仅止这些。他

^① 何联奎：《蔡子民先生对于民族学之贡献》，见《蔡元培先生全集》第152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

的关于民族学的思想更多地体现在他所领导的中研院民族学组的工作方面。从1928年民族学组建立到1934年该组归入历史语言所的六年间，他悉心指导，大力擘画，推动民族学组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蔡元培主张，民族学既是理论科学，也是应用科学，其研究工作既有学术性，又有实用特点，它与边疆地区的政治进步、教育普及和文化提高均有密切关系。研究民族学不应当一味地从现有典籍中搜讨间接的材料，而更应注重采撷大量生动的直接材料，即应当进行广泛的实地调查。在他的主持下，民族学组确定了工作项目，计有：广西凌云瑶人之调查及研究；台湾番族之调查和研究；浙闽畬民之调查；松花江下游赫哲民族之调查研究；海南岛黎人之调查；湘西一带苗瑶人之调查；西南民族之研究；亚洲人种分类之研究；标本图表之整理陈列等等。可以看出，其中实地调研占有较大比重。蔡亲自指定、安排研究人员赴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从1928年开始，民族学组的研究员颜复礼、凌纯声，编辑员商承祖，助理员林惠祥，以及芮逸夫、陶云逵等均曾分赴边陲内地实地考察，所撰调研报告则在中研院有关刊物上公开发表。这是国人第一次有组织地开展民族区域调查。为了集中展示民族学的标本和资料，蔡元培还着手筹建中华民族博物馆，他特意聘请时任汉堡民族博物院非洲部主任的但采尔协理此事，经多方努力，有关文物标本和图片初具规模，但终因经费不足，只在中研院内设立一民族学陈列室。

在我国，民族学毕竟还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但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五十年代，有关部门正式确认“民族学”为此一独立学科的统一称谓，从那时以来，该学科已有了喜人的发展。然而，人们不会忘记蔡元培在中国民族学的早期发展阶段所进行的“开辟草莱”的种种努力，没有他那代人的奠基性工作，中国民族学日后的发展和提高是不可想象的。

第7章 家庭、品格及交游

7.1 家庭生活

人物传记倘缺少传主个人生活的记述，那肯定是不完备的。从生活角度观察一个人的处世风格和人际关系，将会深化对其学识修养的认识和体悟，不论他是贤哲还是凡人。

如前所述，蔡元培生长于商人世家，他有同胞兄弟姐妹七人，两个姐姐均于二十岁前后亡故，四弟和幼妹均未成人即夭折，实际上，他仅有一兄一弟。蔡氏兄弟三人，只有蔡元培走了读书、办学和从政之路，其余二人则从事实业。其兄蔡元钐长期在上海崇实石印局供职，其弟蔡元坚则承继祖业，在家乡绍兴钱庄业工作。共同的家庭教养，使三兄弟之间充满怡怡之情。蔡元培长年在奔波，其事业和生活颇得兄弟的助力。早年，他在上海与张元济、杜亚泉等创办《外交报》，其兄元钐曾从多方面予以赞助。“苏报案”发生前后，元钐设法劝导元培避走青岛，并打探消息，确定行止，其作用十

分突出。蔡弟元坚在家乡料理具体事务，免除元培许多后顾之忧。如此休戚与共的手足关系，对蔡元培事业上的进展和高尚人品的养成不能说没有作用。然而，若论对蔡的事业具有较大直接帮助的，则是他的堂弟蔡元康（字谷青，国亲）。元培在上海开办爱国女校、草创光复会以及主持同盟会上海分会之时，元康跟随其兄，倾力相助。经元培介绍，元康列名光复会，加入同盟会，并回绍兴积极发展会员，扩充力量。“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职离京，避居西子湖畔，时任杭州中国银行行长的蔡元康，照拂其起居，并转递和代洽各方“挽蔡”的函电及代表。元康早年留学日本，与鲁迅、周作人二人过从颇密，蔡元培与周氏兄弟的最初接触，即由元康居间函介。蔡元培自述：“国亲比我小十四岁，甚有才干。我的运动革命，推行教育，得他的助力很多。曾在司法界服务，现已入金融界，前途甚有希望。”可是，1921年4月，蔡元培旅欧期间，元康以四十三岁的盛年暴病而亡，元培闻讯哀痛异常，惋惜不已。他曾先后在《西游日记》和《自写年谱》中详述此事，足见其哀思之甚。

蔡元培的婚姻生活谈不上平静，却又是幸运的。他曾先后两度丧妻，历经生活磨难，然而陆续走入他的生活之中的三位女性，尽管时代风貌、教育背景不尽相同，但在扶助他的事业、理解他的追求方面又无不表现出贤淑的特性。其间，蔡的男女平等主张得到了自然而充分的体现。

1889年4月，二十三岁的秀才蔡元培与长他一岁的会稽县姑娘王昭结婚。新娘的父亲王荣庭是绍兴城内一家典当铺的出纳，为人“坦白无城府”，乡里以长者目之。王有二女，长女嫁山阴县秀才、蔡的同窗薛炳，次女即王昭。蔡、王的婚姻即由薛炳介绍而成。婚后数月，蔡往杭州应恩科乡试，考中举人。在此后的四、五年间，蔡为求取功名，多年在外，居家时间甚短，直至1895年冬向翰林院请假一年，归里省亲，得与王夫人团聚。

1897年春，王夫人移居北京，与蔡元培寓居绳匠胡同。在京的近两年间，蔡氏夫妇不时与同年、乡友结伴出游，观赏古都名胜风景。王夫人持家谨严节俭、好洁成癖；同时性情淡泊，对丈夫连登科第泰然处之，居京华之中却不趋事权要。当戊戌政变后，蔡元培毅然弃官南归，举家就道，辛苦备尝之时，王夫人毫无怨言，随夫而返。在维新思潮兴起之前，蔡在夫妻关系上依旧抱有女子既嫁从夫的旧观念。后来，他接受新思想，将男女平权行诸家庭，对王夫人更加尊重，并开导她不再迷信鬼神，劝其解放自幼被缠的小脚。王夫人的观念也渐渐变得开通。蔡元培回到故乡后，投身教育和地方公益，不时奔走于杭州、临安、嘉善等地。他不曾想到，此时严重的肝病正耗损着王夫人的生命，到1900年6月，终于一病不起，撒手而去，时年三十五岁。人亡室空，王夫人留给他的，是那两个还不省事的幼子：阿根和无忌。中年丧偶这一人生之大不幸降临到蔡元培身上。从他所撰《祭文》和挽联中不难看出其深深的哀思。挽联内云：“早知君病人膏肓，当屏绝万缘，常相厮守，已矣，如宾十年，竟忘情乃尔耶？”王夫人病故一周年的祭日，蔡重新抄录这些挽联，以寄托对亡妻的怀念之情。

许多乡人和朋友关心蔡元培的续娶，纷纷上门说媒。蔡提出五项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这些条件一经提出，媒人所荐者几乎无一合格，尤其是后两项，在那时的人们看来，显得悖乎常情，颇有些惊世骇俗。因此，人们闻而却步，蔡亦许久没有寻得合适的人选。后来，有位姓林的朋友告诉他说：江西都昌的黄尔轩先生携眷寓居杭州，黄的次女便不天足，且善长书画，不妨托人探询一下。事有凑巧，不久，蔡与童亦韩为筹办学校前往临安，路经余杭，天色已晚，遂到童相识的该县厘局局长叶祖芾府上投宿。叶热情款待，并出

示所存字画请来客观览。其中的一张直幅扇页，所画工笔仕女精巧细腻，落款字迹亦十分端秀，款署黄世振。主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同乡黄尔轩之女，她自幼得父亲钟爱，不曾缠足，且自学绘画，技艺不俗，经常卖画以维持家计，尤其讲求孝道，称得上是“贤能之女”。蔡闻听，当即表示倾慕之意，请叶祖芾从中玉成。叶则慨然以媒介自任，不出一个月，蔡即与黄女士订婚。1902年的元旦，二人在杭州举行了婚礼。这是一个形式奇特、新旧参半的婚礼：一幅绣着“孔子”两个大字的红色幛子取代了浙江婚俗中必须悬挂的福祿寿三星画像，但新婚夫妇却仍依旧习，同行三跪九叩头礼，而历来的闹洞房惯例，却变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演说会。杭州学界人士宋恕、汪希、孙翼中、陈介石、叶景范等前来贺喜并发表即席演说。蔡元培在开场白中说：“夫妇之道，极正大，极重要，无可引以为羞涩，并无可援以为谐谑之理。而近世东南诸省，盛行闹房之俗，务以诡侧谑浪为宗，实不可解。然天下极谬误事，其中必有真理，此为哲学家名言。窃意古者女子于归，诸母有警戒之词；初到夫家，舅、姑及戚族来者，亦必有以教之。《颜氏家训》所谓教妇初来，此其义也。流传讹变，乃至如近日闹房者之所为。吾意欲改今复古，既承诸君不弃惠临，敬乞各以意赐教，当铭之神龕，永为矜式。”^①

看来蔡元培的标新，其意在“复古”，是要表明“极正大”的夫妇之道。在这个别开生面的演说会上，浙江名流陈介石引经据典，证明男女平等的观念，而另一著名学人宋恕则不无调侃地论证男女平等之不可能，他说：“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自应以师礼事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在此喜庆场合，对来宾

^① 蔡元培：《杂记》手稿，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的家世与家庭生活》，见《晋阳学刊》1986年第一期。

的发言本不必认真，但它多少也反映出本世纪初中国知识界价值转换过程中的观念差异。蔡元培在致答词中表明自己的看法说：

“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不妨说，人格平等是蔡男女平等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不论是在后来的社会实践抑或家庭生活中，他基本上依此行事。蔡、黄的婚礼，在当时堪称文明结婚的一个尝试，这固然与当事人的个性有关，但也显露了那个时代士林风气的某一侧面。

黄夫人，名世振，字浣芴，号仲玉。她与蔡元培共同生活了二十年，在蔡从事反清革命、留学德国、民国元年入阁参政，以及后来旅居海外、回国出长北京大学这一系列重要活动中，始终作为一个贤内助，含辛茹苦，在精神和实际生活中支持丈夫的事业。尤其是在创办上海爱国女学过程中，她发挥了非常直接的作用。蔡、黄婚后，携阿根、无忌二子同往上海，寓居新马路登贤里。随着社会风气的开通，女学日显重要。为倡行女子教育，当时同在上海的林少泉（白水）夫妇及其妹宗素，吴彦复及其女亚男、弱男，陈范及其女撝芬，韦增珮、韦增瑛姐妹，以及经莲珊等数人在蔡宅商议办学之事，蔡与黄夫人出面接待。其后，蒋智由又托请黄夫人召集薛锦琴、陈撝芬、夏小正等人再次协商兴学事宜。经过几次聚谈，大家决定开办爱国女学。最初由蒋智由任校长，后由蔡元培接任。这期间，黄夫人在女学中担任主要教员，成为爱国女学创办初期的骨干。

从1907年以后的四、五年间，蔡元培只身赴德留学，黄夫人则带子女回绍兴老家居住，这时他们已有了一双儿女：女儿威廉，儿子柏龄。辛亥革命以后，蔡回国即忙于政务，直到辞去北京政府的职务后才得以合家团聚。此后四年，蔡挈妇将雏，远走德、法，夫妇二人在海外渡过了一段相对平静而愉悦的生活。自1917年始，蔡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举家迁居北京东城。从此，蔡元培悉心改革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其操劳

与繁忙自不必说。黄夫人是一位受中国传统妇德教育很深的女性，她比蔡小八、九岁，却仰慕古代烈女，抱定为丈夫献身的决心。不论蔡元培进行秘密反清活动如何危险，也不论他在军阀势力的重压下苦撑教育文化残局怎样艰难，她都全身心地支持丈夫的事业和活动，全力担负起操持家务、教育子女的重任。同时，她同样不慕奢华，虽曾身居柏林、巴黎、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却丝毫不染上层社会妇女的靡丽风习。蔡曾回忆道：黄夫人“对于北京妇女以酒食赌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以聩声气而因缘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与往来。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1920年冬，蔡元培将赴欧美考察教育，远行在即，黄夫人此时却病体沉重，延请法国医生诊治，病势好转。蔡怀着忧虑的心情踏上旅途。不料，黄夫人病情急剧恶化，于1921年元旦去世。九天之后，蔡在日内瓦得到噩耗，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到：“……我心甚痛，写祭亡妻仲玉文一首。今日此地举行葬青年军人病故者之典礼，有飞机游行湖面及空际，军乐队等在我窗前往还，观者如堵。人生无常，益令我悲念仲玉。”再度丧妻的打击，对于年已五十五岁的蔡元培来说无疑是沉重的，难怪他触景生情，哀叹这多舛的人生！时隔二十年，他又一次为亡妻撰写祭文，这内中的痛楚该不难想象。其祭文有云：“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决不敢信；死者果无知耶？我今日为汝而不敢信；我今日惟有认汝有知，而与汝作此最后之通讯，以稍稍纾我之悲悔耳！呜呼，仲玉！”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病故的妻子的挚诚哀思。该文后来曾被选为全国通用中学教科书的国文教材。

黄夫人去世后，蔡元培深藏内心创痛，依旧忙于北京大学的各项事务，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两年过去了，他的家庭状况使其不得不又一次续娶。其择偶条件为：（一）原有相当认识；（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可为助手者。此时，蔡想起了当年爱国女学的一位学生周怒清。这位辛亥革命前反清意识强烈的女学生，后来又在承志、启明等几所学校学习，毕业后服务社会多年，抱持独身主义，素有出国深造的志愿。其时，已更名为周峻（字养浩）。1923年1月，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离京赴沪，准备再次出国。他托请好友徐珂及夫人何墨君与周女士洽商。徐夫人是当年爱国女学的舍监，与周女士颇为契合，由她说项，蔡、周二人很快即于5月间在上海订婚。7月10日，他们在苏州留园举行了婚礼，随后，便携同子女一起旅居海外。在驶往欧洲的轮船上，蔡写下《题留园偈照》一诗：“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蝶泳鸬飞常互助，相期各自有千秋。”显然，在屡经生活磨难之后，已近晚年的蔡元培为有这样一位学友和伴侣而倍觉欣慰。

在欧洲的二年半时间里，蔡氏夫妇先后旅居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蔡除了写作、研究之外，还从事大量社会活动。周夫人则先后入布鲁塞尔美术学校和巴黎美术专科学校，攻习绘画。同时，她还以相当的精力陪同丈夫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并协助他在英国朝野进行退还庚子赔款的一系列活动。她曾有意将蔡元培在欧洲各地所作的演说词加以整理编次，辑为《蔡子民在欧洲讲演集》，并已编定了目次。可以说，作为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蔡夫人对蔡的辅助作用是较为广泛的。1924年冬，蔡氏夫妇共同进入汉堡大学，从事研究和深造，直至1926年初回国。

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之后，蔡元培历任要职，周夫人亦时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尤其是在全国或地方性美术展览的作品评选和募捐筹建杭州国立艺术院、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活动中颇

为活跃。这时，虽然她已有了睟盎、怀新、英多三个子女，家务缠身，但始终没有放下画笔，同时她还喜作诗词。这就使晚年蔡元培的家庭生活平添许多雅趣，常常是周夫人作画，蔡元培题咏，每逢生辰节日，夫妻间你唱我和，作诗相贺，偶或小别，亦每每以诗代札，互道珍重。

人生一世，遭逢不幸，实所难免。然而，在可能的限度内，把握际遇，改变命运，以放达和明智，善待自己及他人，失衡的天秤总会平复，幸运之神便将降临。这或许是蔡元培波折而又平凡的家庭生活给予人们的有益启示。

7.2 人品及交游

论及蔡元培的人品，评论界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他是中国传统道德在近代条件下的典范，他得到了一代人发自深心的人格敬仰。这一评价，在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圈内尤为突出。港台学者金耀基即指出：“在新旧中西价值冲突，是非复杂的十九世纪中叶与二十世纪初叶，这段时期中，蔡先生可说是最少争议性的人物，也是最普遍受敬仰的人物，崇扬他的文字何止千百万言，但他名扬天下，而谤则未随之，这不能不说是二十世纪中国伟人中的极少数例外之一。”^①

在蔡元培身上，有着学者的风度、君子的雅量和“好好先生”的恬淡平易。平素，蔡总是一袭长衫，凝重而和善的表情，迂缓而沉毅的举止，略带绍兴官话的声音，语调不高，却透出清朗和睿智。许多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对其风采留有深刻印象。柳亚子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张一磨则写道：“宋人谓：见程明道如坐春风中，”与蔡先生交往，

^① 转引自黄肇珩：《一代人师——蔡元培传》第218—219页，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

“殆有此风象”。^①当年曾是北大学子的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也回忆道：在蔡先生身边，感同风光霁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象，沐浴这种气象之中，就不能不为他的人格所感化。人们的记述如此相象，说明蔡氏确乎具有某种非常人可比的性格魅力。任鸿隽认为，“他这样谦让和蔼，温良恭俭，纯是发乎自然，而不是要拿这些道德来引起人家好印象、好感想。”^②发乎自然，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他长期“读书养气”所达到的一种境界。蔡一生倾心向学，早年濡染于理学的心性之说，崇拜宋儒，中年以后更以极大毅力求索西学新知，其勤敏之状于下例可知：蔡在南洋公学任教期间，曾跟从马相伯学习拉丁文，马好意相劝说，拉丁文在西洋已成古董，中国学者实在无学习之必要。蔡则执意要学，他认为，拉丁文乃欧洲各国语文之本，不通晓拉丁文，便无从探知西洋古代文化。马相伯无奈，答应教他。从南洋公学到马的寓所要走四、五里路，蔡每早步行坚持学习，有时时辰尚早，马还未起身，蔡便耐心等候。这样的笃志好学使马相伯深有感触，遂决定招徒传授，后来就在此基础上创办了震旦学院。人们常说，蔡元培一身而兼有东西方两大文化之长：“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他对西方理性精神的执着追求和对中国读书人刻意修身养性传统的诚心恪守，是造就了其高尚人格的基本因素。

蔡的许多朋友和学生用“无所不容”来说明他兼容并包思想和仁人君子的雅量。在人事纷繁的社会活动中，蔡元培恬淡为怀，胸襟阔达。“五四”前夕，他与林纾论战，林用刻毒的语言攻击新文化，诋毁北京大学和蔡本人，甚至写影射小说，对蔡进行人身攻击。而蔡在答复林的公开信中，平情论理，丝毫不假辞

① 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125、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②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色。两相比较，其境界之高低不言自明。围绕《石头记索隐》，蔡元培曾与胡适展开学术争论，这是一场“君子之争”，但年少气盛的胡适对包括蔡著《索隐》在内的旧红学放言贬损，谓为“猜笨谜”、“大笨伯”，词气颇为尖刻。蔡不同意胡的观点，撰文反驳，但仅仅申述己意，未尝有为此作气之意。蔡作为晚清翰林，在书法方面却不甚讲求，这使得一些学界后辈疑惑不解；在素重楷法的科举殿试中，蔡先生何以高中金榜？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宴会上，率直的钱玄同几杯酒落肚，忽然向蔡校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问：“你的字写得这样蹩脚，为什么可以点中翰林？”此话出口，席间同人顿感此举未免太使校长难堪。岂料，蔡不以为忤，反而笑答道：“因为那年主考官最喜欢黄庭坚的字，我少年时刚巧学过黄体，所以能中试。”本来可能出现的尴尬场面竟在不经意的舒言缓语之中化解了，蔡氏的性格和涵养于此可见一斑。在多数情况下，蔡元培对于有事前来求助的人差不多有求必应。北伐战争后不久，陈调元任安徽省主席，不少北大的学生托请老校长函介他们到皖省任职，蔡几乎来者不拒。最初，陈尚设法安置，后来见蔡的介绍函太多，便搁置不复。这位在南京政府中任要职的党国元老却亦淡然处之，不以为意。蒋梦麟回忆说：蔡先生“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①处世恬淡，待人平易，非有超脱的气质和博爱的心怀，是不易做到的。

大概因为这平易淡然，蔡元培作为“好好先生”的形象不知不觉中增大了。有人以为他接物待人“太滥”，有人觉得他临事无可无不可，有人甚至说他参政理事易受别人影响和操纵等等。但是，与蔡过从较密、了解深入者却大不以为然，他们揭示了蔡个性中的另一侧面。林语堂记述说：蔡先生“待人总是谦和温

^①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76页；中华书局1984年。

恭，但是同时使你觉得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他的是非心极明。”蔡的学生罗家伦也说：“大家只看见先生谦冲和蔼的方面，而少知道先生坚毅不拔、风骨磷峋的方面。”傅斯年则进一步指出：“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他真正做到了“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①他们的记述和辨白，告诉人们，蔡“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这一特性，较集中地展现于他主持北京大学那段时期。北京大学实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新文化运动迅速扩展，社会上守旧势力与军阀政客集团联手，攻击诋毁北大和蔡的办学方向，一时间“黑云压城”。曾经为蔡改革北大出谋划策的汤尔和等人转而力劝他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以缓和外界压力。蔡长时间沉默着，听着汤等人的劝解之言，最后他站起身绝然说道：“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他后来与林纾公开论争，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痛斥军阀，在在表现了“临大节凛然不可犯”的风骨。

“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倘没有蔡的如此“担当”，恐怕早为守旧势力和安福系摧垮也未可知。1921年，蔡在美国考察教育，刚到绮色佳，便闻听一位新放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要宴请他，请他介绍北京的权贵。非其所愿，决不苟且敷衍，蔡下车伊始，坐犹未定，便坚决离开了此地，终于不给美国公使和中国官僚作桥梁。这便是他“是非心极明”的一面。有人概论他的这种性格为“内和外介，守正不阿”，确是颇为恰切的。

无论是从事教育还是参与政治，蔡元培始终不失书生本色。人们注意到，蔡一生中的辞职次数非常之多，其中引动社会反响的“辞职事件”就有数起。显然，蔡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引

^① 分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129、84、81页。中华书局1984年。

去”的自由信条，合与不合的尺度则是他所信守的价值观，至于高官厚禄则并不足惜。每次辞职“下野”后，他便重操旧业，以老学生身份向欧洲的大学注册，入学，进行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他自述“一生难进易退；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正是其书生本色的最好体现。在蔡元培看来，学人参政，应力谋为公众做事，而不可以权谋私。他鄙薄那些利欲熏心的官吏，虽曾置身官场，却清廉奉公，洁身自好。每当见到那些做大官的人购田置产，常不胜叹息，以为与其留给子孙金钱华屋良田，莫如策励晚辈求得真才实学，在人世间有所作为。本此观念，他一生两袖清风，生活俭朴，直至晚年仍赁屋居住，以至引来他的学生和朋友“赠屋祝寿”的那段佳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蔡元培高度自律的一生，颇有几分殉道色彩，为了他认定的人生价值，几十年如一日，毫不苟且。周作人说他是“古道可风”的君子，冯友兰认为，蔡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胡适也曾指出：

“蔡先生虽不信孔教是宗教，但他受孔教的影响甚深，是不可讳的。”^①显然，他们赞颂蔡的完美人格，并将这一人格主要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养育。确实，蔡元培自幼生长在“立品定须成白璧，读书何止到青云”的儒家思想占主导的文化环境中，他饱读经史，砥励品行，对孔夫子的学说体系深得要领，虽然接触西方文化后价值观念有所丰富，但浸入身心的儒家风范业已定型，难以改变。蔡生平注重道德教育，其编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和《华工学校讲义》的“德育”篇中，孔孟思想成份极为丰富，即令西洋道德精粹亦必以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诠释之，比附之。不妨说，蔡元培的高洁人品就本质而言确

① 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蔡子民”一节；冯友兰《跋蔡元培自写年谱》、《群言》1987年第7期；胡适《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见《蔡元培先生全集》第1429页。

是儒家道德传统的近代化身。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士人阶层开始向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变，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经过辛亥革命的政治变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终于应运而生，其主干是从欧美和日本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这是时代性格判然有别的两代人。十分有趣的是，蔡元培本属康、梁一辈人，却成为五四时期领袖群伦的人物，他从戊戌年间的文化背景上顽强地跨上“五四”的时代高度，从而成为联结两代中国文化人的特殊代表。正因如此，蔡元培的个人交游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色彩。

在中国知识界，蔡元培的交游范围相当广泛，举凡在清末民初有影响的文化人差不多均与他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就蔡个人而言，三十岁之前，其交游对象主要是同窗乡友和科举同年；到中国教育会时期，开始结识大量新式人物，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即以这批人为基干；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得以与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欧美派）建立起广泛的人际信任，三十年代，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即是以上述信任关系的延续为基础。

以下仅就蔡元培与主要学术文化人物的交往略作论列：

在旧学时代，李慈铭（别号越缦）曾是青年蔡元培倍加推崇的人物。这一方面是由于李的才学和文名，另一方面则因李是蔡的同乡前辈。蔡第一次赴京赶考，便拜访了在都察院做御史的越缦先生。显然，李对这位后辈晚生颇为器重，其《郇学斋日记》中即有关于蔡的一些记载。蔡任职翰林院以后，二人的交往颇密，李在世的最后半年，聘请蔡为李氏嗣子的家庭教师，并兼为年逾花甲的越缦先生处理文牍，蔡即客居李寓，直至李病逝。在蔡元培看来，李慈铭是晚清文坛的押阵人物，他后来为《鲁迅全集》作序称：“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因此，在李氏日

记的整理刊印方面，蔡鼎力促成，付出极大精力。继 1920 年《越缦堂日记》影印之后，他又依照李氏的生前意愿，准备将 1854—1863 年十余册日记节录出版。后来接受钱玄同的建议，仍以影印方式全文出版，是为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印行的《越缦堂日记补》。为了避免李慈铭日记原件的佚散，蔡特意致函中央图书馆筹备处长蒋复璁，建议该馆收购李氏日记手稿，“冀得垂诸永久。”对于李慈铭，不论是于公于私，蔡尽到了一个后辈学人的责任，由此，亦可窥知蔡元培与中国传统学脉的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在蔡的朋辈中，交谊最深历时最久的，当属张元济。蔡元培的译著几乎无例外地由张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几度旅欧，张均以商务的名义大力匡助。二人在建设中国的新教育新文化方面有着高度的默契，彼此对学术问题、社会政治和个人言动方面均能洞开心扉，互诉衷肠，并相互助益。蔡、张二人是浙江同乡，早年都受到浙东学派的影响，在科举生涯中，二人一同考中举人、进士，又一同成为翰林院庶吉士，有着极深的同年关系。此后，二人一在翰林院，一在总理衙门，时相往来，交谊渐深。戊戌年间，张投身变法，与康有为同受光绪帝召见，后协办创建京师大学堂，西太后发动政变后，受以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这段时间，蔡虽不甚活跃，但对维新变法内心十分赞同，变法失败，大失所望，遂弃官归里。二人的这种相同社会经历，使他们两年后在上海南洋公学再度聚首成为同事时，都抱定了从教育文化入手启迪民智改造社会的信念，进而一起创办《外交报》、先后投身商务印书馆、编订新式教科书。“五四”时期，蔡、张一北一南，分别主持中国的最高学府和最大的出版机构，由于他们的交谊，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建立起密切合作，《北京大学月刊》和“北京大学丛书”均交由商务印行。张还曾亲临北大，与蔡及各科教授商讨出版讲义和著作等事宜。“五四”以后，商务

印书馆大力革新，主要也是由于北大的推动，并借助其力量。南京政府时期，蔡、张均进入暮年，但在事业上仍彼此协助。蔡在大学院召集全国教育会议，张有感于西洋色情电影流行、性学书籍泛滥，写信予蔡，建议重视此一现象对青年的危害，设法禁止。三十年代，张热衷影印大宗古籍，蔡多方提供便利。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蒙受损失，张积多年心血营建的东方图书馆化为废墟，蔡与各界人士力谋复兴商务的这一资料库，并多方为之求购藏书。1934年春，蔡被商务股东会选为董事，他自述：“我本非该馆股东，菊生以所有股分十股置我名下，我遂有被选为董事之资格，事前并未告我也。”^①教育学术与文化出版是社会发展的连带机制，蔡、张的交谊与协作，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可谓助益非浅。

蔡元培与吴稚晖和章太炎二人一齐共事是在爱国学社。从现有材料给人的印象推测，吴在政治上对蔡有相当影响，他们之间在思想和学术倾向上具有较多共同点。蔡留学德国期间，与同在欧洲的吴书信往来，从国内人事变迁到个人求学心得，几乎无所不谈，显示出相互间的契合关系。辛亥革命以后，蔡、吴作为同盟会和国民党的资深成员，有着完全相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他们在二次革命中共同创办《公论》杂志，撰文抨击袁世凯，随后，又分别携眷同赴欧洲。在从事海外华人教育方面，二人的合作记录也是颇为可观的。蔡出长北大后，一再邀吴来校任教，并有意请其分任校政，可能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吴与汪精卫一样，没有到北大任职。1927年的“清党”，蔡、吴二人又一次站到一起，当然，吴的表现要激烈得多。在国民党的所谓“四老”中，这两个人均属亦学亦政式的人物，均保持了不同程度的书生特

^① 蔡元培《杂记》手稿，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与张元济》，《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

色，在民国时期的学术文化界同具影响。后来，吴写过不少纪念蔡的文章，以其特有的表达方式，高度称许这位老友，可以肯定地讲，在蔡的交游中，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比起吴稚晖，蔡与章太炎之交谊要疏淡得多。吴、章素来不睦，在“苏报案”的所谓“吴向清吏告密”这桩公案中，二人更是打了多年笔墨官司。在此问题上，蔡明显地为吴抱不平。但蔡、章之间亦有一些交往可记。章在“苏报案”后身陷囹圄，蔡定期前去探望，章出狱，亦由蔡安排送往日本。二人同为光复会骨干，蔡为该会前期会长，章则任后期会长，在反清革命中二人一致，但在光复会分立问题上二人又有明显分歧。总的来说，蔡、章二人思想学术旨趣大有距离，虽有不少共同经历，却难有深交。1913年6月，章在上海与汤国梨结婚，证婚人即蔡元培。太炎性格狂傲，常常目无余子，肯请蔡为之证婚，说明他对蔡的人品是敬重的。而蔡对章的学术成就充分肯定，他主持下的北大，国文系颇有太炎弟子云集之势，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蔡尤其高度评价章的学术活动。1920年深秋，蔡元培、章太炎和吴稚晖一起在长沙岳麓山瞻仰了黄兴墓和蔡锷墓，这是三位近代学人一次极有意义的聚首。

梁启超与蔡元培是己丑乡试同年，这在旧时是颇可援引的一层关系。可是戊戌年间，尽管康、梁炙手可热，蔡在京中又倾向维新，却耻相依附，不曾纳交。二十年后，即1917年，在北京外交后援会为中国对德宣战而举行的演说会上，蔡、梁始结识。翌年底，梁赴欧洲考察，行前，蔡托请他向各国宣传退还庚子赔款以兴办教育的主张。此后，梁离开政界，转而从事学术活动，曾多次到北大作学术讲演，梁的密友蒋百里还应聘在北大任教。1920年冬，蔡将赴欧美考察教育，梁亦委托蔡到德、法等国后敦促倭铿、柏格森二位哲学家依照前此梁游欧时相互间的约定，早日来华讲学。为此，蔡在欧洲与张君勱、林宰平等曾努力接

洽、奔走。1922年夏，蔡得知爱因斯坦将来华讲学，便利用同在济南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之机，与梁相商，梁答应其“讲学社”承担部分费用。总之，蔡任北大校长期间，与梁有一定的交往。他们在“五四”以后，不仅在学术文化方面进行一些合作，而且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亦不乏共同点。当时有人曾提议组建一个欧美派知识分子的政党，推梁启超、蔡元培为党魁。不过，蔡、梁各自有国民党和研究系的政治背景，彼此思想主张不尽一致，组党之议仅说说而已。梁氏民国以后沉浮于政海，屡屡失意，后来转而从事讲学，成就斐然，他的这种选择与蔡办北大开创的风气不无关联。蔡对梁生平传扬新学的功绩十分看重，梁去世以后，蔡与蒋梦麟向国民党政治会议提出议案，请政府对梁氏明令褒扬，但因胡汉民的反对而未获通过。四十年代，梁漱溟在一篇文章中对蔡、梁二人曾有所论列，其中写到：“蔡、梁两先生比较，……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梁漱溟还认为：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梁在空间上大过蔡，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①梁漱溟与蔡元培和梁启超均有相当的交往，他的评说不无启发性。

郭沫若在他的《历史人物》中曾写到：“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病歿，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确实，在“五四”时期涌现出的文化新人中，蔡元培对鲁迅的评价最高。蔡为《鲁迅全集》所写序言中称：“他的感想之

^①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39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地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显然，鲁迅的才华使蔡深为折服，故而以“新文学开山”目之。蔡与鲁迅，是绍兴同乡，辛亥革命前即已互通声气。民国元年，经许寿裳推荐，蔡将鲁迅延揽入教育部，二人在美育及社会教育问题上思想颇为接近。不过，他们共事仅数月，年龄和地位又有距离，深入的交往还谈不上。1917年以后的六年间，蔡与鲁迅同在北京，时相过从。当时鲁迅搜辑汉碑图案拓本，蔡对此深感兴趣，这样，传览和欣赏这些拓本成为二人交往的重要内容。同时，蔡还请鲁迅为北大设计了校徽图案。随着《狂人日记》等小说的发表，鲁迅跃上了白话新文学的顶巅。1920年始，蔡聘请鲁迅到北大兼课，讲授《中国小说史》。以后，蔡任大学院长，特聘鲁迅为“特约著作员”，月薪三百元，为时四年。这对于鲁迅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蔡和鲁迅共同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使二人的交谊明显深化了。其间，蔡书赠鲁迅的两首七绝诗，表达出对“九·一八”事变以后“大敌当前暗不声”状态的内心愤闷，说明二人在此类问题上抱有同感。鲁迅逝世后蔡撰写《记鲁迅先生轶事》等纪念文章，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长，大力促成《鲁迅全集》的编印，确实尽到了他对鲁迅“没世不渝的友谊”。由于鲁迅的关系，蔡与周作人、周建人也有交往，周作人到北大任教，周建人第二次供职商务印书馆，均得力于蔡的帮助。

在晚辈学者中，蔡元培与胡适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不仅是由于胡具有卓越的治学才能，深得蔡器重，还因为他们拥有完全相同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几乎一致的教育主张。同时，二人在性情和处世方面亦相当接近。从1917年胡适应聘进北大，蔡元培便对这位长年接受西洋教育，却同样精熟“汉学”功夫的留学生刮目相看，尤其对他改革中国旧文学的主张颇为赞同。在

《新青年》阵营中，胡较之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显得温和稳健，许多人赞赏他那“不持极端，态度和缓”的“纯粹学者的态度”。蔡当然亦有同感。胡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出版，蔡欣然作序，极尽推崇，为胡确立学术地位扫清了道路。“五四”以后，蔡办北大，愈加倚重于胡，胡一度出任教务长，成为蔡的重要助手。而胡亦十分敬重蔡，从这时期胡的日记中可知，他将这位前辈视为师长和知己。1921年，胡适与丁文江、任鸿隽等一批欧美派知识分子组织“努力会”，致力于社会的改良，特邀蔡元培加入。起初，丁文江尚有顾虑，觉得该团体的成员都是同辈，邀蔡这样一位前辈加入，“恐怕反有一种拘束”。但经任鸿隽等人解释，丁很快便打消顾虑，认识到“蔡先生不比他人”，不会有何妨碍。后来，胡适在给陶孟和等人的信中也谈到：“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它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在这个大事业里，《努力》的一班老朋友自然都要加入，我们还应当邀请那些年老而精神不老的前辈，如蔡子民先生，一齐加入。”^①显而易见，胡是将蔡引为同道的。因此，胡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蔡领衔发表，在社会上形成反响，研究系的林长民就曾极力劝说蔡、胡“出来组织一个政党。”1927年以后，尽管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一度相抵触，但蔡元培还是聘请胡任大学院的大学委员会委员，蔡还以董事长身份支持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及其后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三十年代，他们二人同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董事，在扶助文化科学事业方面密切合作，交谊弥深。

蔡元培与胡适的交谊，可以看作是蔡与欧美派知识分子非同寻常的关系的一个缩影。蔡在文化背景上本属于康梁一代人，却

^①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54、217页。

能与后起的欧美派知识分子建立特殊关系，由此可以看到他在文化上的两代人之间所发挥的连接作用，这也正是他能在近代文化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人际原因。

第8章 最后的岁月及其他

8.1 长眠香港

白 杨杏佛遇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迫停止活动以后，蔡元培的社会性政治活动明显沉寂下来。随着年老体衰，他试图从繁杂的事务牵扰中摆脱出来，静心做点自己的事情。1935年7月，他印发了一个启事，宣布从8月起，辞去一切兼职，停止接受信件，停止介绍职业。其中所辞兼职多达二十三个，主要是些教育文化机关的名誉职务。也正是在此前后，蔡元培写了一些回忆性文章，如《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我在教育界的经验》等，开始对自己的生平经历作文字追述。或许是接受了胡适的劝说，蔡果真准备撰写个人的传记——《自写年谱》。劳瘁了几十年的蔡元培，真的步入了晚境。

1936年1月11日，蔡元培在最寒冷的季节里迎来了自己七十岁的生日。家人置办的小型寿宴亲

情融融自不必说，文化教育界的朋友和学生没有忘记利用这一机会来表达对这位忠厚长者的由衷敬意，却使他感奋不已。在中国科学社为他举行的庆寿会上，马君武代表该社理事会致祝词说：“人生七十以后，实为最好的服务时期，……希望蔡先生在七十岁以后，领导全国科学家，本着苦干精神，为国奋斗”。蔡元培在答词中多少有些调侃地借用孔子七十岁时的生命自述来观照自己的人生历程，其中广征博引、雅趣横生。他说：“人生在世，一百二十岁为上寿，一百岁为中寿，八十岁才称下寿。只有社会的寿最长，可以祝万岁。中国科学社到现在虽只有二十多年的年龄，但外国学会在百年以上者很多，法兰西学院已到三百年，故学会也是万寿无疆的。今以长寿的团体来祝个人，真是荣幸。”于幽默中透出哲人的旷达。不久，画家刘海粟和钱新之、张寿镛等在上海国际饭店发起举行盛大活动，庆祝蔡元培七旬寿辰。在刘海粟看来，先前的庆寿场面太小，太冷清，“同蔡先生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太不相称了”，因此“决计要大庆一番”。^①前来祝寿的多达千人，其中颇多知名人士，计有：沈均儒、沈恩孚、黄炎培、陈树人、马寅初、许寿裳、于右任、梅兰芳、李金发、林风眠、林语堂、朱屺瞻、顾树森、朱孔阳、叶恭绰、张学良、雷震、王济远、谢海燕、黄自、肖友梅、王昆仑、俞剑华、李四光、丁西林等。其中既有政界要人，又有金融界巨头，更多的是文化教育科学界人士。蔡元培不愿如此张扬，曾极力推辞，但又拗不过众人的盛意，遂欣然到会。面对为他举行的盛大庆寿场面，这位生性恬淡的学界巨子内心欢愉而又感触万端。在答词中，他不无激动地表示：

“鄙人是一个拿笔杆的人，所敢夸口的也只能在笔杆上多尽点力。‘假我数年’，鄙人想把刘（海粟）先生寿文中道及的

^① 刘海粟《忆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217页。

‘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著一本书；还想编一本美学，编一本比较民族学，编一本‘乌托邦’；胡适之先生常常劝鄙人写自传，如时间允许，鄙人也想写一本。愿心许得太多了，不敢再说下去了……”。^①

祝大寿而许宏愿，本是一种习俗或惯例，但反映的则是人的内心企望和追求。蔡的这席话，除了那本“乌托邦”令人不解其意之外，其余各项差不多都是他生平治学的主要兴趣所在。显然，这些愿望萦绕心中多年，至古稀尚未实现，抱憾之心应所难免。惟其如此，他才申明这些宿愿，借以回复朋辈的热望，实在也是一种自励心理。蔡一生奔走国事，投身文化教育的组织领导工作，在国内几乎很少有充裕时间静心从事著述。然而，对中西学术长期求索而形成的独立见解积蕴于心，不发不快；中国文人又素有著书立说，“立言”传世的职业传统。人人晚境，回首往昔，世事纷扰；以有生之年力求补偿，该是一种进取的情愫。他在前述“辞去一切兼职”的启示中即表白道：“以元培之年龄及能力，聚精汇神，专治一事，犹恐不免陨越，若再散漫应付，必将一事无成。”看来，晚年蔡元培确实想摆脱尘嚣，专心著述，完成未竟之业。从是年2月始，他开始撰写《自写年谱》。

可是，这年冬天，蔡元培患了一场大病，几乎一病不起。只是由于诊治得当，调养有方，才终于转危为安。然而从此，这位老人病魔缠身，精力大减。半年之后，他才稍稍恢复一些工作，参加在南京召开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三次年会，并撰写了《记宗仰上人轶事》、《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等有数几篇文字。1937年6月，蒋介石致电蔡，电云：“本年暑期庐山训练，甚望先生莅临训导。”蔡复电称：“培大病后，尚需调养，近日亦曾发

①《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19页，中华书局1989年。

热，一时未克启行。拟于七月中旬再定行止。”^①此时，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全民一致抗战已成大势，国共两党尚且再度合作，蔡对党内当权者的怨艾似亦不会全然不变。不过，病体孱弱，心有余力不支，应是基本的事实。因此，抗日战火燃起后，蔡除了以其名望呼吁世人谴责日寇外，不可能有更多作为。同年11月底，蔡元培由丁西林等人陪同离开上海，到达香港，一个月以后，周夫人亦携带儿女抵港。蔡一家人先借住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宿舍，主要由王云五照料，其后租定九龙柯士甸道156号居住。蔡移居港九，显然是为避难养病。香港沦陷之前，曾是国内人士奔赴西南内地或放洋出国的海路中转，蔡居此调养，使今后的行止具有较大灵活性。

此后的两年，蔡元培化名周子余隐居港九。他深居简出，静心养病，绝少公开活动。唯一分其心力者，是中央研究院的战时运作问题。1938年2月下旬，他在香港酒店主持了中研院院务会议，总干事朱家骅和各所所长均抵港与会，会议议决了七项议案。此时，中研院的各研究机构已迁到重庆、昆明等地，在极其困难的战时条件下，尽力维持科研工作。不久，因朱家骅“为党国要务所羁绊”，无法履行总干事职责，代行此职的傅斯年又提出坚辞。蔡在香港与已到内地的朱、傅及王世杰等人频致函电，磋商办法，最后终于推定任鸿隽继任总干事一职，以保证中研院的日常转运。据载：张静江经香港赴美国，邀请蔡元培同行。蔡当面辞谢了这位老友的好意，其理由是：“以身负中央研究院职责，文化学术工作，关系国家百年大计，未可一日停顿，实不能远离”。^②从蔡居港的日记中亦可知，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始

^① 《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183—184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余天民《蔡先师港居侍侧记》，《蔡元培先生全集》第167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

终关注中央研究院在西南大后方的情况，每有相关函电必载入日记。在他去世前数日，先后收到翁文灏、任鸿隽、竺可桢等人的来信，对其中有关中研院评议会改选一事仍甚为关心。蔡晚年摒除外务，希求静心养病和写作，但对于他视为“百年大计”的中研院的工作则是一个例外。

在香港的这段平静而又寂寥的日子里，蔡静养之余，便是阅读和写作。他阅览的书目主要有：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傅东华译《比较文学史》、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张元济《校史随笔》、李玄伯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以及《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等。此外，他还设法从香港商务印书馆借书来读，王云五考虑到他的视力较差，特意找来大字本，其中有《王阳明全集》、《陆放翁全集》和《游志汇编》。同时，他应约为一些书籍撰写序文，如《鲁迅全集》序、肖瑜《居友学说评论》序、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究初稿》序、任鸿隽《古青诗存》跋等。这期间，他的一项经常性写作，便是那部《自写年谱》。此谱自1936年2月14日开始动笔撰述，直到1940年2月底逝世前卧病时辍笔，系用商务印书馆印制的毛边纸绿行“记事珠”稿本三册，以毛笔书写。因为此谱是一部未完之作，故只有约四万余字。所叙自家世、出生直至1921年赴欧美考察为止。该谱用白话文写作，文字简捷清丽，对家世、少年时代、科举考试及读书、供职北京翰林院、回乡从事教育、在上海的活动、留德四年及其后旅居法国的生活均作详实记述；许多细节颇为生动感人，从中可以探知蔡思想人格的形成环境和过程。其中有关民国政坛的记述，不乏史料价值，惜之所记较略。至于出长北京大学以后的记载，则殊少新意。总之，这部没有完成的《自写年谱》给人的印象是：年谱的体例，自传的笔法；前半部分详实，后半部分相对简略。看来，最初动笔撰写时，蔡颇为严谨投入，以后为病所扰，不免力不从心。蔡较早谈及这部《自写年谱》，是1938

年11月7日复高平叔的信函中。高受蔡嘱托，编订《孑民文存》，来函切望蔡所撰“自传”能冠于文存卷首。蔡答曰：“自传因头绪颇繁，不适于旅行中之准备（参考书既不完全，工作亦时时中辍），故照年谱体写之，现已得三万言左右（写成时至少五万言）。”由于字数太多，且距写完时尚远等因，“故不适宜于冠‘文存’之上。”^①从中当可知晓蔡此项写作的一些设想及其写作情形。

深怀民族大义，充满爱国情感，是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蔡元培秉承这一传统，其报国之志老而不衰。他虽病居香港，却心系天下。在港期间，他唯一的一次公开活动，是1938年5月20日应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之邀，出席在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并发表演说。在包括香港总督罗富国在内的众多来宾面前，他讲道：抗战时期需要人人具有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论是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还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济难民的人员，以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有了这种精神，便能免于疏忽错乱散漫等过失，从而在全民抗战中担当起一份任务。他强调，推广美育，便是养成这种精神的一种方法。这位美育的倡导者此时将他深信不疑的精神陶冶法运用到了抗战大计之中，不论外界如何评论，蔡本人是十分认真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精神，他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在纪念北京大学成立四十周年的题词里，他勉励北大师生“他日山河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在抗战初期的困难时刻，蔡对未来表现出一种自信的乐观豪情。当然，战争使家园残破、生灵涂炭，这不能不使人心绪沉重；而面对敌寇的猖狂，又时时鼓荡起铁马金戈的壮烈情怀。这种思绪，在蔡元培的诗作中有强烈的表现。他写给陆丹林的红叶

^① 《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230页，中华书局1989年。

诗其三云：“枫叶荻花瑟瑟秋，江州司马感牢愁。而今痛苦何时已，白骨皑皑战血流。”他为张一麐《八一三纪事诗》所题七绝云：“世号诗史杜工部，亘古男儿陆渭南。不作楚囚相对态，时闻谔谔展雄谈。”看来，病居香港的蔡元培既有“江州司马”的愁怀，又思慕那“亘古男儿”的大丈夫气概。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激情岂是那病弱的肉体所能框限？最能说明蔡“壮心不已”的文字，莫过于他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所作的会歌词。这首著名的《满江红》词有云：“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国内外各方人士并未因战乱而忘记病居港九的蔡元培。1939年7月，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推举他为名誉主席。不少海外友人亦不断来函，请他移居新加坡或菲律宾等地，但都被他婉言谢绝。蔡曾向王云五等人透露过转赴昆明的意向，因为中研院若干机构迁置于此，大概是病体不支，到底没有成行。初来香港之时，他还由家人和朋友陪同游览浅水湾、香港仔、道风山等处风景，后来就几乎足不出户了。时相过从的除王云五之外，还有一位张一麐先生。张曾任北洋时代政要，与蔡又属同辈，二老聚在一起，忆及前尘往事，平添几多逸趣。蔡寓居的柯士甸路一带，居民大多为江浙人，人们对这位儒雅和蔼的“周子余”老先生十分敬重，每有幼儿取名号之事，必来拜请，蔡来者不拒，谨为选字，邻人皆满意而去。蔡一生起居并无嗜好，独喜绍兴黄酒，每餐必饮。晚年大病之后，周夫人严加限制，用餐仅供一杯，老人无奈，只得遵命行事。在病居香港的寂寞岁月里，蔡元培与周夫人相依为命，夫妻间依旧不断作诗唱和，周夫人五十寿诞，蔡赠诗相贺，家中一派融融之气。1939年4月4日，是一年一度的儿童节，蔡氏夫妇在家中为他们的三个幼年子女举行庆

祝活动，女作家沙菲（陈衡哲）携儿女参加，科学家何尚平也赶来庆贺。蔡郑重其事地致词，来宾亦分别演说，最后则是孩子们的精彩表演，或歌或舞或讲童话或做游戏。这是老教育家渡过的最后一个欢快的儿童节。然而，在这欢快的背后，蔡家经济状况却令人堪忧。蔡有限的公职收入越来越难以抵付因兑换港币及物价上扬而骤然增多的支出，本来既俭朴的生活不得不加以节缩。知悉蔡家内情的蔡的秘书兼家庭教师余天民即认为，蔡先生晚年多病与营养不佳有关。蔡一生清廉自守，至最后的岁月仍不能摆脱贫病的厄运，悲哉！

1940年3月3日清晨，蔡元培在寓所起床时，忽觉头晕目眩，摔倒在地，随即口吐鲜血。经医生诊治，疑为胃溃疡，建议住院治疗。翌日，住进香港养和医院，不久即大量排血，陷入昏迷状态。虽经中外医师悉心救治，施以输血手术，仍归无效。延至5日上午九时三刻逝世，终年七十三岁。医生认为，其失足仆地，伤及内部，导致胃瘤出血，乃不治之因。蔡的遗体后被安葬在香港仔华人公墓。

蔡元培逝世后，全国各地举行悼念活动，多家报刊发表社论或载文，称誉他的功德，各主要党派和团体及其领导人也纷纷致电吊唁。人们同声赞扬他的品德，他的事功，他的开一代学风的巨大影响，从这时起，“一代宗师”、“人世楷模”等等赞誉之词与蔡元培的名字紧紧连在了一起。

悼念期间，各界人士所送挽联，蔚为大观，后有《哀挽录》印行于世。这些挽联从不同角度概论蔡元培的一生，颇为精到。姑录数联于后：

《哀挽录》中的一联云：“打开思想牢狱，解放千年知识囚徒，主将美育承宗教；推转时代巨轮，成功一世人民哲匠，却尊自由为学风。”

陈友仁的挽联云：“薄元首而不为亮节高风千秋曾有几辈；

容百家之并起宏模雅量当代祇见斯人。”

周恩来的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8.2 蔡元培研究概述

蔡元培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位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方面做出卓越成绩的历史人物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有关其生平思想的学术研究从五十年代起步，到八十年代已取得颇为可观的成果。

其实，还在蔡元培在世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他的思想的研究价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的1919年，北京大学新潮社辑印了《蔡子民先生言行录》上、下册，收录了清末民初以来蔡氏的重要演说、文章及部分专著，并附有蔡口述、黄世晖笔录的《传略》。罗家伦等北大学生印行这部言行录的目的，显然是为使外界能够直接了解蔡元培这一“五四”时期风云人物的思想主张。三十年代初，上海广益书局又出版了一部《蔡元培言行录》，主要汇集了二十年代以后蔡元培发表于报刊的一些言论，其中也有几篇早年的文稿。上述两部综合文集，加上先前出版的著、译专书，构成当时刊布于世的、反映蔡元培思想主张和学术成果的基本文字部分。

从蔡元培逝世到四十年代中期，重庆等地的许多报刊接连刊载纪念和回忆文章，其作者均为与蔡有所交往的朋友、同事或学生。他们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所作的生动记述，大大充实了蔡的生平资料，也深化了世人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和理解。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高平叔编写的《蔡子民先生传略》。该书由编者根据蔡生前口述所写的五四之后的传略与黄世晖所记部分相衔接，加上蔡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两文及蒋维乔的《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一文汇编而

成。虽则简略，却是第一本较为完整的蔡氏传记，它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信实材料。

1950年，蔡尚思编撰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一书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这部洋洋数十万字的著作，分门别类地记述了蔡元培的社会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观点，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评价，堪称蔡元培学术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不足之处在于，该书缺乏严密的体系，所采资料虽多，却给人一种堆砌之感。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一部《蔡元培选集》，从所选篇目来看，较为偏重有关教育方面的内容。这部选集印量较多，成为此后二十年间一般中国大陆学者从事研究所依据的主要书籍。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前，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有关蔡元培的研究论文，但大多带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政治评判的印迹。“文革”开始，学术研究归于沉寂，蔡元培的名字似乎被人们遗忘了。这期间，台湾史学界关于蔡元培的记述和研究保持了正常态势。《传记文学》等刊物上不时发表有关蔡的忆述性文章，有关的学术活动亦比较活跃。196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这部厚达1762页的文集，大量辑录了蔡的著述、论文、演说、序跋、信函，还附录了部分研究、回忆蔡的文章。该书是当时印行的同类文集中收录量最大的一部。1976年，陶英惠编写的《蔡元培年谱》（上册）在台湾出版。这部年谱内容充实，记述严谨，代表了岛内这方面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准。但是，由于两岸隔绝造成的一些第一手资料的阙如，编者不得不增大了背景材料的介绍，迄今该谱仅出上册，记事止于1916年。

随着“文革”的结束，国内学术界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197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蔡元培的重要历史作用再次为人们所“发现”。翌年3月5日，首都各界隆重举行纪念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大会，为配合这一纪念活动，中华书

局出版了高平叔编著的《蔡元培年谱》。这本年谱是编者在编辑蔡全集过程中从大量资料内精选汇集而成，虽然仅十万余字，却相当准确地记述了谱主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及其著述和言论，史料价值很高。略嫌不足的是，由于该谱成书仓促，记事系时方面存在一些错漏。以北京的这次纪念大会为推动力，在八十年代的十年间，蔡元培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其显著标志是蔡全集及选集的辑印和一批研究专著问世。

提及《蔡元培全集》的辑印，首先应当谈谈它的编者高平叔。高青年时代追随蔡元培，蔡视之若弟子，曾以编辑文存之事相托，并向其口述自身经历。1935年始，高着手辑录蔡氏文存，且将文稿分批交蔡本人审订，还约定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不久，抗战爆发，高颠沛流离，转徙内地各省，文存底稿在战乱中散失，高氏痛感“生平遗憾，无过于此”。四十余年后，在蔡元培的生前好友和蔡氏家属的劝促下，高平叔以古稀之年，再次担当起辑录文集的工作。数年间，他不分寒暑，克服病痛，埋头整理编次蔡的遗稿，并以有限的个人收入驱驰各地，查找核对史料。从1984年开始，他编辑的《蔡元培全集》一至七卷，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总计262万余字的全集，收录了包括自写年谱、部分日记在内的大量文献，其中属初次刊出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是迄今辑录蔡著最多的一部文集。鉴于全集出齐时间较长，为适应研究需要，高平叔还陆续按哲学、政治、语言及文学、科学与技术、教育、美育、史学等学科分别编选了“专集”，由河北、湖南等地出版社印行。同时，高还撰写了数十篇文章，记述蔡元培与苏报案、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的关系，以及蔡与孙中山、张元济、鲁迅、马叙伦等人的交往等等。高平叔的上述工作，为蔡元培学术研究建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也进而了却了他多年来聚结于胸的一个心愿。

从1983年至1990年间，一批蔡元培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计

有：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聂振斌《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周天度《蔡元培传》、唐振常《蔡元培传》、胡国枢《蔡元培评传》。此外，江苏、浙江、上海等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通俗性《蔡元培》传略读物，中华书局出版了《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与此同时，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有关蔡元培的论文、文章，总计近三百篇。所有这些表明，蔡元培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学术规模。正是在此情况下，1986年4月，全国性的蔡元培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两年后，该会举办了首次蔡元培研究学术讨论会，国内及美国、德国、日本、法国、香港的学者五十余人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论蔡元培》。上述专著和论文，对蔡元培的生平活动和学术思想进行了广泛探讨和全面评价。以下综合其要点，略作介绍：

许多研究者对蔡元培各时期的活动作了充分评价。他们认为，蔡早年与章太炎等创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是继兴中会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以《苏报》为中心的一批革命志士及其活动，对此后辛亥时期上海及东南各省革命形势的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作为光复会会长和同盟会分部负责人的蔡元培，其历史作用不应忽略。民国元年，蔡迎袁南下失败，应从政治力量的对比上寻找原因，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因素，显然有欠公允。蔡在新文化运动中不仅是保护者，而且也是倡导者之一，他改革北京大学，对“五四运动”起了孕育和催生的作用。蔡晚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借助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发展科学技术，奠定了我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基础。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始终是人们研究的重点。论者认为，蔡是在吸收了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学习西方教育的经验教训后，提出其教育主张，开展教育实践的。他对封建旧教育的批判、对西方近代教育的引进，其广度、深度及影响，都超过前人，在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所主持的1912年的教育改革，

首次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并且重视教育立法、提倡社会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进而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壬子、癸丑学制”，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教育变革。对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教育独立论是蔡教育思想的核心，他的一系列教育主张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另一种意见则强调，教育救国思想构成蔡教育思想的主导，而教育独立论不过是其教育救国思想在特定环境下的派生物。有的学者指出，蔡的教育思想受到卢梭、沛斯泰洛齐的深刻影响，他提出的“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主张实质是“儿童本位论”的观点。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蔡在接触“儿童本位论”的教育思想以前，很早就提倡学生自学和研究，就有“尚自然，展个性”的主张，这主要是继承了我国书院的传统。关于蔡的高等教育思想，有的文章总结道：注重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以科研促进教学，学生文理互修，是蔡组织和指导大学教育的重要思想特色。

“兼容并包”主张是蔡教育思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比较带有倾向性的看法是，“兼容并包”主张表面上对各派思想学说不偏不倚，无所偏向，似乎有折衷调和之嫌，实际上，这正是蔡元培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思想斗争武器。在新文化运动中，蔡站在新派一边，其“兼容并包”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兼容并包”的主张反映了思想和文化科学发展的规律，反映了高等教育的规律，它是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听任各种学术自由发展，自然淘汰，有其一定的真理性；不应当将这一主张视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应充分肯定它是促进学术发展的正确方针。

蔡元培的社会政治思想比较复杂，表现形式亦呈多样化。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然而学术观点却颇多歧异。一种意见认为，蔡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基础上生发的民主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蔡的政治思想

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混和体。论者在一致肯定蔡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同时，也注意到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一面，只是有的论者认为这是早期短时的现象，蔡后来放弃并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而有的论者则认为蔡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延续了很久，五四时期仍有表现。关于蔡的改良主义问题，有的论者认为，民国成立以后，蔡基本上就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论者，而是一个社会改良论者；有的论者则认为，蔡列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才开始走上改良主义道路。论者指出，蔡1927年参加“清党”是政治上的失误，但对大革命失败后至“九·一八”事变以前这段时间蔡的思想和行动，应当具体分析，不可一概否定。这一时期，蔡的政治表现与其反对极端、主张中和的思想有很大关系，蔡的中和思想由来已久，它受到儒家中庸思想、康德的“二元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多方面的影响。

学术界对于蔡元培哲学思想的性质、特点、渊源意见不一，或说他逐步倒向“现代主观唯心主义”；或说“已由唯心论进到唯物论；”或说他在哲学上首次提出了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近代中国“唯物主义思潮作前导”等等。有的学者深入分析蔡的哲学思想后认为，在物质与精神二者关系的根本观点上，客观唯心主义始终是蔡的基本思想，但当他根据近代自然科学知识阐述自然界的演化，说明人的认识，批判宗教神学唯心主义方面，却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蔡哲学思想的渊源有两个，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主要继承了儒家思想，特别是中庸之道；一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直至近代欧洲，他都有所研究并加以吸收，但主要是以康德哲学为框架，揉合叔本华等人的思想。不过，他的哲学思想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国古代的，更不是只遵从一家一派，是适应资产阶级革命而产生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一种表现形态。

人们充分肯定蔡元培对中国近代伦理学和美学所作的开创性工作。指出，蔡总结中国历代的伦理学说，介绍西方近代伦理学，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学资料相结合，作为现实的道德标准，以指导社会。在美学方面，蔡虽然没有建立起缜密的美学理论体系，但通过美育紧密联系社会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在这一点上，蔡与王国维的重视美学理论却忽略社会应用的特点适成相反，互有长短。蔡毕生倡导美育，以此作为改进社会的工具，但过分夸大美育的社会作用，某些美育设施带有空想色彩，则是其美育思想的不足。

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蔡元培在这方面的主张和实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些论者对他的评价甚高，认为在戊戌至辛亥时期的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中，蔡是比较能正确评价中西文化，能够没有偏见地同时看到中西文化传统中优缺点的少数人之一，他既不是国粹派，也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这是由于他比较深刻了解中西文化的内容，便于比较权衡，知其得失长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用自己在政治、文化领域的思想和实践，较好回答了文化上的中西关系问题。中国知识界后来对文化问题的几次讨论，似乎还没有明显超出蔡以及和他持相同观点的前代学者回答的范围。有些论者在肯定蔡支持新文化的同时也指出，在文化问题上他基本上是站在折衷主义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尽管这是较为次要的一面。有的外国学者着意探讨了蔡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认为蔡在中国近代变革阶段反映了儒家的人文传统，强烈的道德思想，修身和治国平天下的结合，强调和谐，个人自由与社会义务的完美平衡，这些构成了他孔孟型的文化性格。^①

① 以上观点介绍，可参阅拙文《1979年以来国内蔡元培研究概述》和《近年来蔡元培研究述评》，分见《历史教学》1987年第9期；《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

有的学者论及蔡元培在治学方面深受中国旧学影响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蔡以其旧学根基已固，价值标准已趋定型，故对西学是选择，是拿来与旧学相印证，所以谈自由平等博爱，谈社会主义，言必称孔孟。他对西学颇曾博览，且具眼光识力，但其根本态度，从立身行事到从政问学，都极受旧学的影响。在学术上，蔡与梁启超一辈人同属泛滥百家的时代，蔡虽曾多年留学海外，但他是在中国学问已成，根基已固的情况下去做老童生，他只是去求更多的了解，而不在乎完成什么。蔡承认自己“受中国读书人恶习太深”，所谓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就是博览而无系统，散漫而无中心。蔡的自我批评，是符合他的实际的。正因如此，尽管他本人也深知做学问最重要的是方法，但他却远未能锤炼出自己的一套方法。他的著述，大多是讲义式的概述，谈不上有精密的方法。其《红楼梦》研究更是因为方法不当而脱离了科学研究的轨道。^①

总之，在八十年代的十年间，学术界对蔡元培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思想进行了广泛的记述和比较深入的研讨。大体说来，这些文字成果，一般的记述和介绍多于深层次的分析 and 探讨，判定性的评论多于演绎性的研究。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就学术方面而言，蔡元培的思想博大庞杂，其一生活活动领域又十分宽泛，要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他的生平思想并非易事。前述蔡元培研究的主要成果差不多集中形成于八十年代前期，而那时，大量的有关蔡的文献资料尚未印行，以至不少论文的作者主要是依据那本五十年代末出版的选集开展研究，这势必难以深入。另一方面，蔡元培研究在整体上起步较晚，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几乎与学术研究同步进行，一些研究成果还需要时间的凝炼，

^① 耿云志：《蔡元培与胡适》，见《论蔡元培》第410—411；414页。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难以相互借鉴和推动。当然，历史人物研究中长期形成的某些思维定势，诸如偏重政治行为，褒扬或贬损的单向发展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蔡元培研究的深化起着制约作用。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而紧迫的过程。在几代人的努力中，蔡元培作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文化教育科学领域进行了卓越的工作，尤其是他所开创的“五四”时期的一代学风，经过历史的积淀，业已构成中华文化意识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对蔡元培的人格敬仰和学术研究将会长久持续下去……

蔡元培生平、学术年表

1868年（清同治六年） 一岁（年龄以虚岁计）

1月11日 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内笔飞弄。父蔡光普，曾任当地某钱庄经理，母周氏。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 六岁

入家塾读书，塾师为周先生。

1877年（清光绪三年） 十一岁

父亲病逝。家境渐窘，无力延师，遂附读他处。

1879年（光绪五年） 十三岁

开始学作八股文。

1880年（光绪六年） 十四岁

受业于同县秀才王懋修（子庄）。王先生崇尚理学，服膺宋明大儒，蔡从学四年之久，颇受影响。

1883年（光绪九年） 十七岁

考中秀才。开始自由读书，常借阅叔父蔡铭恩藏书，且得其指导。

1884年（光绪十年） 十八岁

充任当地塾师。

1885年（光绪十一年） 十九岁

8月 第一次赴杭州，应乡试，未中。

1886年（光绪十二年） 二十岁

入当地徐家，作徐维则之伴读，兼为校勘书籍。

徐氏藏书甚富，初有家庭藏书楼“铸学斋”，以后辟为“古越藏书楼”。蔡在此四年，得以博览，学乃大进。

1889年（光绪十五年） 二十三岁

春 与王昭结婚。

秋 赴杭州应恩科乡试，中举人，主试为李文田。

1890年（光绪十六年） 二十四岁

春 赴北京应会试，中为贡士，未参加本科殿试。

秋 出任上虞县志局总纂，不久即辞职。

是年 始记日记，名《知服堂日记》。

1892年（光绪十八年） 二十六岁

春 入京补应殿试，被取为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本年主考大臣为翁同龢等。

1893年（光绪十九年） 二十七岁

夏、冬 游历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小住广州、潮州。

获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书。

1894年（光绪二十年） 二十八岁

春 入京应散馆考试，升补翰林院编修。供职翰林院之初，与同乡前辈李慈铭过从较密，后兼任李家塾师。

是年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对时局甚关切，始阅读新学书报。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二十九岁

继续供职翰林院。曾赴南京访谒张之洞。

冬 返绍兴。

1896 年 （光绪二十二年） 三十岁

在绍兴。广泛浏览新学书籍，如郑观应《盛世危言》，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等。

冬 返京。

1897 年 （光绪二十三年） 三十一岁

继续供职翰林院，曾往保和殿应试，此试为各省主考学政及会试同考官人选而设。

1898 年 （光绪二十四年） 三十二岁

继续供职翰林院，与王式通等组成东文学社，开始学习日文。是年，已开始疏证《石头记》。

秋 戊戌变法失败，深感失望，遂请长假，携眷离京南归。

冬 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1899 年 （光绪二十五年） 三十三岁

继续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并兼任嵊县剡山书院院长。

4 月 为徐维则编《东西学书录》撰序。

1900 年 （光绪二十六年） 三十四岁

2 月 手订《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内中述及自己求学之路径。

6 月 夫人王昭病逝。

是年 悉心研讨新式学堂课程及学制，并与童亦韩赴杭州、临安等地筹办学校。此时，得与章太炎、宋恕、陈介石等结识。

1901 年 （光绪二十七年） 三十五岁

8 月 在上海澄衷学堂任职。

9月 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中文教习，特班学生中有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胡仁源等。

10月 所撰《学堂教科论》由上海普通学书室印行。

12月 与张元济、杜亚泉等创办《外交报》。

冬 与黄世振结婚。

1902年 （光绪二十八年） 三十六岁

4月 与叶瀚、蒋观云、黄宗仰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被推举为会长。

4月 选编《文变》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代印。

暑假 游历日本，旋即伴送吴稚晖回国。

11月 因南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而辞职，接纳退学学生，组织爱国学社，任学社总理。

是年 与蒋观云等发起创办爱国女学；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首任所长；为麦鼎华译《中等伦理学》一书撰序。

1903年 （光绪二十九年） 三十七岁

春 与爱国学社同人吴稚晖、章太炎等宣传反满革命，参加拒法、拒俄运动。

4月 在《苏报》发表《释“仇满”》一文。

6月 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发生分裂，辞去会、社职务，中旬离沪赴青岛，月底“苏报案”发生。

10月 在青岛所译德国科培尔《哲学要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月 与王小徐、汪允宗等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日报。

1904年 （光绪三十年） 三十八岁

2月 在《俄事警闻》发表所撰小说《新年梦》。

2月 《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任主编，为时半

年。

秋 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其成员有杨笃生、何海樵等，陈独秀亦曾与闻其事。

冬 发起组织光复会，任会长，促成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合作。

1905 年 （光绪三十一年） 三十九岁

10月 加入中国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分会会长。

1906 年 （光绪三十二年） 四十岁

春 回绍兴，出任学务公所总理，旋即辞职。

6 月 到上海迎接章太炎期满出狱。

下半年 为出国留学，入京等候派遣。应译学馆馆长章一山之邀，任该馆教习。

9月 所译日本井上圆了《妖怪学讲义总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07 年 （光绪三十三年） 四十一岁

6 月 离京经西伯利亚赴德国留学。

下半年 在柏林，习德语，编译书籍，兼任唐绍仪侄家庭教师。

1908 年 （光绪三十四年） 四十二岁

秋 进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

1909 年 （清宣统元年） 四十三岁

继续在莱比锡大学研修。

10月 所译德国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0 年 （宣统二年） 四十四岁

继续在莱比锡大学研修。

4 月 所著《中国伦理学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1 年 （宣统三年） 四十五岁

10月 获悉国内爆发武昌起义，由莱比锡到柏林，与留德学生进行声援活动。

12月 经由西伯利亚回国，抵上海。

1912年 （民国元年） 四十六岁

1月 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2月 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受孙中山委派，任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之专使。

3月 唐绍仪内阁成立，留任教育总长。

5月 所编《中学修身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

7月 辞去教育总长职务。

8月 为陆尔奎等编《新字典》撰序。

9月 携眷再度赴德国。其后，仍进莱比锡大学研修。

10月 所订《大学令》二十二条由教育部公布施行。

1913年 （民国二年） 四十七岁

6月 因宋教仁被刺，奉召回国抵沪，奔走调解南北关系事宜。

7月 “二次革命”爆发，与吴稚晖、张继等在上海创刊《公论》晚报，撰文抨击袁世凯。

9月 离沪赴法国。到法后居巴黎近郊，习法语，从事著译。

1914年 （民国三年） 四十八岁

上半年 与汪精卫、李石曾等筹办《学风》杂志，起草《学风杂志发刊词》，极言学习西方文化之必要。

8月 欧战爆发，参与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活动。

1915年 （民国四年） 四十九岁

1月 所编译之《哲学大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宗教思想”一节为其“自创之说”。

6月 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复函任鸿隽，对其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之举表示支持。

是年 受教育部委托，撰写《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一文，以提交在巴拿马举行的万国教育会议。

1916年 （民国五年） 五十岁

3月 与李石曾、吴玉章、欧乐、穆岱等中法人士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后任中方会长。

4月 在巴黎与李石曾等开办华工学校。其后编成《华工学校讲义》四十篇。

上半年 所著《石头记索隐》在上海《小说月报》“名著”栏连载。

8月15日 与李石曾、汪精卫等在巴黎创刊《旅欧杂志》，在创刊号发表《文明之消化》一文，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应有所选择。

9月 接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电，请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旋即回国。

12月23日 由上海到北京。26日，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是年 拟编写《欧洲美术丛述》，仅撰成《康德美学述》一种。

1917年 （民国六年） 五十一岁

1月4日 到北京大学视事，9日发表就职演说。

1月13日 聘任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

4月8日 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之演说，该演说词后在《新青年》等刊物刊载。

5月9日 为林语堂《汉字索引制》一书作序。

7月 因张勋复辟，一度辞职，事件平息后，回校复任。

8月1日 所撰《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一文在《新青年》杂志发表。

是年 兼任国语研究会会长、孔德学校校长等职。

1918年 （民国七年） 五十二岁

1月19日 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发表《进德会旨趣书》。

2月1日 以北大校长名义刊出“征集全国近世歌谣启事”。

2月20日 与北京各国立高等学校校长发起组织学术讲演会，以“唤起国人研究学术之兴趣”。

3月5日 以附于北大的国史编纂处处长名义，向教育部报送国史编纂计划，该计划是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刊载。

5月30日 在天津所作《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的演说词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

8月 为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和徐宝璜《新闻学大意》两书分别撰序。

10月14日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到会发表演说，论及我国近代新闻的发展和新闻道德等问题。

11月10日 撰写《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阐明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

11月16日 在北京天安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劳工神圣》的演说。

12月7日 与国内教育界人士共同提出《请各国退还庚款供推广教育意见书》。

1919年 （民国八年） 五十三岁

1月 与张相文致函孙中山，就国史编纂处拟编写《国史前编》事征询其意见。

3月18日 撰写《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函》，反驳林纾对北京大学及新文化运动的指责。

4月2日 复函教育总长傅增湘，重申“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

5月3日 告知北大学生代表，政府已通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5月4日 “五四”运动爆发。其后，与各校校长积极营救被捕学生。

5月9日 辞北大校长职务，离京出走。

7月9日 应各方敦请，宣布放弃辞职。

9月12日 返京复任。

11月9日 在北京女子高等学校发表演说《国文之将来》，认为白话与文言之争，“白话派一定占优胜”。

12月1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

1920年（民国九年）五十四岁

1月 在少年中国学会发表《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演说。

4月1日 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提出让新思潮自由发展，定会有利无害。

5月 分别为浦薛凤编《白话唐人七绝百首》和沈尹默《秋明室诗稿》两书作序。在《新潮》杂志发表《美术的起源》一文。

7月 分别为李季译《社会主义史》和宋教仁《我之历史》两书撰序。

上半年 应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邀，讲授《美学》课程。

暑期 北京大学率先正式招收女生入学。

10月 新潮社编《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出版。

10月底11月初 赴湖南长沙等地先后发表《何谓文化?》、《美术的进化》、《美学的进化》、《美学的研究法》等多次演说。

11月17日 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五十一册出版,撰写《刊印缘起》。

11月24日 离上海赴欧美考察。

12月27日 抵达法国马赛。

1921年 (民国十年) 五十五岁

1月至8月 在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荷兰、英国、美国进行考察、访问。其中:

1月1日 黄仲玉夫人在北京病逝。

1月12、16日 在法国巴黎先后发布两个“华法教育会通告”,宣布华法教育会与留法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

3月8日 与李圣章在巴黎访晤居里夫人。

3月16日 与夏元瑛、林宰平在柏林访晤爱因斯坦。

3月21日 在德国访哲学家倭铿,晤谈一小时。

4月22日 参观梵蒂冈教皇宫,得览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之绘画和雕塑,“不胜伟大之感”。

5月 法国里昂大学授以文学博士荣誉学位。

6月8日 美国纽约大学授以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6月14日 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发表题为《东西文化结合》的演说。

8月6日 受北京政府教育部委托,赴檀香山出席太平洋教育会议。

9月18日 返抵北京。

10月 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美学》课程,并着手编著

《美学通论》一书，写出《美学的趋向》、《美学的对象》两章。

1922年（民国十一年）五十六岁

1月30日 撰写《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副题为“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
与胡适开展论争。

2月27日 为杨昭愔编著《图书馆学》一书撰序。

3月20日 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

4月9日 在北京非宗教同盟大会上发表《非宗教运动》演说。

5月14日 领衔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

6月20日 发表《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

7月上旬 赴济南参加并主持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

8月20日 在《国语月刊》发表《汉字改革说》，主张汉字改用拉丁字拼音。

9月上旬 被推为学制会议主席，主持审订“新学制”。

12月15日 世界语联合大会在北大召开，任会议主席并致开会词。

1923年（民国十二年）五十七岁

1月17日 因不满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罗文干案”，愤然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1月23日 发表《不合作宣言》，表示不与北京政府的黑暗政治同流合污。

2月 所撰《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在《申报》印行的《最近之五十年》巨册中发表。

7月 与周峻结婚。携眷离沪赴欧。

8月底 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

10月10日 在比利时沙洛王劳工大学发表《中国之文艺中兴》演说。

1924年 （民国十三年） 五十八岁

1月20日 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由孙中山提名，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1月 由比利时移居法国。

4月 赴伦敦，推动英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兴办中国教育事业。

8月 受北京政府教育部委托，赴荷兰和瑞典出席国际民族学会议。

8月 所编译之《简易哲学纲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1月10日 为许德珩译《社会学方法论》一书作序。

11月21日 赴德国，向汉堡大学报名入学，研究民族学。

1925年 （民国十四年） 五十九岁

3月 为孙中山逝世撰写祭文及挽联。

4月 为樊炳清等编《哲学辞典》撰序。

7月 在汉堡撰《为国内反对英日风潮敬告列强》一文，译成英、法、德文分别在欧洲各报发表，澄清“五卅运动”真相，声援国内的斗争。

10月4日 为刘半农编《敦煌掇琐》撰序。

1926年 （民国十五年） 六十岁

2月3日 应北京政府教育部电促回国抵上海。

2月4日 在上海接受《国闻周报》记者采访，就国内教育问题和政治形势发表见解。

4月2日 复函北京大学评议会和代理校长蒋梦麟，表示暂难北上。

4月22日 为王云五编《四角号码检字法》撰序。

5月 在上海参加皖、苏、浙三省联合会，策应北伐。

6月30日 为寿鹏飞《红楼梦本事疏证》一书撰序。

12月5日 发表《说民族学》一文。

12月23日 孙传芳下令取缔苏皖浙三省联合会，因遭通辑，与马叙伦等避走福建。

1927年 （民国十六年） 六十一岁

2月13日 在闽南佛学院发表《佛学与佛教及今后之改革》演说。

3月12日 在杭州之江大学发表《读书与救国》演说。

3月28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常务会议，被推为主席，通过吴稚晖提出的弹劾共产党的议案。

4月9日 与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

4月18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向主席胡汉民授印。

5、6月间 准备试行大学区制度，呈请国民政府变更教育行政制度。

6月17日 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大学院院长。大学院于10月1日正式成立。

10月2日 与高鲁、沈定一参观晓庄师范学校，并发表演说。

12月22日 与孙科联名提出《教育经费独立案》，在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获通过。

12月 与林凤眠、杨杏佛、肖友梅等提议创办国立艺术大学。

1928年 （民国十七年） 六十二岁

1月 《大学院公报》创刊，撰写发刊词，提出教育科学化等主张。

1月 兼任交通大学校长。

2月21日 发布全国废止春秋祀孔的通令。

4月23日 被任命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该院于6月宣告成立。

5月12日 为尤佳章译《西洋科学史》作序。

5月15日 主持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致开幕词。

8月17日 辞去大学院院长等本兼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携眷离南京，定居上海。

9月16日 发表《三民主义的中和性》一文。

11月20日 为王云五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一书作序。

11月 被推选为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会长。

1929年 （民国十八年） 六十三岁

1月4日 赴杭州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会议，被选为董事长。

1月 为金善宝《实用麦作学》撰序。

4月28日 发表《美术批评的相对性》一文。

8月 兼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

9月 为平息北京大学师生反对并入北平大学区的风潮，再次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并未到任，校务由陈大齐代理，一年后辞去校长名义。

9月 为《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撰序。

11月17日 为黄季飞著《经济史长编》撰序。

11月 为李季著《马克思传》作序。

1930年 （民国十九年） 六十四岁

1月 发表《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一文。

2月8日 出席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大会，发表《社会学与民族学之关系》演说。

5月20日 为胡鉴民译《自由哲学》一书撰序。

7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教育大辞书》，内有所撰“大学教育”、“美育”两词条。

8月12日 出席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并致开会词。

10月 为蒋炳然著《近十年中国之气候》一书作序。

11月20日 在亚洲学会发表《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演说。

是年 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档案甲集》作序。撰写《徐宝璜行状》。

1931年 （民国二十年） 六十五岁

3月 出任西陲学术考察团理事长。

4月15日 为赵药农编《中国新本草图志》一书作序。

4月27日 发表《国化教科书问题》的演说。

5月 发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一文。

6月15日 所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刊载于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巨册中。

9月 为调解“宁粤对立”，与张继、陈铭枢南下广州谈判。

是年 撰写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歌歌词。

1932年 （民国二十一年） 六十六岁

1月15日 为王季同著《佛法与科学比较之研究》一书作序。

2月1日 与各国立大学校长联名致电国际联盟，请速制止日军破坏上海文教设施的暴行。

8月31日 为熊十力著《新唯识论》一书撰序。

10月23日 为陈独秀被捕一事，与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致电国民党当局请予宽释。

12月17日 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六十七岁

2月17日 与宋庆龄、鲁迅等在上海接待来访的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

3月14日 与陶行知、李公朴、陈望道等百余人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在上海青年会讲演《科学的社会主义概论》。

4月 为亚东图书馆印行的《独秀文存》作序。

6月18日 因杨杏佛遇刺身亡，甚感悲愤。主持丧葬事宜。

10月1日 撰写《印行〈越縎堂日记补〉缘起》一文。

12月8日 出席欢迎意大利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来华大会，并致词。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六十八岁

1月1日 发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

4月5日 发表《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一文。

5月5日 为王立中编《俞理初先生年谱》作序。

5月29日 为高鲁编著《星象统笺》一书作序。

6月18日 聘丁文江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到院视事。

6月 为朱桂曜编著《庄子内篇证补》一书作序。

10月15日 为金公亮编《美学原理》一书撰序。

12月10日 在南京中央大学发表《民族学上之进化观》演说。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六十九岁

1月 复函何炳松，就何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意见。

4月10日 发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

5月20日 发表《对于读经问题之意见》一文。

7月25日 发表《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一文。

7月31日 印发启事：辞去一切兼职，停止接受信件，停止介绍职业。

9月上旬 在南京主持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第一次年会。

10月 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所撰总序发表。

11月18日 与吴稚晖等联名向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议案：请注重技术，特定为教育之重大方针，修改现行大学制，加强技术专科教育。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七十岁

1月1日 复函胡适、蒋梦麟等人，对其献屋祝寿之举深致谢忱。

2月9日 出席上海各界为其七十诞辰举行的祝寿宴会，并致词。

2月14日 开始撰写《自写年谱》。

2月16日 发表《丁文江先生对于中央研究院之贡献》一文。

3月 为英文《中国季刊》所撰《中国之中央研究院与科学研究》一文发表。

5月10日 领衔发表由六百余人列名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

8月3日 为蔡尚思著《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作序。

8月 撰写《刘君申叔事略》，附于《刘申叔先生遗书》中。

10月5日 为《端方密电档中关于“苏报案”各电》作序。

10月19日 鲁迅逝世，任治丧委员会主席。

11月下旬 大病，身体转衰。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七十一岁

5月初 在南京主持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三次年会。

6月 为《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作序。

11月27日 由丁燮林等陪同离上海抵香港。

12月 所撰《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开始陆续发表。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七十二岁

2月28日 在香港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

5月23日 应保卫中国大同盟之邀，出席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举办的美术展览开幕式，并发表演说。

6月1日 为《鲁迅全集》作序，盛赞鲁迅为“新文学的开山”。

11月 聘任鸿隽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七十三岁

7月 被推选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

12月7日 以《满江红》词牌，为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作会歌。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七十四岁

3月5日 上午九时四十五分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遗体后葬于香港仔华人公墓。

蔡元培逝世后，全国各地沉痛哀悼，赞誉他为“一代宗师”、“人世楷模”。

蔡元培与东西文化融和

〔美〕戴维翰(William J. Duiker)

王 宁

姬 虹 译

今天，当人们回顾第一个中华共和国初建的重要时期时，对蔡元培或许最记得的是：他是一位教育家和北京大学校长。然而，对于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学生来讲，蔡元培同时还是一位重要的伦理哲学家和他那个时代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之一。

虽然今天他没有被视为中华共和国的屹立巅峰的知识分子之一，但是他的思想和著述在著名的五四时期是具有相当影响的，构成了那个时代所留给近代中国的遗产中的重要部分。

同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对蔡元培来说，当时的重要问题就是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去寻找救国的方案。当然，这种挑战不仅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它也是社会的、知识的和文化的。延续半个世纪的帝国主义对日渐衰落的清王朝的冲击，不仅剥夺了它的领土和内部主权，也磨蚀掉了对中国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信心，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尖锐的文化和社会危机。

起初，中国主要的掌权者应付这个问题时采用

的方法是在保持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的同时，也采用西方科学和技术以“致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当这种“自强”的努力不能阻止接连不断的给中华帝国带来的耻辱时，到二十世纪初，很多改良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认为传统的遗产与中国人的实际需要是完全脱离的，应该用以西方样板为基础的新体系来取代。这种观点在共和初期的所谓“新文化运动”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蔡元培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是最能认识把西方的思想、制度和准则引进中国社会的重要性的。但蔡元培也相信西方思想是不能被输入真空的。象他的同代人、著名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样，认为必须实现社会变革，但不是依靠西方生活方式全盘输入中国，而是通过维护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同时吸收有用的外来思想的选择过程来实现。

以这种“综合”的方式改造中国的努力，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二十年内得到了政治界的某种支持，也被建立于1928年的南京政府所推行。在总司令蒋介石的领导下，南京政府采取了一种将西方政治模式和经济现代化的考虑同保持儒学传统中伦理价值精华相结合的发展战略。然而，蒋介石综合东西方的尝试没有什么效果。随着中国共产党在1945—1949年国内战争中的胜利，这种用“综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方式被抛弃了，中国的新领导致力于彻底消灭中国的“封建”过去，引进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新的生活方式。

在外界，有很多外国学者，他们不一定同意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案，却似乎赞同中国新领导人的观点，认为以综合东西文化来创建现代中国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在许多“中国特殊化”者看来，传统的、曾形成了中华帝国政治和社会基础的儒家思想体系是与现代技术文明的需要直接冲突的，在新世纪的急切要求面前，不可避免地会束手无策。

然而，在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西方的学术界产生了一种不断增长的迹象，认为社会变化是通过在保存那些过去的价值观念的同时逐渐适应新思想来实现的。在中国国内，现行的领导集团似乎对此持赞成态度。在1987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采用的对于未来的提法是寻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政府也公开谋求通过自由输入西方价值观念和技术体系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梦想。

这种现状表明了重新看待已经被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如蔡元培）提出过的思想的重要性，即判定这种思想与当前中国的现状、及整个现代世界可能有什么联系。

从学识和爱好来说，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唯一的适宜于调合中西、折中新旧的人。他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教育，在1890年考中别人梦寐以求的进士，达到了学术成就的顶峰，不久又在北京被点为翰林院受人尊敬的翰林。然而，蔡元培不满意于中国变化的缓慢步伐，很快又被改良主义者的失败所教育。在上海加入革命运动以后，他最终决定去欧洲，从其本源入手研读西方文化。在柏林学习了一年德语以后，他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美学和伦理学，一直到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次年初，蔡元培回国，在总统袁世凯的新的共和政府里任第一任教育总长。从那个职务及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蔡元培成了一个改良近代中国的有力鼓吹者。

在某些方面，蔡元培的观点与那些主张大量向中国介绍西方的准则和政治制度的激进同僚相似。他是一个西方科学和民主的赞颂者，笃信它们适合二十世纪中国的需要。象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进步分子一样，他猛烈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那种固步自封、陈旧迂腐、虚骄自大，那种僵硬的等级制度及伦理思想中的宗法制已经完全过时，在新的中国已没有立足之地。

但蔡元培认为，简单地摒弃旧体系，无批判地采纳西方的模

式，采纳一种比中国和西方众多的知识分子接受程度更高的、在一种流行的社会进化思想中成长起来的样式是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对蔡元培来说，传统和现代文化的要求并不是一定冲突的，现代化并不包含对所有传统准则和制度的无情的抛弃。他的观点是，社会变化起因于文化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对不同文化中的价值成分的有选择的借鉴。

蔡元培的文化交融思想是他社会进步理论的基础，是他人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他的一些杰出的同代人如梁启超、严复被现代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影响——根据这种理论，宇宙以残酷的生存竞争为特征——因此把目光集中于人类忠诚的初级方式即民族国家上面的时候，蔡元培转而倾向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所创立的互助论。克鲁泡特金否认那种认为进化首先是通过人和人之间、社会和社会之间的争斗来实现的逻辑前提，宣称：和谐和合作，而不是冲突，才是人类自然生活的特征。

对蔡元培来说，互助论的观念比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描述的民族战争的严酷思想更具有吸引力。从早年开始，他就被新儒家哲学的人文主义思想所吸引，参加了绍兴志学会。这是一个设在他的故居附近的小的学术团体，它背离了汉学占支配地位的繁琐考据，以求在世界上实现消灭贫穷、消灭疾病、消灭罪恶的三个伟大的伦理学目标。他还特别欣赏公羊传——早期儒家的经典，被改良主义者康有为用来支持他本人的观点，即孔子不仅是哲学家，也是个先知，已经预先设想出了未来的和平和民主。公羊传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大概就是有关“大同”的理论——人类进化到最终乐园的“三世说”，在传统的中国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分阶段进步学说。蔡元培当时显然被这种观点所吸引，后来经常提及大同说，到成年时仍然热情地关心着人的道德、献身于社会改造，对人性的真正完整抱有信念。

蔡元培固守于克鲁泡特金对人类历史的解释。他特别喜欢把这个时期特有的东西一般化。把这种方法不加区别地应用于人类在不同水平上的努力。这包括，他宣称：互助合作的过程不仅仅发生在一个给定的团体的人们中间，也发生在社会关系互相交错的水平上。社会进步不是通过地球上的较原始的社会自然选择以一种简单的淘汰方式来完成，而是通过作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过程来实现。它甚至不是个体的和社会性的，而是一种进化过程对陈旧的观点和准则所进行的淘汰。只有那些将自己与外界团体的所有接触顽固地隔绝开来的社会才会真正地被淘汰。

不幸的是，蔡元培从来没有试图将他自己的观点深化下去，成为历史上互助论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要把散见在他的著述中的他的观点的痕迹收集起来是有可能的。很明显，他毫无顾虑地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应用他的“文化交流法则”，并致力于回答他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所极关注的问题，即在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频率不同的原因。

对蔡元培来说，理解中国和西方社会演化进程的关键是“文化交流”这个概念。在早年，他宣称，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是等值的，早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中国就开始发展农业、林业、商业，并且在天文学、医学、音乐和雕塑方面也取得了同样的进步。在周朝和汉朝，同在教育、艺术和哲学上一样，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艺制造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他指出，在所有这几方面，中国的文化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一样发达。

中国和西方文化上的相似性一直延续到古典时期以后，紧接着古典时期，两种文化都经历了一段衰落（在这里，蔡元培有些牵强地试图把欧洲的经院哲学与宋朝的理学相比）。随即，相似性突然中止了。当西方过渡到一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新时期的时候，中国却停滞在它通常的发展水平，直到十九世纪打开大

门。

为什么欧洲前进了而中国却没能如此？蔡元培在文化交流中找到答案。他宣称，在西方中世纪的晚期，欧洲从与它相邻的伊斯兰文化的接触中受益。欧洲从阿拉伯哲学和数学著作的引进中受到刺激，被促使回头到自己古代遗产中去“寻根”。从与邻近文明的文化接触中，在西方出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近代社会。

中国没这么幸运。除了印度，没有一个邻国达到可与之相比较的文化层次。因为只能被迫依靠自己的资源，所以中国目光向内，虽然有着人的才能和知识上的丰富的天然储备，还是在人类进化的道路上落后了。既然同世界先进文明的文化接触已经重新开始，中国必须尽全力补偿损失。但仅仅承认需要对外借鉴并不能解决问题。对文化交流思想的基本原则来说，存在着一个价值判定的问题。一个给定的思想价值准则怎样建立起来？最终的判定标准是什么样子？一个人必须怎样判定传统文化中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需要抛弃的？对那些“自强”者来说，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问题。因为最终的社会准则仍旧是儒学的实质“体”。西方的实用知识被吸收到能丰富或有助于保存这个民族的伦理——精神基础的程度。但是在二十世纪的初期，它只是一个越发难以维护的假说，这不仅仅是因为“自强”策略的明显失败，也由于这两种文化的不可调和性日益明显。

就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说，蔡元培超越了儒学传统，以探求关于宇宙的本质和人生意义的根本问题的答案。他与上一代的自强主义者不同。他在把西方的知识归类到低一等的实用知识的层次（即“用”）的同时，没有在中国寻得更深入的生活本质——“体”。在蔡元培对科学发生兴趣，接受西方关于现实的最终本质的哲学远景的时候，他从绍兴志学会的三个简单的愿望出发，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然而，在另一方面，蔡元培保存了他

最初向往的真实。他的哲学观点似乎明显地倾向于综合中西知识传统，调合儒家理论的重点以求与西方的变化与进步的信念相协调，虽然他认识到了儒家理论是一种过去时代的产物，阻碍着中国文明中知识的增进，但在他的哲学思想里仍然存在着鲜明的、同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相似的东西。

蔡元培明白，人类对未来大同的迈进是漫长的、艰难的。作为一个从内心里喜欢和谐折中的人，他反对诉诸暴力而认为中国必须在停滞和激烈变动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他曾经用人的消化系统作类比：人类文化必须象人身体的器官一样消化和吸收。中国必须不仅吸收外来的文化影响，还得消化之。不是一个短时期的生吞活剥，而必须有一个长时期的消化过程才能减少吸收外来文化产生的麻烦。蔡元培认为，一个人在吸收过程中吃下各种东西，但是糟粕的东西必须排除掉，否则就会引起消化不良。为了使他的观点有历史深度，他提到了佛学。依照他的观点，佛学在中国从来没有被真正消化过。然而它依靠迷信，不断地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制造障碍，所以中国应避免生吞西方文明的糟粕——政潮之排荡，金力之劫持，宗教之拘忌——只吸收有助于她成长的那些成分。

事实上，蔡元培对欧洲社会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深刻基础决不是不了解的，他反对自由资本主义者的方法，而是赞同无政府主义者建立更加平等社会的远景，即在那里财产公共所有，私人财产将被没收。

据此，西方思想的输入并不能暗示要放弃国有财产。在很多场合，他指出了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似性。在过去的中国，发展了许多对创造新中国是不可缺少的政治、社会、文化准则。他指出，甚至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平等社会的观点也唤起了对古代井田制度的记忆。事实上，在很多场合中国放弃了这些准则，但凭借它曾经发现了他们这样的力量，它确实还能再次运用

他们。就中国整个传统而言，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讲是新奇而陌生的东西并不是不能调和的。因此，儒学不能完全被抛弃，实际上，它与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提倡的现代理论有许多一致性，比如强调个性和知识、经验的价值。

从长远来看，感情上的反抗与非批判性地接受西方同样都是错误的。一条慎重的中间路线将导致中国社会再生长，不仅在纯科学和艺术、文化的复兴，而且也在整个生活内容，这表现在饮食、穿衣、住房、教育。总之，它将导致中华民族创造性活力的复苏。很明显，蔡元培毫不在乎那些改良主义者在东方“精神”方面对西方唯物主义潜在影响的不相信，当他知道西方文化的糟粕时，他感到在中国西方文化巨大的冲击不仅丰富了物质生活方面，而且也丰富了精神方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复兴的人将其成为一个新人，与十五世纪欧洲的先人相比，他将在世界上更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蔡元培与中华民国

在蔡元培活跃的政治生活的晚年，他试图使其在推翻清朝过程中形成的世界观普及化。首先他取得一些成功。作为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总长，他协助提出了在新中华民国形成教育系统的新设想。数年后，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通过建立咨询的学风和接受学校中的新思想来帮助年青的一代中国人形成思想。在很多演讲和文章中，他敦促中国人从过去的昏睡中醒来，接受他关于新中国的远景规划。这是个顺利的年代，因为民国初期正处在知识动荡的时期，即历史上称为新文化运动。不用赘言，蔡元培是数个形成运动特征的人之一，因为这是对新思想探索的乐观时代，蔡元培的观点扼要地抓住了他的年轻同胞的想像力。

毕竟，蔡元培的理论就象民国初期冲击知识界的其他许多思想一样，被中国革命的漩涡冲刷到一边。这里有无容置疑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带

来了巨大的破坏，这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头脑里的西方文化的贪婪、物质欲、享乐，产生一致性，不相信西方文明作为中国发展的可能模式。西方在东亚的举动又显示了帝国主义高级阶段的某些特征。1919年凡尔赛和约决定把中国的山东领土转让给日本是最沉重的打击。在以后十年帝国主义者们的行动证实了中国人的怀疑：西方的自决权和所有民族、国家拥有平等权力的主张是伪善的。

蔡元培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主张，并且他也赞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承认西方太充满物质欲了，太富有侵略性了，并且有了一个走向极端的倾向。但是他承认中国陷入了相反的倾向，进而他坚持认为协约国的胜利代表了世界上互助、民主、国际主义、正义力量的胜利。

以后，蔡元培稍稍修正了他的观点，作为对欧洲连续不断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的反应，他发现了中国崇高的和谐、忍耐、人道的价值。他在孟子的古井田制度的经济平等里发现了民主的种子，指出孙逸仙“三民主义”是在现代世界里对古典中庸思想的一种解释。但是蔡元培对孙逸仙遗产的维护，运用到1928年在南京建立的第二次共和却是错误。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南京政权摒弃了西方自由传统的某些特征，接受了新的传统主义者的思想，试图恢复传统儒学中的等级和权威的成分。因憎恶这一切，蔡元培从活跃的政治生活中退下来，将余生用来抵制政府的批评和宣传人道。

蔡元培同样不喜欢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争夺中国革命外衣的主要对手。象他的许多无政府主义伙伴一样，蔡元培憎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和阶级仇恨理论，在二十年代他曾积极参与试图在孙逸仙的国民党中消除共产主义的影响。他对社会、政治的激进主义反感可追溯到五四运动，当时他试图劝说学生放弃政治活动，回到教室里去。

蔡元培决非不关心折磨着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贫困、无知、疾病。五四时期，他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鼓励年青人“去农村”唤醒穷人，鼓励他们寻求改善他们的处境。但是蔡元培除了对北京军阀政府的腐化、无能和贪婪表示憎恶之外无所作为。他主张放弃暴力的主张，相信建设的时代即将到来。当五四运动在受挫与愤怒中结束时，在许多进步人士中，蔡元培象一些中国自由主义者一样，毫无准备地响应了。

以真理、和谐、温和为理由，蔡元培错误解释他所处时代的特征，错误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动态。因为在多数中国人的头脑里，尽管他的和谐、友爱的思想是有吸引力的，但在当时构成中国特征的仇恨、无知、贫穷的竞争世界里，这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在当时的时代，人们不愿意轻信他们的对手是善良、诚实的人，在保守的士绅和准备铤而走险的农民、工人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利益和谐”的。蔡元培错误地理解了他那个时代的本质。他提出了把中国建立在过时的儒学（也许是神话）基础上的设想，处于可怕社会问题泥潭中的中国不可能跟随他到达山顶上的冷静的超脱。

总之，蔡元培低估了中国显示出来的民族主义力量，他把他的哲学建立在人类正进入国际主义、互助新时代的设想上。但二十世纪一系列事态发展更倾向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辩护，即社会是处在敌对民族、国家的斗争中。因此，中国忽视蔡元培的主张，而是跟随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努力发展中华民族的财富和力量是不足为奇的。

蔡元培和他的无政府主义者伙伴们错误地判断了时代特征和中国人民的心情。因为这个错误，他的思想被许多中国人和西方人认为不切合中国革命实际而被抛弃。简单地说，这个判断可能是公正的。但是在由时间提供的长远透视中，就很可能看到蔡元培关于新中国、新世界的远景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它可能包含

着最基本的见解，这些见解现在正逐步明显化。可是，没有迹象表明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全球性的斗争正在让位于世界应建立在互助基础之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设想。尽管有明显标志说明，文化交流和民族发展的多种途径正在逐渐普及化。

这两种倾向没有比中国自己更好的例子。在中国企图系统地消灭所有危险的外国思想和过去封建实践的急进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后，在毛泽东逝世后出现的新一代领导人，尝试着一种达到现代化的实用主义方法，即企图把社会主义制度、伦理同现代西方的实践混和起来，同时也认识到在民族历史和文化本性基础上建立新中国的必要性。

当然，蔡元培的价值标准与中国现在领导人所持有的有很多本质的不同。蔡元培是在欧洲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发现了最高价值，今天中国领导人把他们最基本价值建立在阶级斗争、民主集中、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列主义基础之上。两个系统的交会点在于他们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敌对和对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坚信，他们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它。

在如何对待过去的问题上，蔡元培也有很大的不同。他在中国人道主义的哲学传统中发现了价值标准的要素，中国共产党给孔孟之道以吝啬的颂词，更注意观察过去的经济制度，明白中国作为农业的前工业社会，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到达共产主义社会。过去没有可借鉴的东西，只有上升发展的阻碍。

从最近历史的透视可观察出，很难否定中国共产党方针的现实性和有效性。蔡元培的设想是建立在对宇宙自然理想化的理解基础上的，这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误解看法。共产党的方针是建立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的现实性上的。这些方针正确性可由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统治了四十年来证明。

中国目前的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综合的努力是否有现实

性，只有时间能回答。一些局外旁观者怀疑在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诱惑与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和制度是否长期并存，并将现在的努力与十九世纪末中国革新者相比较。照他们的看法，社会主义的原则与现代化技术的要求是天生对立的，最终一个会让位于另一个。当然，中国利用西方技术来保护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本质，是中共领导人的一场赌博。他们是否成功在这里是个不好探索的有趣问题。就蔡元培有关的，很清楚，在世界被物质进步、民族财富和力量的愿望占领之前，蔡元培的思想很少有直接的关系。充其量不过是他们可以提供作为人类超越物质关系的标志和实现未来大同梦想的微弱的声音。

（本文作者，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这篇论文载于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一书，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后 记

充分利用已刊资料，参考和借鉴现有成果，
充不带偏见地、“历史的”记述蔡元培先生的
生平和学术，是我一年前决定承担这项写作时所抱
定的主旨。此刻，书稿写竣，就自我感觉而言，既
有贯彻初衷的快意，亦不乏限于时、力的抱憾。我
期待着真诚的反应和评论。

业师高平叔先生自始至终关心此项写作，多方
给予指导，书稿草成，悉心审读，提出许多具体修
改意见，并欣然赐序，使我获益良多；此书责任编
辑钱宏先生，从约稿到详解丛书编辑思路，令人真
切感受到一位出版工作者的执着追求和强烈使命
感，老实说，没有他的策励，此书就不会写成。在
此，谨向两位先生致以深深的谢忱！

我还要感谢董健莉女士，她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帮助誊录书稿，付出许多辛劳。另外，夏波君
和辜燮高先生亦先后慨然惠助，特一并鸣谢。

有人说，一本书也是一个生命。其实，变幻万
端的大千世界已不在乎一本小书的有无。不过，私

意以为，这本小型传记倘能有助于世人客观了解蔡元培的生命历程及其社会影响，那便是对我的一番劳苦所作的极好报偿，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敝帚自珍吧。

作者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日于天津复康里

蔡元培 (1868—1940)，
字鶴卿，號子民，浙江紹興
人。教育家，著名學者。

本書以求實求信的科學態度及平實曉暢的文字，對蔡元培先生作為中國新文化、新學風、新學府的開拓者，作為“戊戌”與“五四”兩代學人的溝通者，作為中國現代倫理學的奠基者，以及作為近代中國學術文化史上學貫中西的“通人”的傑出代表進行了全面、深入而獨到的描述和評價。讀后使人對蔡元培這位“國學大師”“人世楷模”將有更為深切的認識，也使人對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轉捩盛況有一個基本了解。

作者張曉唯，男，1957年生。歷史學碩士，現為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講師。已發表學術論文 20 余篇。